

客家婦女的勞動意識：以新埔削柿子婦女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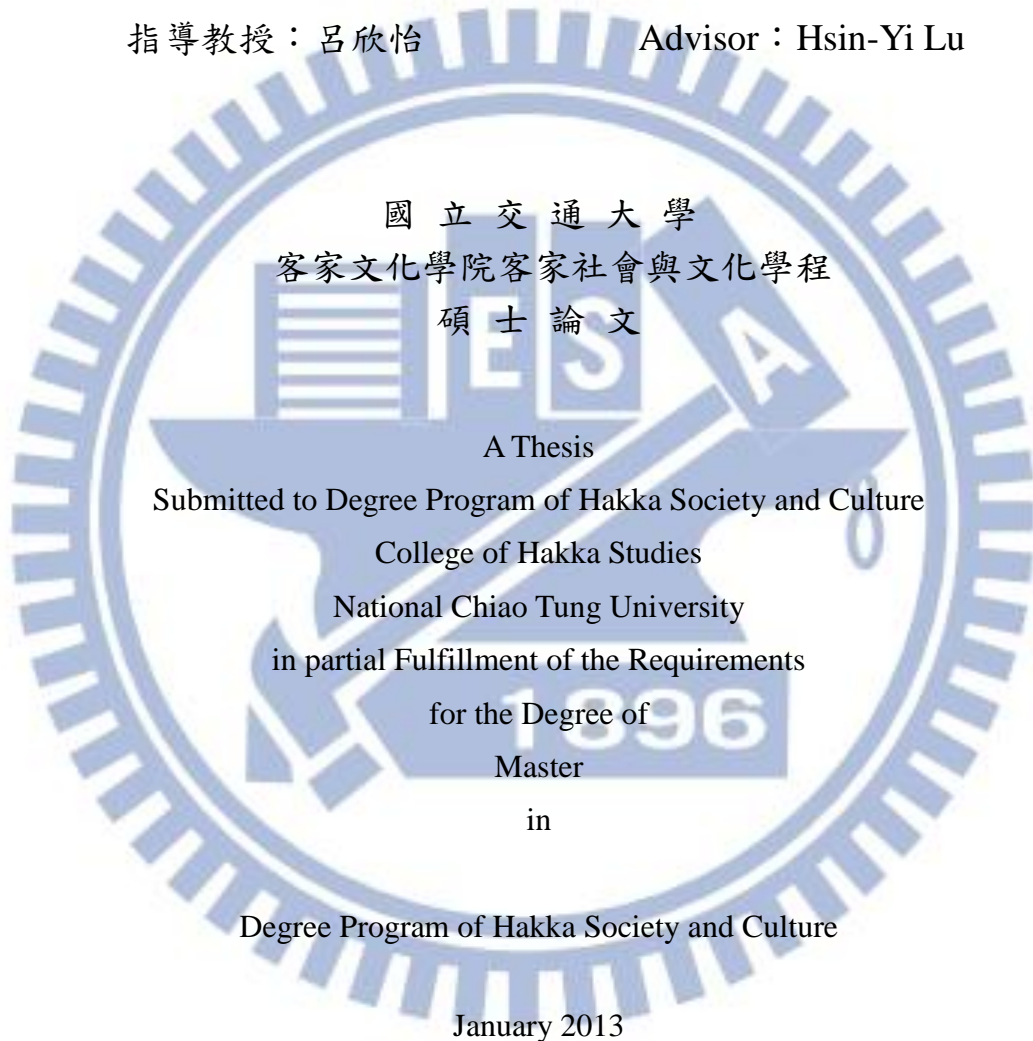
Labor Consciousness of Hakka Women :
A Case Study of persimmon peelers in Xin-pu

研究生：張如萍

Student : Ju-Ping Chang

指導教授：呂欣怡

Advisor : Hsin-Yi Lu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一〇〇二年一月

客家婦女的勞動意識：以新埔削柿子婦女為例

學生：張如萍

指導教授：呂欣怡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客家婦女的勞動意識，透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蒐集資料，訪談對象為柿餅加工業者、削柿子的婦女，以新埔當地柿餅產業變化作為背景，分析新埔柿餅從產業到文化產業變遷過程中，柿餅加工業者因應外在條件於柿餅製作勞動體制及性別分工的演變，另以削皮機器出現為分界點，將削柿子婦女區分為兩個世代。本研究發現柿餅業勞動過程中性別分工與階級有連結，勞雇雙方有共識，削柿子婦女在工作上表現出志願性順服現象，雖不同世代婦女的生活背景和經驗差異很大，但仍有同質性經驗，客家婦女將勞動化為行動與生活的核心價值，削柿子工作對婦女來說是個人、工作、家庭三方面得利。

本論文主要架構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介紹研究動機、研究進行的方法、研究過程與文獻回顧。第二章寫新埔地區柿餅產業，介紹新埔歷史與柿餅製作過程、柿餅產業勞動體制以及政經變遷對產業的影響，婦女在產業中的勞動參與。第三章分別陳述兩代婦女自幼至今的勞動過程，不同角色下婦女在家庭與工作的勞動狀況，並比較兩代之間的異同。第四章自女性化的勞動價值切入，觀察婦女勞動意識。第五章從不同面向觀察婦女在工作和家庭兩者間如何取得平衡，並歸納出工作對婦女的多重意義。第六章為結論與研究限制，提出本論文的研究意義與研究面臨的限制，並提出未來對削柿子婦女延伸研究方向，供後人參考。

關鍵字：客家婦女、勞動、新埔、柿餅

Labor Consciousness of Hakka Women :
A Case Study of persimmon peelers in Xin-pu

student : Chang Ju-Ping

Advisors : Dr. Hsin-Yi Lu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labor consciousness of Hakka wome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and data collecting. The woman persimmon skin peelers of the persimmon processing industry were chosen as the objec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sinpu dried persimmon industry was taken as the background. The aim is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system and gender work distribution of dried persimmon production proces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industry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Furthermore, the emergence of skin peeling machine was taken as the division point to divide the woman persimmon skin peelers into two genera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ender work distribution and class during the dried persimmon labor process and that both labors and employer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While at work, the women persimmon skin peelers show voluntary obedience. Although there is a large variance within the backgrounds of women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y share similar experience to some extent. The Hakka women have transformed labor into action and the core value of life, and they presume that the persimmon skin peeling job is beneficial from individual and family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rocess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apter two gives an overview of Hsinpu history and persimmon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labor system of persimmon industry,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dustry, and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y. Chapter three narrates the labor processes of two generations of women since their childhood until now, the labor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family and job based on different role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Chapter four cuts straight into feminization of labor value through an observation of the labor consciousness of women. Chapter 5 explains how women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ir job and famil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work for women. Chapter six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which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and proposes the prospective research direction on women persimmon skin peeler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致 謝

這是論文第一頁卻是最後動筆的一頁，在學期間畫面一一浮現，人的動力是來自於喜歡的事物，感謝在客家學院授課的老師們，為我開啟知識的窗門。進入客家學院唸書，每回下課都感到精神百倍，如同我的受訪對象削柿子婦女一般，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再累也甘願。

感謝論文指導教授呂欣怡老師，帶領我進入人類學的領域，引發我對生活周遭的關心，論文撰寫期間耐心陪伴我度過求子、懷孕、生產、育嬰等階段，給予我最大的信任與鼓勵，讓我有動力繼續努力下去，直至完成。謝謝口試委員連瑞枝教授，點出我從未思考過的盲點，協助我導正論文的方向，謝謝口試委員林文玲教授細心閱讀與回應，您給予的建議與期待，讓論文更加完備。

感謝新埔柿餅加工廠的老闆與削柿子婦女們，大方的受訪並分享生命經驗，使我能順利完成論文，在你們身上我學習到知足常樂。

感謝課堂上一同打氣同學：美玲、武德、秋賢，給予正面能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感謝父母與先生全力支持，讓我有最堅強的後盾，無後顧之憂專心向學，把論文完成。感謝家人不時打氣，給我重新站起來的力量。感謝一雙兒女帶來歡樂，使我得以暫時拋開論文的壓力。

因為撰寫論文我感受到身邊滿滿的愛，感謝天給予我的一切！

張如萍 謹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致謝.....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
圖目錄.....	VI
一、 緒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文獻回顧.....	3
1.3. 研究方法.....	10
1.4. 研究過程.....	12
1.5. 章節安排.....	14
二、 新埔地區柿餅產業.....	15
2.1. 柿鎮新埔.....	15
2.2. 新埔柿餅的起源.....	18
2.3. 新埔柿餅產業網絡.....	19
2.4. 婦女之勞動參與.....	32
三、 世代削柿子婦女的勞動.....	34
3.1. 第一代婦女.....	34
3.2. 第二代婦女.....	45
3.3. 兩代之間.....	52
四、 削柿子婦女的勞動意識.....	58
4.1. 女性化之勞動價值.....	58
4.2. 僱佣關係.....	65
4.3. 做件意識.....	69
4.4. 小結.....	71
五、 工作的多重意義.....	73
5.1. 生命的轉折點.....	73
5.2. 兼顧家庭.....	76
5.3. 有收入.....	78
5.4. 社交圈.....	82
5.5. 小結.....	86
六、 結論.....	88
6.1. 研究發現.....	88
6.2. 研究限制與展望.....	89
七、 參考文獻.....	91

表 目 錄

表 1 第一代削柿子婦女社經背景.....	34
表 2 第二代削柿子婦女社經背景及工作經歷.....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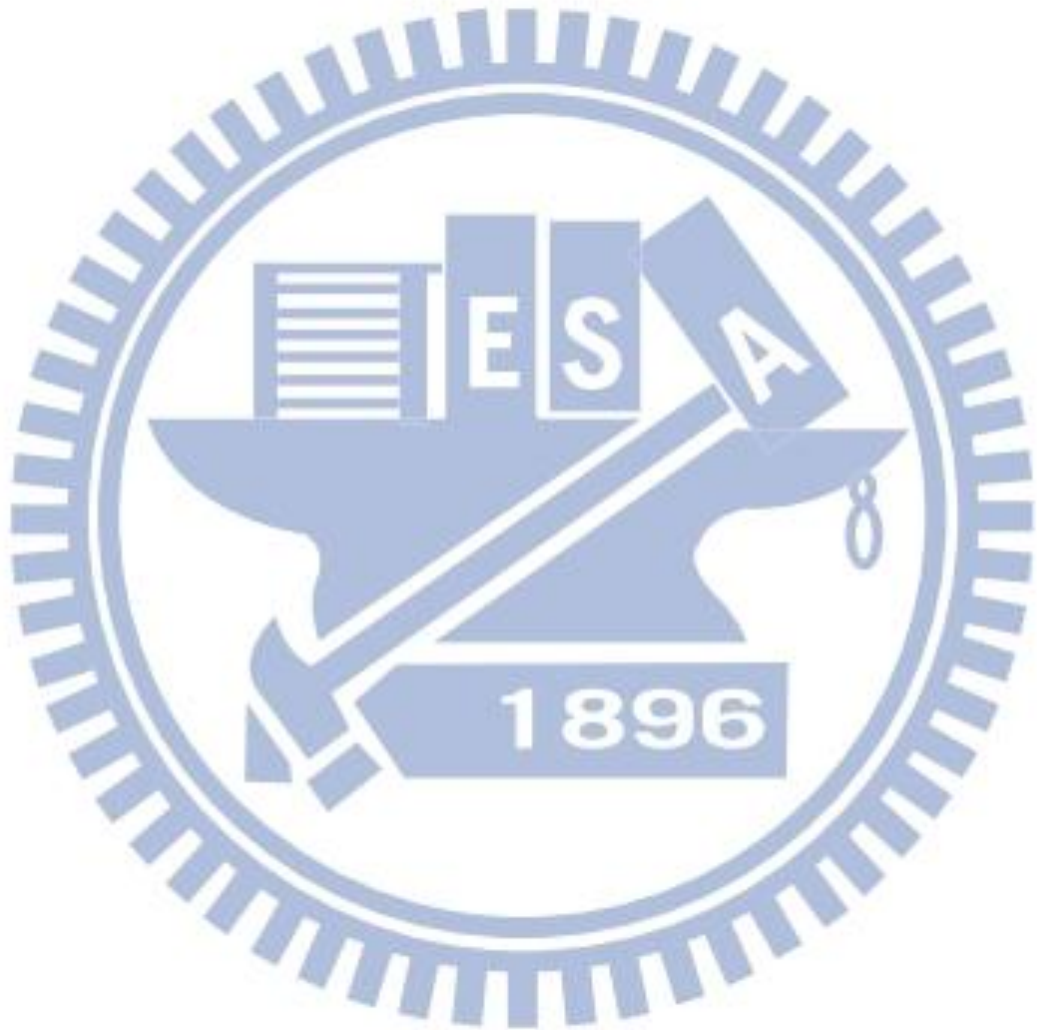


圖 目 錄

圖 1 新竹縣新埔鎮行政區劃圖	16
圖 2 清代台灣省行政區域圖	17
圖 3 清代竹塹地區土牛溝和番界圖.....	17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還記得小時候每到柿餅產季，在新埔鎮上開輪胎店以換補輪胎為業的爸爸總會利用沒客人的空檔，開著工作車帶我和妹妹到旱坑里去買柿餅，記憶中，滿載換補輪胎機具的工作車在前往旱坑里的山路上，需要爸爸沿途熟練地切換低速檔、加足馬力才能順利抵達。旱坑里對我而言並不陌生，因為我就讀的小學就在前往旱坑里的路上，放學後，我常會步行幾公里到同學家玩跳繩，直至傍晚才又步行回家，因此，坐在爸爸的車上，先是經過一個又一個同學的家，就會抵達柿餅工廠。爸爸認為工廠門口的車位是給客人停的，我們是在地人，不要佔用車位，爸爸會把車子停在坡度大的路旁，拉起手煞車，再步行至柿餅工廠。工廠老闆是爸爸的客戶，還沒走近，爸爸遠遠就舉起右手，向老闆打招呼，口中說著最近忙不忙、生意好不好等問候語，忙進忙出的老闆沒停下手邊工作，叫我們自己到裡面走走看看。哇！三合院的禾埕上架滿比我頭還要高的竹架，上面放滿一篩篩削好的柿子，黃澄澄的一片，美極了。不過，最吸引人還是削柿子的過程，鐵皮屋下一群婦女圍坐在削皮機器旁邊，有人負責削蒂頭、有人負責把柿子放到機器上，不到兩秒鐘機器削好的柿子沿著管子滾動下來，有人把柿子拿起來削一削再放到竹篩上，不一會兒，竹篩上擺滿排列整齊的柿子，再把沈甸甸的竹篩拿起，換上另一個空篩。我目不轉睛看著削皮機是怎麼快速的把皮削下來，心中想著：這台機器真是神奇呀！看著她們工作時不斷重複著一樣的動作，我也想知道：一整天做同樣的一件事情，不會無聊嗎？看著看著，爸爸擔心店裡會有客人來就催促著要回家，臨走前買個兩、三盒交關一下，是每一次不能減少的步驟，直到此時，總在另外一邊忙著照顧竹篩上的柿餅的老闆才會停下手邊工作到櫃臺拿柿餅給我們並道別。

爸爸外出時家中只有媽媽在，若恰好有客人來，在不好意思讓客人等待的情況下，媽媽會幫客人換補輪胎，我覺得媽媽好厲害，拆卸輪胎的機具那麼重，她怎麼拿得動？她怎麼學到這些技術的？印象中媽媽在家中從早忙到晚，沒有外出工作過，但是聽媽媽說以前年輕時，她曾在台北的紡織工廠上班，透過介紹認識爸爸，結婚後才到新埔住，直到快要生哥哥時才辭去工作，雖說是當老闆娘，實際上在家裡顧店、帶小孩、做家事等什麼都做，有空時拿家庭代工來做，再也沒有外出工作。那在柿餅工廠削柿子的婦女為什麼會在那裡工作？可

能她們家不是做生意的，所以不必在家裡幫忙，又為什麼不去工廠上班？家裡的事情誰做？這個疑問放在我的心裡，沒有答案。

直到進入客家學院唸書，在修習文化人類學理論這門課時閱讀洪馨蘭的文章《春蠶到死絲方盡：臺灣六堆與瀾濃地區之外祖敬拜與婦女勞動意識》觸動了我，「春蠶到死絲方盡」出自於唐朝李商隱詩作，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原意為堅貞的愛情至死方休，蠶吐絲，專注且執著的完成一個繭，其實是死亡的過程，正如蠟燭燃燒綻放光亮，同時毀滅自我，描寫生命本質不可言說的辛酸與美麗，一語點出客家婦女為子女、家庭終生奉獻犧牲的至愛，初見此標題震懾許久，客家婦女是我的媽媽、奶奶，也是我自己，我開始回想身邊的客家婦女是否如此，兒時放在心中的疑問再次浮現，我想要深入瞭解削柿子婦女內心的想法。

客家人由於居住環境與經濟狀況影響，其產業活動多為農林礦業，新竹縣新埔鎮客家人口占百分之 90 以上，新埔有得天獨厚的地形與氣候，能做出口味及口感佳且無可取代的柿餅，旱坑里是新埔柿餅的發源地。旱坑里因地勢和緯度的關係，全年難得下雨，二月至九月為雨季降雨量較多，十月至翌年一月雨量較少為旱季，加上為九降風的風口、颳北風的日子較長，成為曝曬柿子的極佳條件（吳念真 1997）。旱坑，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少水的地方，由於整個村子的地表大部分都被岩石覆蓋，雨水難以下滲，開井困難，旱坑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早年取水不便，若要用，得花上 30 分鐘的路程到外面去挑，後來總算在海拔 120 公尺的丘陵地，找到泉源，靠著這口井，旱坑里才得以解決民生用水問題（李健果 1998）。當時來到旱坑里的客家人，多是幫人耕種的佃農，這塊丘陵地土質多為紅棕壤與黃棕壤，土壤酸性強而貧瘠，不宜栽培一般農作物，適於種茶、柑橘類。據新埔旱坑里味衛佳柿餅加工廠第三代負責人劉理鑑提到，他們的祖先以前在北埔住一段時間，覺得新埔旱坑這裡的氣候很適合，起先跟這邊的佃農租地種植作物，後來阿公買下這個土地，在新竹這裡落地生根開始種。我們可以看到客家先民的韌性，從幫別人耕種開始，過著刻苦、儉樸的生活，緊抓住落地生根的機會，土地放領時買下土地成為地主，雖有大片土地卻不豐渥，明知道柿子的經濟價值高，也不敢冒險大量種植柿子，以前沒有乾燥劑，紅柿、水柿無法保存，南風一吹，濕氣重，不能存放，柿子產量高無法吃完，勤儉的客家人便開始依照古法製作柿餅，這就是新埔柿餅的由來。柿餅為新埔特色產業，柿餅產季在每年初秋到過年左右。1980 年新埔在政府提倡「一

鄉一特產」政策下，把柿餅產業升級及轉型，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客委會及地方客家事務機關為了彰顯各地客家不同風貌，1998年開始在新竹縣定期舉辦新埔柿餅節，除提高柿餅產業能見度外，也吸引觀光人潮，柿餅銷售量因而大增。2010年柿餅年產值達到三億元（林政鋒、李珣瑛 2010），由此估計，在產季時許多婦女投入削柿子的行列。

1.2. 文獻回顧

本節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回顧客家文化產業源流，其次，瞭解文獻中客家女性勞動對於家庭、社會地位的影響、對婦女自身的意義。再者，參考女性主義思想中性別分工與勞動理論觀點，分析女性在社會及家庭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及她們的勞動經驗與生活。

1.2.1 客家文化產業

客家文化產業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客家物質生活的產業化，另一是客家族群原來所經營之產業的文化化。客家先民是原來主要居住在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的漢族人民，由於天災和戰亂的驅迫，離鄉背井、輾轉遷徙，紮根在贛閩粵邊境山區中，與當地原住民交流融合混為一體，形成一個特別吃苦耐勞、團結進取的族群，在艱苦的環境下，客家人的經濟生活面貌有濃郁的山區特色，以農耕為主、商業不發達，由於物質生活窮困，養成儉樸的風俗（謝重光 1999：11-15）。象徵性產業發展過程，指的是在時間序列的某一段時期，大量的移民流入特定的地理區域，為配合自然環境與社會資源的使用，選擇特定的墾殖與農業生產，族群與產業劃上等號就是族群的象徵性產業（張維安 2000）。以資本主義的角度討論，將整個族群團體共有的特徵視為族群資源，族群成員承襲特有的傳統、文化價值，發展出特有的族群產業。客家產業就是客家人在移墾過程中，為了適應環境，使用現有資源與祖先智慧，發展出的謀生方式。

探究文化產業概念的根源，是希望能促成文化與經濟之間的相互轉化，以既有文化資源轉化成商機帶來經濟效益，利用文化創造產值，帶動城市發展，進而促進業者商機與帶來生計。台灣文化產業政策推動的背景是全球化競爭與中國經濟崛起，開發中國家憑藉其廉價的勞力、土地成本，台灣勞力與土地成本相對高，在競爭過程中逐漸失去優勢，面臨國內產業結構轉型調整，開始著

重具在地性、文化性的文化產業，希望藉由國內經濟結構的轉變及各鄉鎮面臨轉型壓力，再造具代表的特色產業，累積國家競爭力（劉照金 2008）。台灣的「文化產業」一詞始於 1995 年 5 月的「『文化產業』研討會暨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中，將「文化·產業」視為社區總體營造重要相關政策之一，並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概念，「文化產業化」是以文化為核心，發展成為產業的「文化產業」；「產業文化化」意謂著以文化包裝產業，或是把產業整合到地方的文化特色之內，陳其南將「文化產業」分為兩個部分，廣義的文化產業，包括發揮在地歷史文化而成的產業；狹義的文化產業，是指以社區原有文史、技術、自然等資源為基礎，經由發現、確認、活用發展出來的產業，強調學習與利益的社區回饋，依賴社區的創意與個別性，也就是產品的個性、地方的傳統性、特殊性，強調產品生活性與精神價值內涵。進一步解釋文化產業是運用文化特色，如生活文化、生態文化、生產文化加以發展應用的產業，需結合社區營造與觀光，鎖定小規模以手工藝方式生產，與地方觀光產業結合的方式，創造在地價值（陳其南 1995、1996），鼓勵民眾直接參與地方與地方文化事物的策劃與推動，透過凝聚社區意識，發展當地性文化結合產業，充實旅遊內容帶來就業機會與經濟效益。文建會 2002 年提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第十項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強調「一鄉一特色」，並宣布 2003 年為「文化產業年」，以文化產業作為年度施政主軸，促使政策由上而下，結合地方產業與文化，政府提出運用文化與創意加值產業試圖提供台灣經濟發展一個新的方向。王俐容（2004）探討從過去菁英文化到文化經濟過程，提到文化政策就是經濟政策，文化創造財富，肯定將文化工業擴大為創意產業的做法。

文化建構和經濟活動所討論的產業，重在文化的包裝，產業加上文化，使得產業經濟活動有品味，因此要從產業的在地特質與長期發展出來的歷史意義中挖掘出經濟的價值（張維安、謝世忠 2004）。台灣客家文化在產業經濟的特質上，如果從客家族群過去所居住的地區及所具有的社會經濟特質來看，過去台灣客家人從事農牧獵業、林業、礦業的百分比高於閩南人，閩南人在漁業、商業的百分比高於客家人（張維安、黃毅志 2000）。客家文化產業多從初級產業發展而來，客家族群長期遷徙歷程建立族群特性，以及居住山區、從事農耕的文化習性，此壓縮式的歷史事實充滿邊緣族群的主觀感受：艱苦、儉樸與離散的意象（林淑蓉 2007）。陳板（2002）最早提出把邊緣的資源轉化為地方發展的資源，客家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正是這個概念的呈現。張翰璧、張維安

(2005) 進一步以客家地區的茶產業轉化為例，受社會、經濟環境變動影響，茶農思變，從賣茶菁轉換到自產自銷的經營方式，將原有資源加以轉換提升種茶的附加價值，在目前的文獻中，關於客家文化產業的研究無論從客家文化角度、或產業角度切入，均發現文化能提升經濟收益。

然而，不同地區的客家族群為了適應地域內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發展出不同「在地化」的現象，不可一概而論，1998 年新竹縣政府開始舉辦柿餅節，柿餅開始與新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林明 2009)，柿餅產業成為新埔的特色產業。賴守誠(2008) 研究指出新埔柿餅生產者回復古法生產，同時也加入生產區域的文化意義進行行銷，地方特產透過實體環境層面、文化層面、經濟層面等資源增值，邊緣區域的農民可以透過與當地經濟網絡協力合作提高其經濟收益、提升技術性就業。

1.2.2 客家婦女

張翰壁(2007) 在「客家婦女篇」一文中，透過文獻分析大致將台灣客家婦女的研究依時間歸納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90 年以前，多承襲羅香林於 1933 年以及 1950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及《客家源流考》中對於客家婦女勞動的鮮明形象，為勤勞樸素、任勞任怨、犧牲自我、堅強，由父系繼承的「系譜書寫」呈現男性觀點出發的客家婦女，將「勞動」本質化成「客家婦女」的特性(羅香林 1981: 240-246)，對客家婦女僅止於平面描述。第二個階段是 1990 年到 2000 年，李泳集(1996) 透過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探討客家文化對客家婦女行為的影響，試圖從女性自主選擇的角度來書寫客家女性如何做出自己的選擇。同年，房學嘉在《客家源流探奧》中記錄從民間傳說、習俗、地方文獻和生活狀況等方面，考察客家婦女的種種特徵。當時台灣社會處在多元發展的階段，女性主義思潮引進，由女性書寫客家婦女的文章增加，學者從社會壓迫的角度來看待客家女性的勞動狀態，多採用實證性比較研究方法，比較對象是閩南婦女，發現客家婦女的勞動參與高，但決策權與社會地位沒有相對提高(張維安 1994; 莊英章 1994; 林鶴玲、李香潔 1999)。第三個階段是 2000 年至今，以客家婦女為主要論述的相關研究有明顯成長的趨勢，客家女性的勞動經驗、族群認同及生命經驗為主題，研究方法採深入訪談及口述歷史，讓客家女性說自己的故事，重視以女性觀點出發的日常生活，試圖跳脫男性宗法制度的框架，從不同的取向、視野切入，回到女性的日常生活層面來理解她們，客家婦女開始發聲。

關於客家婦女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兩方面，一為早期流傳的諺語、山歌或文學作品中所透露的意象，陳運棟（1983）在《客家人》一書中整理外國傳教士、民俗學者以及作家對客家婦女的描述，多將客家婦女的勤勞視為美德並加以讚揚，文學評論家彭瑞金（1993）主張台灣客家文學最明顯的族群文學特質是以女性為主導的社會現象，客籍作家的作品對女性人物的描寫與塑像，透露了客家族群的形象，張典婉（2001）以客家文學中對女性的描述作為素材，希望提升客家女性研究的發聲機會與主體性。

二為客家女性地位的研究，文獻中客家女性勞動與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呈現兩極化的評估，一方認為客家婦女受到父權體制和資本主義雙重剝削（李竹君 2001），地位處於弱勢，客家婦女刻苦耐勞形象的背後是體制壓迫的殘酷事實（鍾永豐 1994b），為家庭付出最多勞力與心力，同時擔負起養育、家務與農務，被期待為家庭的「犧牲者」和「勞動者」，雖然得到尊重，但仍是不能當權，勞動沒有提升客家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房學嘉 2005；賴郁如 2007），只能作為丈夫或兒子的附屬角色而分享財產，在社會體系、文化體系中呈現無身份的狀態（鍾永豐 1994a），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成為最自主與最高明的生存策略（連瑞枝 2010），而勞動的觀念透過女性與母職的傳承與複製，無形中規範客家婦女一言一行，客家婦女在家庭婚姻體制中承受壓抑與貧乏（劉錦雲 1995：100），楊國鑫（1993）認為客家婦女把工作當作權力與生活本質，視勞動充實人生，日常行動受到勤勞習慣的支配。一方研究指出客家女性地位不低，江運貴（1996：193-197）大部分引用外國學者的對話論述，認為客家婦女比中國婦女擁有更多的影響力，在中國處於男尊女卑的時期，客家婦女已享有個人獨立和族群權力。近來學者研究發現婦女地位隨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曾純純（2006）從客家族譜探究客家女性的記載，從孺人、諡號到女兒入譜，客家女性在家族與社會中地位有很大的轉變，呂玉瑕（2010）加入社會變遷的視角，發現客家女性扮演家庭重要生計角色，擁有的經濟資源可提升家庭權力。

客家婦女的勞動是起於外在壓迫還是出於自願？李竹君（2001）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分析農村中客家女性的勞動經驗，主張農村中勞動階級的客家女性受到父權體制及資本主義雙重的壓迫，展現在客家女性的家庭生活和工作處境中，並從社會建構與權力運作的角度批判加諸在客家女性身上的美德。在鄉間群體的壓力及來自文人的讚揚下，自我剝削的「理想型」勞動人格逐漸被女性自我合理化，內心生出一種內化價值說服自己咬牙繼續成就男性筆下所讚揚的

喜愛勤勞（洪馨蘭 2011）。李文玫（2009）從文化精神分析論述，認為客家女性可能在吃苦的生命歷練中得到救贖與解脫，在順從中「沒有自我」是全然的給出與奉獻，唯有覺察美德背後的壓力來源，才能掙脫束縛找到自由，以上認為客家女性的勞動並非出於自願，美德合理化受壓迫的事實。以下學者對勞動的意義持正面的看法，簡美玲、吳宓容（2010）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客家婦女山歌論述經驗裡的勞動意義與價值，提醒我們女性生命中勞動和休閒不是相對，而是分屬生命週期裡不同的階段。女性從勞動中換取經濟效果中得到價值的回饋，擴大社交圈並獲得更多自主權（潘美玲、黃宜菁 2010）。

1.2.3 性別與勞動

「性別」是社會、文化、心理和歷史的名詞，用來描述人們和他們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工作和行為舉止（江明親譯 2003）。任何特定的社會中，性別系統的發展影響生產的模式、社會上的性別分工，在農業社會的職業結構上，大部分居民從事農業工作，農忙時人力不足，農閒時勞力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商業興起，農村大量青壯男性外出工作，婦女被限制在家庭內，區分了屬於女人的私人家戶世界，以及屬於男人的公共與社會的世界，伴隨公私領域的劃分，勞動被劃分成有酬勞動與無酬的家務勞動，男性從事有酬勞動，主要工作是維持家計，得到較高評價，女性被視為與生俱來要全心照顧小孩，被限制在私領域當中。

從女性主義來看，傳統女性主義認為兩性不平等經歷了三個轉變階段，從生理差異向社會差異的轉變，社會差異產生價值關係，價值關係引出不平等觀念，社會體制是一個男尊女卑的性別體制，從生理上的差別，女性能生小孩，在家庭當中就要負責教養小孩，因此成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男性為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從事的是有報酬的工作，女性則是打理家務，男性所承擔的社會分工被認為是重要的，女性則是次要、附屬，從而是無報酬或低回報的（陸緋雲 2002）。簡言之，社會制度與工作環境複製了不平等的性別關係。也就是說人自出生開始，因性別不同而有不同的社會期待與學習內容，隨著年紀增長，其表現會愈來愈符合社會期待，並被社會接納。社會學提及之角色論，即佔有某社會位置的人應扮演其社會角色，典型性別分工為「男養家、女持家」，導致性別不平等現象。洪玉津（2008）指出傳統性別角色男外女內的空間分化中，有跨越空間和分界模糊的現象，女性負責的「家事」不全然是在家裡，屬於家務的勞務已超出家屋範圍延伸到公領域，代表女性家務勞動概念的擴張，從前

婦女在家帶小孩、煮三餐，農忙時要準備點心，現在的婦女也要一同參與體力勞動。因此，農業生產勞動力有老化及婦女化的趨勢，但農村婦女一直扮演著「無酬家屬從業者」的角色，對於農務的貢獻常隱而不顯（賴爾柔、高淑貴 2007）。

1970、80 年代的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勞力密集的工業社會，教育普及以及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女性有機會走出家庭就業，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女性就業，個人的婚姻狀況、子女、人力資本以及工作態度等因素影響女性的就業生涯。婚姻反映一個性別化的社會過程與社會關係，婚姻中的男女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優先順序，婚姻對女性就業具有抑制作用，對男性反而有促進作用（劉梅君 1999）。外出工作衝擊了原有家庭結構，女性外出工作面臨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工作角色時間之間的衝突，女性工作相對縮短處理家務的時間，對於已婚女性而言，子女數目愈多、年齡愈小，女性花費較多時間在照顧子女，退出勞動市場的機率也較高（簡文吟、薛承泰 1997）。女性就業現象和家庭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家庭生命週期觀察女性進出勞動市場重要時機，伊慶春、簡文吟（2002）實證研究發現，女性脫離勞動市場的時間點主要是結婚和生育兩個家庭階段，待家庭階段性任務結束後，才會重新考慮重回職場。在面臨婚姻、生育時，可能被迫離開工作回到家庭中，或是轉換到彈性上班的工作以便兼顧家庭，女性就業生涯樣貌呈現多樣的型態。因此，在實際行為上，婦女的工作角色十分重要；在意識觀念上，除呈現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情形外，「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仍為女性最重要的本份，婦女的自我認知呈現傳統女性順從及認命的態度（杜素豪 1997）。

王麗容（1995）研究性別分工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發現台灣地區的婦女相當程度有「男主外女主內」的觀點，認為「工作與家庭」價值衝突，以家庭幸福為前提的考量下，降低外出工作的意願。一旦中斷就業，造成人力資本流失，使得再就業時無法進入主要勞動市場，流入次級勞動市場。教育程度、職業、收入與工作經驗構成女性的人力資本，亦是女性是否持續就業的決定因素，游美惠、王百合（2003）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以代課教師的就業經驗為例分析發現，已婚女性的人力資本影響工作選擇，且性別角色的建構影響其人力資本的累積。

周碧娥（1987）提出女性勞動力增加不能樂觀的以為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必須再檢視她們與男性有無職位上的隔離。劉梅君（1999）認為性別職業隔離

是指就業者中性別分布失衡的現象，不同階層、不同產業以特定性別居大多數。婦女被隔離到只是女性從事的職業或行業，以致她們與擁有權力的男性隔離，無法進入以男士為主的權力系統，在權力的分配上屬於劣勢，造成性別職業隔離與男女所得差異的原因有二：一是制度化的，如工作的結構性特徵，社會上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來分配工作給男人及女人，造成男女工作性質有別，且工作所得是被設計於工作性質之內，男女所得有所差異；二是個人的，如雇主規劃或工作者本身勞動力的品質，台灣就業市場的存在職業性別隔離現象，觀察不同行業和職業可發現男女勞動者的分布具有明顯的差異，男性較集中的是資本密集的行業，女性則以勞力密集行業居多（張晉芬 1995）。

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是否影響家庭性別關係？陸先恆、胡美珍（1997）研究資料發現女性就業是決定女性家庭權力關係的主要面向，這種情形如陳玉華、伊慶春、呂玉瑕（2000）研究顯示，就業的妻子比家庭主婦有較大的家庭決策權，當妻子承擔實質的經濟角色時，會提升參與家用支出的決策權，顯示女性個人資源的提升或拉近夫妻資源的差距可改善家庭地位。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就業並未改善家庭地位，女性被定位在低技術性，工作場所離住家不遠，可以兼照顧幼兒、單調又重複性高的工作（徐宗國 1995：19-23），低薪只供補貼家用，就業並未能真正改變家庭的權力結構，反而是雙重的工作負擔。成露茜、熊稟純（1993）研究指出在 60、70 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父權體系與資本主義透過家庭結構、產業組織和政府政策，強化了對婦女勞動力的剝削，婦女成為低酬甚至無酬的生產勞動者。女性鑲嵌在父權與資本主義的勞動體制下，無論傳統工業或現代工業，已婚或未婚，都在勞動市場的底層。大抵來說，女性就業對於家庭地位的改善未有一致的看法。

不同族群之間可能因為彼此來自不同的母文化、或是族群移墾台灣過程中形成不同的適應策略，可能造成家庭型態的差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及就業情況有不同的結果（莊英章 1994）。以農村婦女為例，發現男女工作內容雖因時代而有改變，意識上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依然存在，兩性分工仍維持「男主外，女主內」的方式（杜素豪 1997）。客家族群在農業經濟生產層面十分倚重女子，有別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女性大量參與勞動，在僅靠勞力支撐的農業社會生活環境中的維生式的家庭經濟型態，女人也被要求和男人並肩勞動（房學嘉 1996），客家農村的男性從小得到讀書的機會，長大之後多外出從事有酬經濟活動，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通常也掌握著家庭

中重要決策權，早期客家女性的勞動經驗始於孩提時期，自晨至昏無酬協助家中勞務及農務，嫁入農家後，除了婚前原有的勞動外，還要生養孩子、照顧公婆，此外，女性為了貼補家用，在可以兼顧家庭的情況下，從事有薪的勞動，付出雙重的心力兼顧家庭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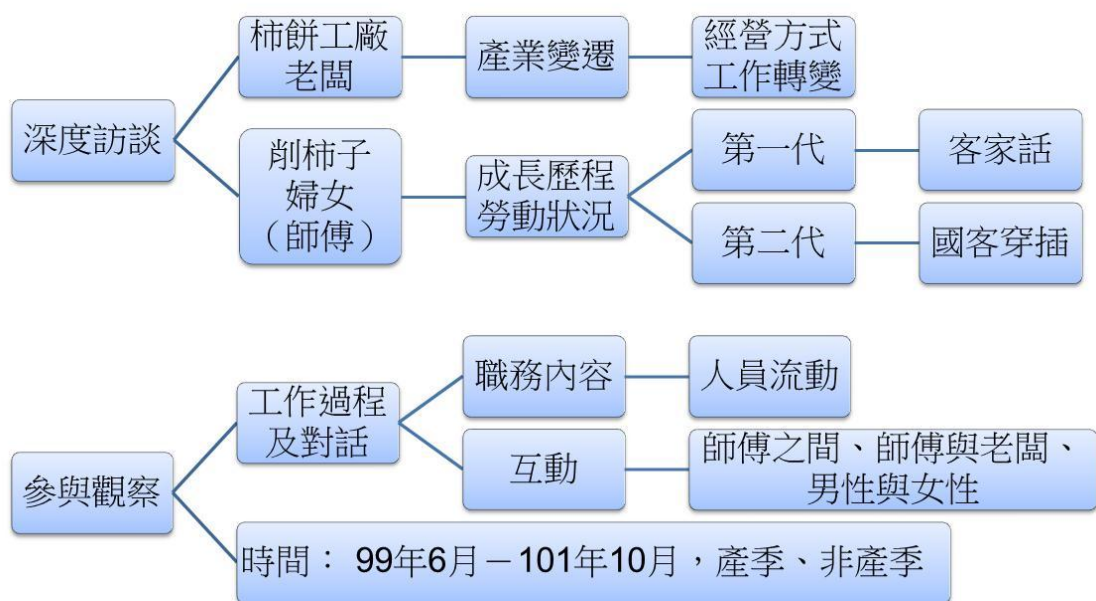
根據以上所述，本文欲呈現在焦點之外，新埔柿餅從產業到文化產業變遷過程、柿農因應外在條件於柿餅製作勞動體制及性別分工的演變、柿餅製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人之勞動意識。勞動意識與道德一般抽象且難以測度，勞動意識外在展現於行為，故觀察勞動情況、社會與生活樣貌為瞭解婦女勞動意識最佳途徑。

柿餅由柿子風乾而成，柿子四斤才可做成一斤柿餅，且以手工製作為主，人力與物料佔柿餅生產成本中極為重要的比重，柿餅的製作過程需要經驗的累積，目前新埔的柿餅加工廠幾乎都是代代相傳家族式的經營模式，勞動力來源主要是家庭內的勞動力與臨時工。在繁複的柿餅製作過程中，分工以性別區分，削柿子的都是女性；負責上架、捏壓的則是男性，且多為柿餅加工廠的老闆及兒子擔任，在柿餅產業當中，可以看到性別與階級之間的關係有相當程度的連結。此也回應許嘉猷（1981）指出以 Marx 學說中的生產工具之有無為劃分階級的作法，可以看出台灣男人多半是雇主，擁有生產工具或可以有權力雇用他人，而較多的女人是集中於工人或小農戶兩個階級。

柿餅銷售量大增，柿餅加工廠的老闆需要更多住在新埔的婦女在每年柿餅產季加入生產行列，對人力需求密集的柿餅產業而言，創造勞動價值與就業機會。但是，對男性而言，勞動的機會並沒有增加，男人與女人勞動增加的程度是不一樣，這與一般認知男性較容易得到工作機會不同，可見性別與階級在這個產業特殊性。我們進一步探問：這樣的工作型態是婦女自主的選擇，還是缺乏其他機會不得已的選擇，這個工作對婦女而言有什麼意義，女性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客家女性除了勞動經驗外的生活經驗為何？以下將分別透過柿餅加工廠業者及婦女訪談資料整理分析來做進一步的探究。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在新埔鎮客家婦女的勞動經驗中，欲深入瞭解每位受訪者的勞動經驗，因此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以參與觀察法進一步蒐集資料。



基於以上疑問擬定訪談大綱，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內容集中瞭解婦女的工作史、結婚、生育對受訪者的影響，另由受訪者自由回溯其成長的歷程及表達個人的感受，以深入了解削柿子婦女們過去與現在的勞動狀況、對於工作的看法。使受訪者能感到輕鬆自在，一開始沒有使用錄音筆，幾次之後，她們能逐漸放下戒心，與我侃侃而談，並接受錄音筆記錄過程，訪談地點是選在她們熟悉的柿餅加工廠、受訪者家中。訪談之後，整理訪談內容並撰寫田野筆記，作為思考、增添問題的參考。為了從內部成員的角度針對削柿子工作情形進行描述，我在柿餅產季進入她們工作場域，角色是扮演觀察者的參與者，記錄師傅工作歷程與生活對話，在研究過程當中，保持開放態度，依據田野所取得的資料重新定義問題，以更多角度來瞭解師傅的想法。

1.3.1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可分為結構式、半結構式、非結構式，結構式是利用分類、排序等研究技術，半結構式是用訪談大綱來進行，非結構式是以閒聊的方式。理想的訪談應該是能夠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並且順著她們的生命經驗，學習與理解另一種異文化的觀點(何明修 2004)。訪談前研究者設計出訪談的架構，準備半結構式的問卷，在訪談的進行有些類似日常對話，由訪談者將對話引至關注的問題，注重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保持開放的態度，配合受訪者的敘述與思緒，再做進一步的提問，除了能夠獲得受訪者關於主要問題的

看法與感受之外，有時還能夠根據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找出新的、沒預料的方向，獲得訪問者先前並不知道的資訊或知識，得到額外的資訊並增加研究的廣度，甚至要刻意留意與自己原先概念架構歧異矛盾或抵觸的地方（劉仲冬 1996：134）。透過口述來採集資料，可以把事件的詮釋權回到受訪者本身，對於沒有書寫能力的弱勢者特別重要，針對老年人、女性訪談，可以讓我們從生活者的觀點研究客家婦女，呈現客家婦女的多樣性（江文瑜 1996：249-266）。

1.3.2 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法的強調「發現的邏輯」，重點是在圈內人所認識的人類存在意義，由內部成員的角度進行觀察，揭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意義，描述現實情境。參與觀察要參與人群的生活，觀察自然呈現的事件，還要保持專業的距離，避免參與些事件，以免影響所研究的活動，研究者保持公平、熱誠的觀察者身分，適當的觀察和記錄資料。柿餅加工一年最多只有五個月的時間，每次前往田野調查時老闆與工人們皆堅守自己的工作執掌，把握這做一季吃一冬的機會，馬不停蹄的工作、忙進忙出，可以說是沒有一刻空閒，在不干擾工作的情況下，進入她們工作的場域，拉一張小板凳坐在削柿子的婦女之間，觀察工作情形，試圖用同理心與他們攀談，由淺入深，從天氣聊到內在想法，獲知他們對工作、家庭與自我的感受，並用錄音筆記錄下來。讓我印象十分深刻也是唯一一次削皮機暫停運轉，我們聚集在電視前面，觀看老闆接受媒體現場直播節目專訪回答關於柿子一斤兩元的議題，為了能清楚聽到電視的聲音，全體員工放下手邊的工作但沒有交談，目光停留在牆上的電視，直到節目空檔現場才開始一陣撻伐，牛心柿一斤兩元，柿餅一斤賣 150 元，別人會以為我們很好賺，怎麼可能？這時刻感覺大夥團結一致，彼此的距離更近。除了上述的觀察事項外，還有削皮婦女之間、女性和男性工作者、女性和管理者彼此間的互動等。

1.4. 研究過程

台灣有句俗諺「寧娶客家女，莫嫁客家郎」，客家女性與勤儉持家幾乎劃上等號，客家的書寫甚少著墨於女性，若有也強化其忍勞負重，性格堅毅，體魄強健，是勞動者的印象。隨著時代更迭，女性受教育機會普及以及社會風氣的轉變，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比例愈來愈高，但是女性也難跳脫傳統角色的設定，被期許能挑起家務工作之重擔，女性出外就業受到教育程度、職業區隔、照顧工作的牽絆，使得她們淪為廉價的勞動力，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客家女性所

處的社會位置，也持續影響著客家女性的勞動經驗，在農村的已婚婦女，多半選擇留在家中，以照顧家庭為主，選擇能兼顧家庭與收入的工作（劉欣芸 2002）。彭桂枝（2003）從戰後台灣客家農村中年女工的工作經驗出發，發現女工的就業以家庭為重，婚後工作傾向追求穩定。另外也發現，負面的工作經驗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計件制的運作方式，正面的工作經驗來自於女工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所帶來的自我肯定感。

柿餅產季需要大量人力，柿農會聘請工人，工人們都稱柿農為老闆，老闆則稱工人們為師傅，本文以下所稱的老闆就是柿農。在柿餅產季到新埔鎮旱坑里柿餅加工廠觀察老闆及工人工作情形，非產季時也會到柿餅加工廠與老闆聊聊，以期獲得更豐富的田野資料，觀察期間從 99 年 6 月到 101 年 10 月，我去了三個規模較大的柿餅加工廠，訪談兩位新埔旱坑里歷史悠久且第三代完全接手柿餅加工廠的老闆，欲了解過去到現今柿餅加工業、師傅工作內容轉變，再以老闆為牽線人，訪問 12 位削柿子婦女，在採樣的過程當中，儘量涵蓋不同面向的對象，以瞭解整體結構。本研究以削皮的方式區分婦女的世代，1988 年削皮機器出現為分界點，機器出現前為純手工削皮的第一代婦女，當時一位能以純熟的手工快速削完柿子的女工十分搶手，在柿餅季前老闆就會「下訂錢」以確保人力來源，其工資的計算方式是計件制；機器出現後以機器削皮的婦女為第二代，老闆重視的是員工能否配合削皮機器速度及柿餅季的人力需求，其工資的計算方式是計時。

第一代婦女共五位，三位已退休，她們年齡平均約八十歲，口語表達以客家話為主，故全程以客家話訪談，第二代婦女共七位，訪談過程穿插使用國語和客家話。第一代婦女年紀長，在家中不缺乏金錢的狀況下，柿餅季時仍有兩位繼續到柿餅工廠上班，勞動觀念是否已經內化至她們的心中？第二代婦女是機械化之後才開始接觸柿餅加工，屬年輕的一輩多有國中畢業，學歷較高，許多工作機會可供選擇，卻同樣把季節性的削柿子工作當作一年當中主要或者唯一一次有酬勞動，其背後的原因讓人好奇。客家婦女向來以勞動形象著稱，但是工作與家庭中的勞動配置會隨著生命各階段歷程而不同（張慧君 2009），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客家農村婦女的勞動經驗，透過分析瞭解在她們生命歷程中削柿子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削柿子的女性多為新埔當地人，新埔柿餅產業變化在她們的生命歷程中也相對重要，以新埔當地柿餅產業變化作為背景，觀察兩個不同世代的婦女各階段生命歷程中有何轉變，期望從她們的生命經驗史來

發覺客家婦女的特性，研究問題分列下：

- 1、柿餅產業從過去到現在生產人力配置、薪資計算方式的轉變及性別與階級的連結。
- 2、客家女性如何看待生命中不同階段「削柿子」一事所代表的意義，探究兩代婦女的生命歷程與差異。
- 3、觀察客家農村婦女的勞動經驗，找出婦女們的勞動意識，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綜上所述，本文要以新埔鎮的柿餅產業中負責削柿子的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兩代客家農村女性勞動意識及勞動經驗差異，勞動是否影響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企圖能透過本文表達她們的心路歷程，以彌補客家女性無聲之憾。

1.5. 章節安排

本論文主要架構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介紹研究動機、研究進行的方法、研究過程與文獻回顧。第二章寫新埔地區柿餅產業，介紹新埔歷史與柿餅製作過程、柿餅產業勞動體制以及政經變遷對產業的影響，婦女在產業中的勞動參與。第三章分別陳述兩代婦女自幼至今的勞動過程，不同角色下婦女在家庭與工作的勞動狀況，並比較兩代之間的異同。第四章自女性化的勞動價值切入，觀察婦女勞動意識。第五章從不同面向觀察婦女在工作和家庭兩者間如何取得平衡，並歸納出工作對婦女的多重意義。第六章為結論與研究限制，提出本論文的研究意義與研究面臨的限制，並提出未來對削柿子婦女延伸研究方向，供後人參考。

二、新埔地區柿餅產業

新埔柿餅產業在削皮機器出現後分工型態轉變，連帶左右柿農聘請工人的方式、給薪方式，這些都會影響工人的勞動型態和意識，所以要探究削柿子婦女的勞動，需熟悉柿餅製作的勞動過程與分工以及柿餅產業的網絡，本章主要說明柿餅產業結構以及社會轉變對產業的影響，如果我們要瞭解新埔柿餅業的現況，需要把柿餅產業的發展放入政經變遷下，才能進一步研究柿餅產業的性別分工及工作內容的改變。第一節介紹新埔歷史背景，第二節說明新埔柿餅的起源，第三節介紹柿餅製作過程和觀察世代交替前後產業特殊的網絡，第四節說明柿餅產業中婦女的勞動參與。

2.1. 柿鎮新埔

2.1.1 新埔的自然環境

新埔位於霄裡溪及鳳山溪二大溪匯流，地形屬河谷沖積地形，海拔多在 300 公尺之下。丘陵地形佔新埔三分之二面積，北方丘陵重疊，連接湖口台地。南方至出自關西之山脈，西走至犁頭山而止，周圍環繞青山，南北兩山脈之間，形成寬約一點五至二點五公里之狹小平地，其間闢成東西向長約二公里之鎮坊，為本鎮交通、文化、商業中心，亦為農產集散地。

2.1.2 新埔的人文環境

新埔鎮位於新竹縣的東北方，土地面積約 72 平方公里，新埔鎮位於新竹縣之東北方，鎮中心距縣治竹北市約 7 公里，距西南方之新竹市約 14.5 公里，南連芎林鄉 3.5 公里，東接關西鎮約 12 公里，北與湖口鄉、桃園縣楊梅鎮毗連為縣界，東北至桃園縣龍潭鄉約 15 公里。全鎮長約 16 公里，南北寬約 10 公里，總面積約佔 72 平方公里，約佔新竹縣總面積之百分之 5，僅次於尖石鄉、五峰鄉、關西鎮，在 13 鄉鎮中排名第 4，總人口數約 35,000 人。新埔鎮有 19 個里，本研究柿餅產地地位於旱坑里，人口數約 2200 人¹。

¹ 資料來源：新埔鎮戶政所 101 年 5 月新埔鎮人口統計報表。



圖 1 新竹縣新埔鎮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新埔鎮志，1997。

2.1.3 拓墾發展歷程

台灣近代史可分荷西、明鄭、清代、日據、民國五個時期。清治時期之前新埔地區沒有漢人居住，康熙年間，新埔被劃分在諸羅縣內，據文獻記載，新埔的開發應起自 1725 年（雍正三年）廣東惠州府陸豐縣人徐玉生、劉延章和嘉應州鎮平縣巫阿政、賴開台、賴永傑、賴用慶等人來新埔開墾。渡台路線從中港（香山、竹南）登陸經竹塹社、新社至枋寮，另一路從紅毛港（新豐）登陸，墾拓的方向由西朝東，逆鳳山溪而上(參照圖 2 清代台灣省行政區域圖)。原住民的番社多達 71 社，新埔位於竹塹的東北方，1747 年（乾隆十二年），從竹塹社移住新社之道卡斯族人衛什班、頭目衛開業帶來了從漢人處學來的農耕技術入墾此地。地名源由為「吧哩國荒埔新墾成之埔地」，故得稱。1761 年（乾隆二十六年），竹塹地區建土牛溝，新埔為「保留區」，新埔客家人早已進入「保留區」墾耕多年，此時其實為漢番並耕時代（圖 3 清代竹塹地區土牛溝和番界圖）。1776 年（乾隆三十一年）業戶引宵裏溪水灌溉，宵裏溪以西地區，大部開闢。1781 年(乾隆四十六年)，客籍人士入墾，六十餘位廣東陸豐客家人，入墾枋寮，以伐木與採集樟腦為業。1784 年（乾隆四十九年），鎮平人進墾新埔，與「番」雜居，建新埔庄（盛清沂 1980）。1790 年（乾隆五十五年），土牛溝東移，稱為「番界」，新埔由土牛溝以東轉變為番界以西。新埔沒有官隘，顯現出並無顯著的生番危害，故也是鳳山溪中游能迅速發展為竹塹以北重要市街的原因（張翰壁 2008）。另一方面來看，官隘少也表示此區開墾多依賴民間力量，

因此造就此區域在地勢地的崛起，墾號、墾佃，成為新埔開墾的主導地位。



圖 2 清代台灣省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新埔鎮志，1997



圖 3 清代竹塹地區土牛溝和番界圖

資料來源：施添福 1992。

竹塹社人或缺乏資金，或無力耕作，或養贍埔地離社太遠，便紛紛違法典賣或租予漢佃耕作，在此情況下，新埔漢人之拓墾日益擴展，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竹塹社土目衛阿貴招粵人為佃，由新埔進墾大旱坑，漢佃在此架造房屋種竹栽果，竹塹社通事表面招攬漢佃實則進墾，改變了粵移民與竹塹社人的關係，佃戶的身份逐漸轉變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買主（曾春鏐 2003）。

便捷的交通是移墾社會商業發達的最基本條件，新埔位於鳳山溪中游，是由山區進入平原的緩衝地帶，竹塹城往台北的陸運道路之一南北官路必經新埔，輔以東西向的鳳山溪，使得新埔成為貨物流通的腹地，形成小市集，居民的經濟產業活動以農業為主，初開發於清雍正年間，乾隆末年，新埔街一帶已繁榮成一小市街，清嘉慶年間以後，新埔開發面積大增，農業發達，盛產茶、蔗糖、樟腦等三項經濟作物，而其大多再經由大崙崁、艋舺、滬尾等港口輸出，因此新埔成為此三大經濟作物的集散地，為聯絡港口市街與內山南北要道的東西向交通網絡，當時商旅雲集，商業鼎盛，清朝末年一度和竹東、竹塹並稱新竹三大地區。商業發達促成移墾社會專門生產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蔡淵潔 1985），新埔在日治時期前為新竹地區的重要農產運銷中心，其中椪柑為主要的經濟作物，採收之後挑到新湖口去賣，二次大戰後，因政局不穩外銷受阻，加上柑樹樹齡已老，質量皆走下坡，農民欲汰舊植新，卻遭到「黃龍病」侵蝕，橘子樹全面枯死，新埔椪柑走向沒落，此時，柿子適時遞補，柿餅成為新埔的主要產業（劉還月 2000：283-298）。

2.2. 新埔柿餅的起源

「七月石榴八月梨，九月柿子黃了皮」，每年九月初秋是柿子採收的季節，前後為其長達兩個月之久。柿子性寒，可清熱止血，主治肺熱咳嗽，柿霜潤肺，可用於咽乾、口舌生瘡等病症，柿餅和胃止血（李成衛、張明泉 2005：63-67），因柿子不利保存，多加工製作成柿餅，為中國傳統的食物，在曬的過程中能保留柿子原有的養分，又能益脾開胃，柿餅外皮的白色甜甜粉末稱柿霜，能清熱化痰（石玉鳳 2003：82）。

大陸、日本皆有生產柿餅，不過因氣候、作法與技術不同，做成的形式也不同。早在清朝移民來台前，在大陸就已經有柿餅的製造技術，隨著祖先遷移到台灣而把技術帶過來，柿餅在台灣製作的歷史至今約有 170 年。台灣各地製作柿餅的地區有：新埔、北埔、關西、苗栗、嘉義等地（詹益晃 2001）。新埔

製造柿餅產銷的歷史，約始於日治時期，全台灣每年生產近 200,000 公斤的柿餅，95%來自新埔鎮，新埔做柿餅加工的有 27 家，其中 24 家在旱坑里，現在做柿餅的多為第三代（陳佩周 1995）。

新埔種植柿子樹的情形非常普遍，但不是主要作物，而是額外的報酬，新埔柿餅產銷班班長劉興成表示早期土地寬的時候不會種同樣的作物，農民會分攤風險，主要種植可以賣的作物，另外種個三株五株柿子樹，當時主要經濟作物海梨一斤不到十元，柿子一斤可以賣十幾元，若遇到柿子盛產，農民就能把柿子拿去賣得大筆現金過個好年，足見柿子在農民的心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新埔生產柿子但產量不大，早期農民擁有製作柿餅的技巧，不會年年都做柿餅，柿子的產量與經濟狀況影響他們當年製作柿餅與否，自己家的柿子產量大或者是有錢向別人買柿子才會做，沒有錢就幫別人做，當時他們會到盛產柿子的地方—北埔去做柿餅，在柿子產地搭簡易工寮、棚架、茅草屋，在那邊削、賣，因為柿子很重，若要把柿子從北埔、橫山以人工一擔一擔挑到新埔加工，十分費時也容易碰傷柿子，造成損耗，後來新埔柿子多了才回來新埔製作柿餅，早期為小量製作，原因有二：一是技術，無法克服天候影響，產量不豐；二是產銷管道並不廣泛。早期製作柿餅依賴風吹與日照曝曬，柿餅產季集中在秋初到來年一月，天氣左右老闆的利潤，幸運的話可以做一季吃一年，最糟糕的一年是曬二十幾天就結束，農民苦不堪言，說是看天吃飯一點也不為過。

2.3. 新埔柿餅產業網絡

根據勞動理論研究學者 Burawoy 的定義，「勞動體制」泛指規範整體生產過程的制度，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生產的政治性規範工具(例如，生產過程的薪資制度、工作規則、獎懲及升遷制度、國家法令等)，另一個部分是勞動過程裡制度性安排所形塑出勞動者的勞動主體意識。以下透過實際的田野參與及觀察，勾勒出柿餅加工業勞動體制的樣貌及婦女的勞動參與。

2.3.1 製作柿餅勞動過程

農民種植柿子，柿子不易保存，定居在新埔鎮旱坑里客家人善用天然資源，並依靠著祖先從大陸帶過來製柿餅的技術，把柿子製作成柿餅，製作柿餅的地點就在柿農家中，早年以石柿製造柿餅，屬質地堅硬帶著苦澀的硬柿，通常春天開花、接近夏天結果，柿子生長怕潮濕的南風，若南風不強、生長情況較好，

連帶的增加柿餅產量。首先從柿子樹上採下柿青，一擔一擔挑回加工地，按大小、等級簡單區分，選擇合適的柿青用小刀挖掉柿蒂修成圓形，用樟木刨刀削去外皮，削皮時整個表面所削的皮要厚薄一致且一刀到底不中斷、不能重複，因為重複削皮的地方水分流失比較快，若沒有馬上乾燥會褐變，賣相不佳影響銷售量，削皮後需檢視是否有果蠅或是蜂疤，接著把柿子蒂頭朝下排列在直徑約三尺的竹篩上，再將擺滿柿子的竹篩抬至柿棚上，接受烈日曝曬及九降風風乾，當時使用煤球加熱烤柿餅，烤柿餅的目的是將柿果表面的水分吸收，防止果肉的氧化，且煤球中硫的成分可殺菌，延長儲存壽命，如果北風強，從柿青到含水量約百分之 45 到 52 的柿餅約需要七到九天左右，在這七天當中，需要逐一翻曬與三次捏壓以加速糖化作用，並為柿餅造型，若未得捏壓步驟的要領，可能將柿果壓破，故必須經驗老到的師傅才能夠勝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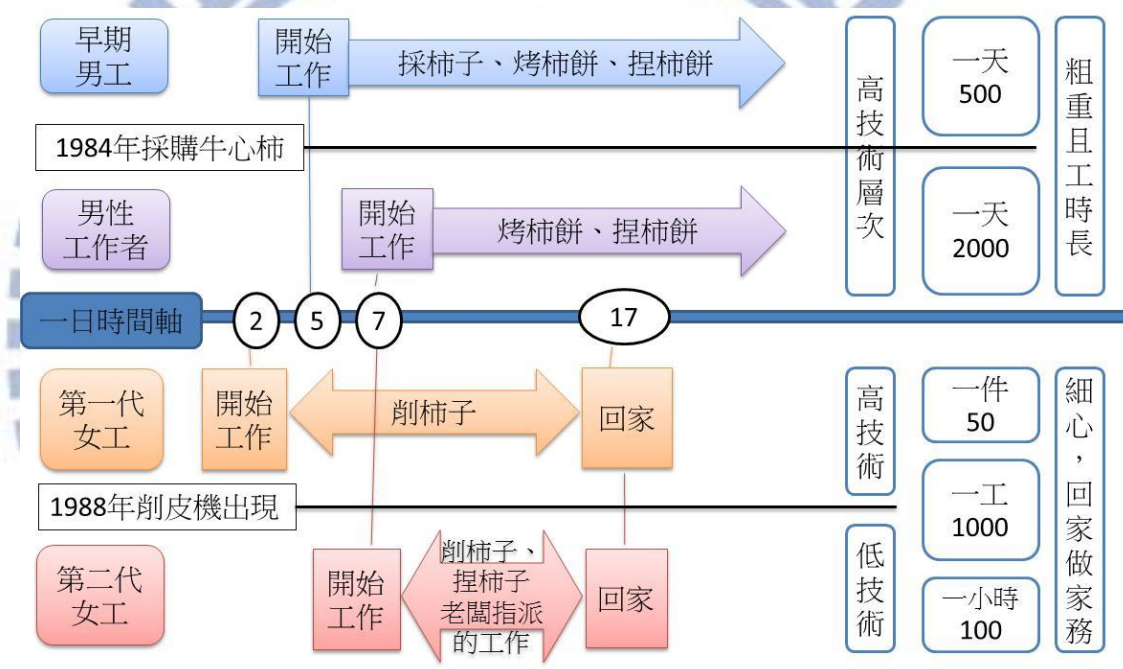
柿餅的產季最長有五個月，非產季的時候，柿農家庭中男性從事開墾耕耘等較重之勞務，婦女則從事除草及其它較瑣碎的工作，雖說柿餅是做一季吃一冬，但影響柿餅產量因素太多，利潤多寡不定，柿農會做其他的工作來增加收入，以前沒有怪手，柿農照顧果樹剩餘的時間就會去賺外快打零工，例如疊駁坎、用水泥蓋房子，當時在鄰居之間會換工節省支出，但換工的情形僅限於做柿餅之外的工作。

80 年代這邊有換工，我這邊要蓋什麼鄰居就過來打工，像是整理院子，蓋豬舍、疊駁坎、蓋房子（A 柿農訪談稿）。

以前有換工的情形，表示我不必拿錢出來，有些人很有趣，你叫他拿兩千元出來，他不願意，叫他來工作，他會覺得賺了兩千元，有這樣的習俗演變，做柿子的沒有換工（B 柿農訪談稿）。

農民自己種植的石柿供不應求，開始對外採購柿子，當時交通不便，只能向新竹縣的關西、橫山、竹東等柿子產地購買，好的柿子十分搶手，柿農在不破壞交情的情況下，在同一地採購柿子表面輕鬆，看似兩個人面對面聊天，事實上眼睛直視前方道路，隱隱約約看到對面有人挑擔子來，二話不說走上前去，誰先摸到他的擔子或腳踏車，就可以跟果農談價錢，鄰居會跟過去看但不會搶標，大家有特殊的默契不會破壞鄰友情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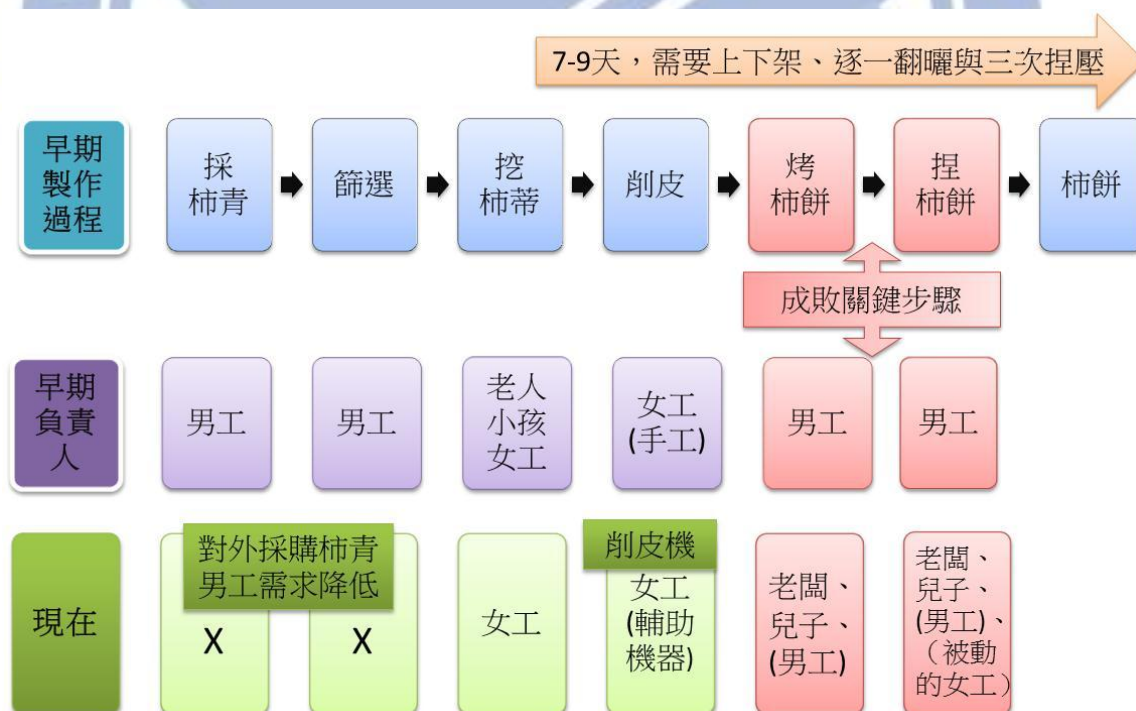
製作柿餅的過程非常繁複，是高度勞力密集的產業，削柿子分為削柿蒂、削皮，削好之後抬上柿棚受風乾日曬，傍晚收入室內，隔天早上再上架，反覆七日，期間經常要移動與三次捏壓，每個步驟全賴人力，勞動成本在整個柿餅產業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一般來說，柿農多為小規模生產，勞動力來源都是自己家人，家中老小全部動員，小孩負責挖柿蒂，大人負責後製，柿農家庭的女性，在柿餅季節時以家庭勞動力的型態工作著。若家中人力不足會請臨時工，臨時工在至多五個月的柿餅產季當中勞動密集，沒有平日與假日的區分，會來工作的都是同樣在家中務農的鄰居、親戚，柿餅業所需的各種勞動力，除了這段時間之外，柿農無法提供工作機會。



臨時工分為男工和女工，男工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先做工作，六點吃早餐，吃飽將擺滿柿子約 25 斤的竹篩上架，就要上山採柿子，由於路途遙遠，還要帶午餐的便當，一天只能來回山上到柿餅加工廠兩地一趟，採一擔 100 多斤柿子挑回來，四點多回到家裡，接著捏壓柿餅、烤柿餅，晚飯後幫柿餅整型，直至做完，差不多九點十點放工，男工工作內容粗重且工時長。男工薪資計算方式是計工，一天有 500 元，70 年代工廠上班差不多一個月有 9000 元，相較之下做柿餅的男工比工廠上班的人工資還要高，實則用時間換金錢。另外，三次捏壓柿子手勁與方法各不同，具技術性，因而男工的薪水比女工來的高，男工

來自務農之餘有空的鄰居，原本是過來賺外快，幫忙十幾年之後有經驗，習得製作柿餅的技術，就回去自己家開柿餅加工廠，因此新埔成為柿餅加工專業區，對於女工的需求大增。

女工主要工作是負責削，早上削，削好馬上曬，若北風天霜風很大，下午也能削，否則下午有空多是幫忙捏柿餅，中餐由柿農供應，傍晚回家，工時固定。女工薪資計算方式是計件，能者多勞，一簍為一件重 50 斤，有分為挖柿蒂和削皮，削皮的薪資比較高，女工計件的原因是算工很難抓，對動作快的熟手來說，算工不公平，計件也有獎勵的意味，不會偷懶就能多領一點薪水，勤快的客家女性天氣好的時候，凌晨兩三點就上工。早期柿餅季時較為特別的就是柿餅寮，受限於地理，交通等因素，柿農會在柿子產地搭簡易工寮，提供三餐，工人們晚上就睡在工寮，遇到天氣不佳不能做柿餅時才回家，因工寮多位在偏僻且人煙稀少的地方水電不便，工人們要與不熟悉的人共住一室長達一個柿餅季，可以說是一場生理和心理耐力賽，若非不得已不會願意到柿餅寮做柿餅。





挖柿蒂
資料來源：劉興武



早期婦女圍坐在一起手工削皮
資料來源：劉興武



用樟樹根做的削皮刀，手工削皮一刀到底不中斷
資料來源：劉興武



柿餅接受風乾日曬
資料來源：劉興武



捏柿餅
資料來源：劉興武



從柿子到柿餅
資料來源：劉興武

削柿子的刀具、方式和現代削水果不一樣，從前使用半彎形木柄削皮刀，刨刀的握把用樟樹根做成，刨刀的刀刃成分是銅加上鋼，鋼能增加刀片的鋒利度，刀片可透過敲銅鑼發出的聲音來分辨品質，聲音清脆的品質較好，80年代一片刀片的價格和男工一天的工資一樣要 500 元。因為每天削的量很多，刀片愈來愈鈍，兩三天就需要磨一次，柿農當時還有聘請專門磨刀片的師傅在柿餅加工廠待命。對削皮師傅來說，刀片越鋒利，削起來的皮越薄，會讓削皮的速度變慢，剛學的女工很怕磨刀片，刨刀削一兩天後，刀片的間隙變開，削起來的皮比較厚、比較好削，速度快，等到師傅重新磨之後把間隙調回去，比較窄、不好削，因此女工們會想要佔用好削的刨刀，亦有把刨刀帶回家或者是藏刨刀的行為。削柿子皮的方式是一刀到底不中斷且每個角度所削的皮要厚薄一致，才能做出好吃又美觀的柿餅，約十幾秒鐘熟手就能俐落地把一個柿子削淨，這樣的好手藝並非天生，他們在學習削柿子的時候吃了許多苦頭，並不是隨時都可以學削柿子，因為柿子的成本高，必須在北風很大的時候，柿子較快風乾，以降低學徒沒把皮削好造成的損耗。柿農一旦知道誰會削皮這項技能，很快就會去找她來削，今年柿餅產季結束之後，為了確保明年人力，有「下訂錢」的習慣，柿農在這一季最後一天，吃飽之後發工錢時，再多給 3,000 元，為明年的訂金，訂金不會從來年的工資裡扣除，以建立固定班底。若工人不收訂金，代表不敢答應，亦即明年不一定會來做，柿農藉此能明白工人的意思，心中對於來年的人力狀況有一個底，在這裡可以看到老闆相當看重師傅的手藝，女工有機會選擇要到哪裡工作。和捏壓柿子相比，削柿子較費時，老闆對於女工的需求大於男工，敬業的削皮師傅十分搶手，若住比較遠，老闆會開車載他們上下班。

雖說薪資算件是各做各的，能者多勞，但是無形之中會有競爭，比誰較早到，誰削比較多，女工們在有限的時間內想要多削一些，除了讓技術更加純熟之外，他們會從其他的方面著手，大顆的柿子比較好削，早來的人會把一籃籃看起來比較大顆的柿子拉到自己身邊，而老闆為了避免這樣比較的心理，也有因應之道，就是在挖柿蒂的時候把大顆的放旁邊，再把大顆的放到每一籃的最上面，讓每一籃看起來都一樣大顆。師傅工作時會嘻嘻哈哈的聊天，讓工作有趣感覺時間過得快，所以削皮的場所又叫「是非圈」，從這我們可發現，削柿子工作也提供婦女某種社交管道，他們交談著彼此的生活經驗與做人的道理。

在程序繁雜的柿餅製作過程中，早期分工以性別為主，除了生理上考量外，

另有一個重要因素是男工工時太長，女性有許多家務要做，傍晚就得回家，沒有辦法配合。在生理差異與社會建構下，男性從事技術性的重要工作，女性則被認為論件計酬的廉價勞力，是對性別分工的一般看法。削柿子的都是女性，負責上架、捏壓的則是男性，且多為柿餅工廠的老闆及兒子擔任，性別與階級有相當程度的連結。

2.3.2 世代交替

日本時代新埔柿餅第一代賣的柿餅是已長柿霜的乾柿餅，因當時沒有冰箱保存，農民在竹簍內鋪麻竹殼再放入柿餅，約半個月數量達到一牛車後，一次將載滿一簍簍柿餅的牛車拉到台北賣。在 70 年代，柿餅產業第二代接手，依照父親傳授的技術製作柿餅，全程手工製作，天氣好時一天可生產約 200 斤，當時的柿餅損耗率約五成，下雨天損耗達七成，產量不多，價格相對來說偏高，柿餅一斤批發價格為 220 元到 250 元，屬於高級禮品，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的水果商會特地包計程車前來至各家柿餅加工廠收購，轉手到小販手中一斤 350 元，到 80 年代，新埔鎮還非常少人吃柿餅。

由於柿餅的製作過程需要經驗的累積，目前新埔的柿餅加工業幾乎都是代代相傳家族式的經營模式，但是接手經營者卻不一定是從小就有傳承家族事業的認知。

小時候跟兄弟拼削蒂頭，削皮是大人的事，挖完有空就撿種子大家都會玩，在柿子架下面打混，晚上收架要烤的時候爸媽就叫幫忙搬，很簡單，或者是移動地方。小時候也是很怕以後要接，因為我們在這裡做，鄰居的小孩家裡沒削柿餅的在馬路玩，我們非常羨慕，說長大不要做這個，年輕的時候不想要做這一行，上班多好，接手之後就想說好好的做（A 柿農訪談稿）。

小孩子削蒂頭，傍晚收柿餅，晚上要捏柿餅、做柿餅、烤柿餅，明天早上火力集中在削，國中之後，柿子都是我在端，我的手臂跟別人的腳一樣大。捏工很重要，是我耳濡目染就會，讀書的時候，早上天氣好我就幫忙端，傍晚就幫忙端，晚上我就削花萼。我要做這個部分，不然就是我媽媽做，我在父母親的心中是懂事的小孩，除了當兵我沒有離開家裡，所以我會接這個產業是水到渠成（B 柿農訪談稿）。

當時受教育的機會漸普及，他們讀高中時心中思考著自己的未來，或許到外面上班一陣子，但在產季時看到年邁的父母忙進忙出，心中使命感與愧疚感油然而生，進而決定要接手家中事業，成為第三代接班人。第二代的想法是遵循古法，守舊地年復一年製作柿餅，第三代受過較高教育，想法會有一些改變，且外在環境改變，接手的第三代與第二代之間的落差因而加大，第三代希望能將所學應用至生產製程上，透過技術提升產量、開發新產品，在改革的過程當中，已交棒的第二代心裡著急但多保持開放的態度，讓第三代能盡情發揮。新埔柿餅產業結構在改變，主要的影響因素有：

1. 國際情勢轉變

70年代末期政府積極爭取加入WTO之後，政府開放農產品進口，農產品價格下跌，面對大陸柿餅低價銷售的競爭威脅，新埔柿餅產業受到嚴重影響，農民感受到明顯的衝擊，柿農開始思索轉型之道，自挑選好品種的柿青開始，提高柿餅品質，和大陸貨競爭，連帶改變銷售管道，這就是今天新埔柿餅自產自銷概念的起源（彭作奎 1995:21-23；李煜梓 1991）。

2. 交通發達、設備改良

柿農感到自產石柿產量有限，且因石柿果肉組織緊實，水分較少，看起來小賣相不好，礙於當時加工技術不佳，石柿水分少加工時比較沒有損耗，才以石柿為主。後來，交通發達運輸便利，1984年從苗栗、嘉義買進牛心柿，嘗試用牛心柿做柿餅，牛心柿果實較大、水分多，製作柿餅不易，經過兩年反覆嘗試才成功做出牛心柿的柿餅，牛心柿做成的柿餅很大顆能吸引人，市場對於牛心柿的反應佳，輔以原料牛心柿產量豐來源無虞，進而提高牛心柿柿餅的產量。有鑑於手工削柿子需大量人力，但拼件壓力大，削皮師傅不好找，女工薪資計算方式改成算工，80年代新手從一天600元起跳，薪資隨技術成熟度增加，若是有技術的熟手，一刀到底不重疊，最多可以到1,000元，如此一來人力成本增加許多，柿農便開始尋找取代手工削柿子的方法，1988年削皮機研發成功，原本整顆需要手工削的柿青，只要負責削柿蒂的工人—「頭手」先挖掉柿蒂，另一個人把柿青放上削皮機，不消三秒一顆削好的柿子，便隨著管道滾落到竹篩上，兩三個人坐在竹篩邊拿起來一一檢驗是否削乾淨、辨別碰傷後就可以整齊排列在另一個竹篩，一台機器一天可以削1,500斤，自此之後所有柿農都引

進削皮機，手工削皮景象已不復見。



左邊比較大顆的是牛心柿；右邊是石柿
資料來源：劉興武

1989年成功研發烘乾機，讓原本極度依賴自然風乾的柿餅，變成可以不受天候影響，加上政府積極推廣地方觀光，柿餅從原本產量少、價格高的奢侈品搖身一變，成為量產商品（黃瀚瑩 2005）。機器設備的研發及運用影響柿餅產業，削皮機出現後柿餅由純手工削皮改為機器量產，烘乾機讓柿餅生產依賴天候條件的程度降低，品質更加穩定，只要有原料柿，就能生產出柿餅，當時有些柿農認為設備都已投資，索性衝生產量為主，只需四五天就能把柿子做成柿餅，還把價格往下壓搶小販，柿餅產銷量增加，柿餅的價格大為下滑，使用機器設備的前七八年十分賺錢，但靠機器生產的柿餅糖化作用不足，口感及風味比不上以前的柿餅，不受消費者青睞，漸漸的營運開始走下坡，若想要生存下去改變生產方式、轉型觀光勢在必行。

3. 國家經濟政策推動觀光

政府將企業化經營與產業競爭力訂定為政策目標，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989 年起推動「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推廣地方特色產品之行銷，開始發展各個鄉鎮的特產文化，提倡「一鄉一特產」，以提高柿餅生產效率與品質，促進產業升級及轉型。具體措施包括：推行產銷班制度、推動農業自動化、扶植核心農家參與高價值農業及鼓勵曾受農業專業訓練的青年從事現代化農業等（劉昭吟 2005）。2002 年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積極發展活化地方特色產業，帶動產業轉型發展。現在新埔柿餅加工業轉型觀光最為積極兩家負責人都曾經參加過農業八萬大軍的訓練，上課內容影響他們家中產業的經營方向。客委會及地方客家事務機關為了彰顯各地客家不同風貌，1998 年開始在新竹縣定期舉辦「柿餅文化節」，除提高柿餅產業能見度外，也吸引觀光人潮，柿餅銷售量因而大增。農業政策改變、國際經濟環境變動，為新埔柿餅業帶來很大的影響。新埔鎮柿餅 2006 年年產值約一億元，後來擴大舉辦「柿餅文化節」，設計柿餅包裝、強化行銷，到 2010 年當年產值接近三億元，可以看出柿餅業已成功從農業轉型觀光產業。

2.3.3 自產自銷

現在旱坑里的柿餅銷售的管道分為批發和觀光零售兩種，批發是從前沿襲下來的，對某些柿農來說製作設備改進只影響產量與製程，銷售管道不變，雖然政府積極推展觀光，但轉型觀光也要場地與人力可以配合。以下為新埔柿餅加工業轉型最為成功的兩家：

味衛佳柿餅負責人劉理鑑 1980 年接手之後，把後山的橘子挖掉改種柿子，其理念就是好的原料才會有好的柿餅，堅持用傳統的方法製作，降低大陸劣質柿餅衝擊，寧願做少一些把品質提高，不要惡性競爭，以前山上種植柿子樹採粗放方式，石柿樹個頭高不好採收，現在柿農整治施肥，個頭較矮。石柿子跟牛心柿相比，用石柿做成的柿餅吃起來甜又有嚼勁，口感勝過牛心柿，雖目前柿餅加工以牛心柿為多，但老顧客喜歡吃石柿，石柿慢慢有恢復的情形，產量約佔十分之一，現在山上種植的作物當中，石柿佔八成、牛心柿一成、筆柿一成。業者回復古法製作柿餅，搭起柿棚，一一把竹篩上架，在陽光下一顆顆黃澄澄的柿子，吸引大量觀光客及媒體前來，遊客能到山上和柿子合照，在園區品嚐柿子雞湯、客家菜等，結合人文與創意提升經濟效益，更加確定他們當初

轉型觀光是正確的。

我有去上八萬農業大軍的課，教授說農業將來會走向觀光，我堅持用傳統的，有一段時間老人家的壓力很大，每一家一天生產多少斤，賺了多少錢會互相比較，88年開始有照相的朋友會進來，90年我們就沒有走批發，那時候柿餅也是走下坡，客人的嘴挑，大陸的進來，我寧願做少一些（A 柿農訪談稿）。

金漢柿餅教育園區負責人也是新埔柿餅產銷班班長劉興成在政府推動青年參加農業專業訓練時進入嘉義農專的食品加工科就讀，1993年繼承家業，剛開始接手時和父親一樣批發，不幸被倒帳之後決心改為零售，自己去桃園、新竹、苗栗開發銷售點，漸漸走向觀光零售。為了轉型觀光，以未接手家中事業前所累積的工作經驗，同時改良硬體與軟體，硬體方面把削皮區整理得明亮整潔，將柿餅製造過程透明化，在柿餅加工廠播放音樂，客人鼻子聞到柿餅香味、耳朵聽到音樂；軟體方面加入文化氣息，透過生動有趣的導覽介紹柿餅製作方法、種類、傳說故事等，提高柿餅的附加價值。

我們的師傅去年學會用手工削，客人買的不只是一個商品，若我把人集合起來削給客人看，後期的連鎖反應有很大差異，這是機器削皮不能取代的（B 柿農訪談稿）。

轉型觀光後要求拍照、攝影的媒體絡繹不絕，讓業者的工作內容更為繁雜，好幾次天氣轉陰，原可以直接下架的柿餅，業者卻在心裡盤算著要不要把柿餅收下來，要收多少，哪一些要留給拍照的朋友等問題，在資訊傳播快速的時代，觀光客與媒體提升柿餅的知名度和銷售量，帶來更多收益，在柿餅產地看到柿子樹、柿餅製作過程、拍照留念後，對柿餅有不一樣的情感，遊客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賴守誠（2008）研究發現新埔地區的柿餅生產與加工業者，針對品質建構的相關論述與行動，集中在提升消費者實體產品的感受：安全性、感官屬性、原料內容物、生產地點，以上兩家為成功轉型觀光、自產自銷最佳範例。

柿餅製作成本中原料佔了最大比例，勞動成本屬次重要，老闆若要增加利潤，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在原料柿子盛產期，農會以保障價格向農民收購適

合加工的原料柿，並選果後才能製作同等品質的柿餅。規模大的柿餅加工業者除了自己種之外，對外購買的方式為與大盤商採購及信賴的柿農契作，長期合作易於掌握柿子的品質，一天進貨量約 4,000 斤。柿子品質、等級一致，讓工作內容更為簡化，製作柿餅時節省許多時間，大盤商、老闆、師傅三方得利。勞動成本方面，改變削皮工薪資計算方式，負責照顧柿子的男工不變。從老闆的角度來看，雖說削柿子與後場捏柿子、風乾柿子同等重要，最終目的就是要銷售柿餅獲得利潤，但柿子沒削放一兩天不會壞，再加班削就可以，柿餅照顧好壞才是影響利潤的主要因素，老闆成天忙進忙出，看天氣變化決定上架、下架、烤柿餅等，沒其他事有空才會幫忙削皮，可以感受到在業者的心中，若把柿餅製作的步驟排序，削皮的重要性排在最後。

產季時全家人全體動員，結束後結算，利潤到底如何？兩個業者都表示這份工作的收入只比上班再多一點，但承擔的風險很高，雖然機器設備可以降低天氣影響，但說看天吃飯一點也不為過，在田野調查時發現，柿餅加工廠所有人的心都緊緊著天氣，只要發現灰雲就開始繃緊神經，因為去皮的柿青沾上雨水或水氣，就會發霉腐敗，導致前功盡棄，甚至血本無歸。另一方面，自產自銷的經營方式讓氣候對業者的影響更大，就民國 100 年年底為例，正逢柿餅產季，亦是要大賺觀光收入的期間，經常遇到週末就下雨，天氣不好，降低來客數，連帶的收入也大受影響。

2.4. 婦女之勞動參與

經營方式轉型影響男女分工方式，各業者之間分工方式也不盡相同，分工方式承襲傳統的業者有請男工，男工主要工作內容變化大，原本男工要到山上採柿子，老闆對外採購柿子之後，男工不需上山，留在加工廠負責捏柿餅、上架、烤柿餅，工時減少，需求人數減少，一個柿餅加工廠約需兩到三個男工就可負責所有的捏壓與上下架工作，製作柿餅的過程中需三次捏壓，第一次捏壓一定是男工負責，遇人手不足時，第二三次捏壓會請女工幫忙，業者表示第一次捏壓為「頭遍手」，力道很重要，當柿子很硬時碰一下就會軟熟下去，不能勉強，若強壓肉會變黑，經第二天太陽曬就會像氣球，無法銷售形成損耗，關鍵步驟的「頭遍手」都是男工。男工薪資計算方式和以前一樣為計工，一天 1,500 元，熟手可以領到 2,000 元，實地訪查發現負責男工工作的多是老闆與其兒子，產量大的柿餅加工廠頂多再請一兩個男工。另外一種業者分工方式為請一批固

定人馬，全部都是女性，工作內容、薪資計算方式統一，這家觀光取向的柿餅加工廠一天的工作從打掃園區開始，接著是削柿子、捏壓、包裝、販售、柿染DIY等，最為吃力的上架工作，則由從小就幫忙父母端柿子的老闆一手包辦。

三億元的產值，一斤 150 元計算，有二百萬斤柿餅被銷售，需要八百萬斤原料柿，以柿餅產季五個月、每個月運轉 30 天，一台削皮機器一天至多削 1,500 斤計算，每天有 35 台削皮機運作，也就是需要 140 個人力，且多是女性，田野調查發現有削皮區有兩位男性師傅，都是朋友介紹來的，一位負責挖柿蒂，平日是紡織工廠輪班的技術員，白天有空就會來工作，因為老婆認為他沒上班就在家裡上網，不如出來工作，另一位大哥是隔壁鄰居，原為遊覽車司機，退休之後來工作，負責將柿子一個一個放上削皮機，這兩位男性工作者屬於特例，穿插在一群女性中工作顯得格外醒目。

婦女在新埔鎮上可選擇的工作相當有限，轉型觀光之後柿餅季節時柿餅加工業對於婦女勞動力需求增加，女性勞動力多被削柿子工作所吸納，會來工作的多是中高齡的婦女，從這裡也能看出削柿子這個工作趨向婦孺化，其價值是「計時」的方式看待，削柿子工作技術低，故居於勞動市場的低層勞動位階。婦女的勞動力販售方式看似自由，但忽視了女性在工作中所投入的心力、時間及工作環境的條件。與林雅容（2005）在研究漁村剖蚵婦女在經濟變動下工作認同時的發現相同，研究中提到在漁村當中，當男性被視為主要養家者，女性的勞動參與被視為輔助者，或僅暫時的投入勞動市場，使得剖蚵工作不斷的受到邊緣化與婦孺化，削柿子這份工作亦被定位為如此，削柿子婦女工作所得，僅供補貼家用或零花，而非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三、世代削柿子婦女的勞動

1988 年削柿子皮的機器問世前，會手工削皮的第一代婦女都是住在新埔鎮，五人中有四人住在柿餅產地旱坑里，年齡分布自 74 歲到 84 歲，屬於高年齡層，學歷至多國小畢業，身為客家農村女性，從小被要求做農事、學習手工削柿子，技巧純熟至少需要學習一至二個月，削柿子的經驗至少有 30 年，經驗十分豐富，見證經濟環境、技術改變對柿餅製作方式的影響，自幼至老削柿子對她們而言是生命的印記。第二代婦女年齡分布自 34 歲到 71 歲，資歷最多是 10 年，相對來說流動性較大。兩代婦女平時的角色是全心為家庭付出的媳婦、妻子、媽媽和阿婆，在每年柿餅季時，白天到柿餅工廠工作，晚上回歸家庭，她們的勞動過程以家庭為中心。

3.1. 第一代婦女

第一代削柿子婦女家中都是務農，小時候就必須分擔家中的農事，會手工削皮的人多是小時候去幫人家削，或者是嫁過來旱坑里後才學，削柿子工作曾家庭因素中斷，多等到孩子上國小能自理之後，他們又重回削柿子的行列，直到退休，對她們來說生命歷程中每個階段的削柿子有不同的意義。第一代削柿子婦女社經背景表列為表 1。

表 1 第一代削柿子婦女社經背景

	族群	年齡 出生年	教育 程度	婚前工作	婚後工作	丈夫工作	是否 還有 削
A	客家	84 1928	日本教育 漢書	茶園、農事	家事、農務	種田 種茶	有
B	客家	84 1928	國小 三年	顧家、 耕橘子園	家事、農務	郵局已 退休	沒有
C	客家	78 1934	沒有	採茶、放牛	有工就做	開怪手	沒有
D	客家	78 1934	日本教育	採茶、耕園	採茶、 紡織工廠	耕田	沒有
E	客家	74 1938	國小	採茶、耕田	家事	耕田	有

3.1.1 女兒階段

五位第一代婦女在 1928 至 1938 年間出生，她們都出生於農家，當時的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受日本教育，被迫中斷學業或沒有唸書在他們的口中是很普通的事。

A 是童養媳，六個月大就被養母帶回家，國小讀了三年之後讀三年漢書，A 這樣描述他讀書時的情景：

小小時養母生的孩子死了，我被買來喝母奶，我們當人家的媳婦，他們說：「讀什麼書？讀什麼書？當媳婦的讀什麼書？」常常罵我，日本教育沒有讀畢業，老人家不肯我讀，要我做事，後來去讀漢文，讀三年，當媳婦的很可憐（A 訪談稿）。

相較於 C 沒有受教育機會，看不懂字，D 讀過兩年日本書，A 的教育機會在第一代婦女當中算是最好的，B 家中經濟很好，但受到戰爭影響，國小沒有畢業。

國民小學六年，前三年有去台北讀，我爸在台北上班，讀到三年戰爭劉理鑑的阿公打電話叫我回新埔讀，怕被砲彈丟到（B 訪談稿）

養父母家的經濟狀況不錯沒有減少 A 在家中的勞動，家裡茶園很寬請很多人在自家的茶寮製茶，A 理所當然要幫忙種茶、採茶、剪茶，家裡不忙的時候，在鄰居的介紹之下去學削柿子，婚後孩子大了才開始幫人家削。A 對自己童年是這麼形容的：

小時候住在枋寮，六個月大就被養母帶回家，是童養媳，作別人的媳婦很可憐，要做很多事，我做工比較多，若不做，當媳婦的會被人念。（A 訪談稿）

從前農業社會裡有習俗會把女兒賣或送給別人作養女，養女的工作就是養父母家的經濟勞動及家務，C 四個月大就被賣到養父母家，養父很早死，只剩

養母和兩個哥哥一起生活，從小做的工作種類很多，從家裡的勞務到養母對外承接的工作都要負責，沒有受過教育不識字，工作所得全部歸母親所有。C 在訪談中描述到童年生活，養女像是買來的女工一般，由幫人家放牛這件事可以窺得當時生活艱辛，沒有人疼愛，眼淚只能往肚裡吞。

放牛一年才 30 斤糯米和 30 元，米拿回來過年打版（做年糕），我一毛錢都沒有拿到，以前沒什麼東西好吃，割羊筍給牛吃，沒有手套，被割得血淋淋，牽牛回家的路上，牛口渴所以走很快，我拉不動跌倒，小腿被竹子刺很深，竹子拉出來血一直流，回家後我媽媽才幫我擦藥，腫很大，只休息一天，隔天天一亮又去看牛（C 訪談稿）。

年紀稍大一些就上台北去幫別人煮飯一年，之後開始接觸削柿子，自挖柿蒂開始學起，學得技巧後，凌晨三點開始工作至傍晚，季末領到的薪水時全被養母拿走。

我頭頭（一開始）十三歲就去台北，家裡比較貧窮，我去台北幫別人煮飯到十四歲，就回來，就在我叔伯房內，幫他削柿子，要到削柿子的季節，他早上三點就叫我起床，挖柿子的耳朵，北風很大，白天就教我學削柿子，我就是這樣學，很可憐，學會之後，每天三點就起來挖柿子耳朵，白天就削柿子，削一冬三百元，錢被我媽媽拿走，我一毛錢都沒有拿到（C 訪談稿）。

父親在台北上上班，B 在台北的國小讀書，三年級時第二次中日戰爭，阿公怕她們在台北受到戰爭波及，打電話叫一家人搬回新埔，B 開始學習手工削柿子，父親在她 15 歲的時候買一塊地在山上種橘子，從此 B 就以照顧家中農事為主，減輕父母的工作。身為客家農村女性，從小被要求做農事，D 的父親是佃農，D 從小就跟著父親到山上幫人做事，還有採茶，E 從小要幫忙家裡耕田、採茶，會接觸削柿子是因為媽媽去鄰舍叔伯柿餅寮削，E 和兩個姊妹跟著媽媽去邊玩邊學削柿子，會削之後就在旱坑里鄰居家削。

附近很多削柿子的人，所以有空的人就調去學，越學就越會，是鄰居介紹的（A 訪談稿）。

台北回來我就開始學，阿公自己種柿子削柿子，小小的時候我就學用手削（B 訪談稿）。

我住在這個地方，所有人做這樣的頭路才學，別的地方的不必學（D 訪談稿）。

我媽媽也很會削柿子，以前他的娘家房內人有人削，他也去削，我媽媽生五個女兒三個兒子，我當小孩的時候，姊妹裡面三個較大的女兒有和媽媽去削，十多歲還出門削，接下來就不會了，我媽媽削到八十多歲，還在那裡住，電視上還有他，朋友都跟我說你媽媽上電視了（E 訪談稿）。

觀察這五位第一代削柿子婦女，婚前的勞動參與都是農事、家務，是責任也是義務，一天當中沒有喘息的時間，養成她們經常閒不下來的習慣，會接觸削柿子都是因為地緣、人緣關係。

3.1.2 人妻、人母階段

第一代婦女在幼時被動習得手工削柿子這項技能，婚後再次投入削柿子行列的時間，視家中支援狀況而不同，婦女婚後的勞動與婆家環境、丈夫職業息息相關，這些婦女在婚後若嫁得不遠、交通狀況許可會繼續削，婦女在從事削柿子工作時，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家中學齡前的幼童無人照料，將孩童帶到柿餅加工廠中，由自己和其他削柿子婦女一同照顧是當時普遍的情況，另一個方式就是放下這份工作至最小的孩子上學後，才重拾工作。

A 婚後與公婆同住，叔伯也一起住，三房六個妯娌輪著煮，白天打掃。A 沒有生育，姑姑給她一個男孩，又買了一個女兒，30 歲開始挖柿蒂，當時用手工削的時候凌晨兩點出門，婆婆幫忙帶小孩，A 下班回家之後得把家務完成，身為媳婦要不停勞動，每天都忙到很晚。非柿餅產季時，就以澆菜、煮飯等無酬勞動為主，後來搬出去，與先生孩子共組一個小家庭。

結婚時，不是大新娘隨便，婆婆買一個梳妝台和茶杯給我。因為人很多，三房六個妯娌輪著煮，白天打掃，晚上睡覺前當媳婦的就要削蕃

薯、洗蕃薯，乾了隔天早上才能和米煮，米才能省。(A 訪談稿)。

B 在 25 歲才相親嫁給在郵局上班的先生，在那個年代算是晚婚，剛開始與公婆同住，後來搬出去為小家庭，婚後除了在家中照顧六個孩子還有農務，直到最小的孩子上國小，才能繼續削柿子。

家裡有種菜有種橘子，耕自己的園，很忙，家裡的人要出去上班，小孩小的時候，家裡五六個小孩要吃、要讀書，沒有削，最小的小孩六歲，我才來削 (B 訪談稿)。

D 的父親是佃農，從小幫忙讓她習於農事，19 歲結婚後與公婆同住，婆婆幫人削柿子，沒有空幫忙帶小孩，D 生小孩之後削柿子這份工作曾中斷，有時凌晨去削，削得差不多就走，從這可以發現 D 有經濟需求，但孩子無人照顧，只得利用孩子睡覺的時間外出工作。從第一代婦女言談中可以發現當時婆婆權威很大，娶媳婦之後家事由媳婦包辦，當婆媳同有經濟技能的時候，D 的婆婆選擇繼續工作，讓媳婦在家裡帶孩子，削柿子這份工作，雖是坐在椅子上，不必像採茶一樣滿山跑，但凌晨做到傍晚拼件，對身體是一大考驗，可以推想削柿子對婦女來說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是一年當中唯一能獲得薪資的有酬勞動，因而她們最期待的莫過於一年一度柿餅季來臨。E 在 23 歲結婚，孩子小時沒有削，孩子上小學又開始持續削了二十多年，除了削柿子之外，還有耕田、採茶等農事。

C 婚後與公婆同住，生了八個孩子，侍奉婆婆終老，在第一代婦女當中，唯一沒有務農的，因為搬到新埔街上住，別人不知道他擁有這一項手藝，所以她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自己找到這個賺錢的機會，當時薪資採計件制，為了賺更多錢，女兒會煮飯之後，每逢長達四個月柿餅產季時和先生、孩子分開，直接住在產地臨時搭蓋的柿餅寮，只有下雨天才能回家，內心十分煎熬。

三十多年我搬出來這裡新埔住，有一次旱坑里的人來這裡，我問他：「有削柿餅嗎？」他知道我會削，就幫我介紹到他娘家的房內削柿子 (C 訪談稿)。

後來沒削，改做清潔工、水泥工、家庭代工等，全職工作與削柿子這份工作交錯著，即使是過年也催工頭趕緊開工，幾乎沒有一天是閒下來的。一生當中從事低技術性的工作，出賣勞力，期許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多收入。C 在孩提時被養母安排工作，咬牙苦撐，婚後自己不間斷工作，在 C 的工作經歷中削柿子與其他工作穿插出現，由此發現當家中無田可種，連生活最基本的吃都沒有來源的時候，女性還是會外出工作，正如學者呂玉瑕研究台灣女性認同多重角色，能配合家庭發展階段的、間斷性的就業型態是最理想的，婦女外出工作並非常態（呂玉瑕 1980）。在言談當中也發現她堅強自持的一面。

我有做小工，水泥、風水、塔、我都有去做，做可能有兩年，又去扛磚、扛沙、水泥，一大包水泥抱起來，我很勇敢，做的連老闆都很喜歡我……我在家裡什麼事我都做，誰找我我就做，什麼事我都領來做，反正我就是加減做，這樣我才有能力把這間房子買下來（C 訪談稿）。

相較於其他四位，C 在第一代婦女中算是很特別的例子，由於夫家沒有田地，外出工作才能維持生活，她在孩子小的時候就曾在柿餅產季住在柿餅寮工作好幾個月，以獲得更多收入，據何素花研究日據時期採茶女工，發現婦女不會輕易去較遠的地方採茶更別說是住在茶寮，一位受訪者稱自己是薪白仔（媳婦）才要住在茶寮，若是女兒就不用，茶寮代表婦女離開家庭往外勞動的社會意義（何素花 2002），同樣的情況推論在柿餅加工，柿餅產季時 C 曾住在柿餅寮長達四個月，顯見當時媳婦在家庭中地位低，若有為家庭賺取收入的機會，不想去也得去。

答：我有多會削你知道嗎？早上三點我就起來削，削到晚上五點下班，十三簍，一簍七十斤，你算算看一天有多少斤？

問：三點你怎麼上班？

答：我住在那裡！我的女兒會煮飯了，一年只有兩三個月，有一年削了四個月，真的好苦（C 訪談稿）。

從訪談中發現她面對家人的奚落，十分不服輸，為了搬離山上自己買房子，外出工作改善家中經濟狀況，趁著身體還撐得住的時候，什麼工作都做，不論是加班還是超時工作都可以接受，工作十分賣力，雇主十分喜歡她。

我阿伯看不起我，難道我會做乞丐嗎？我會幫忙做，我的人不讓人看不起，我決定要做給人看，所有賺得的錢都拿來買房子，夫妻兩個打拼，有一個房子孩子回家才有溫暖、有地方吃飯，你看不起我，我做到死也要做給你看……像我在遠東做這麼多年，二十多人大家都很尊敬我，他們沒有資格可以講我，我要離職，課長很捨不得，我去哪做都讓人稱讚，不會嫌我就對了，我坐下來休息也不會有人說我（C 訪談稿）。

根據受訪者的內容，第一代婦女原生家庭都是務農，從小學習農事，婚後也理所當然的要做，除了 C 嫁了家中沒有田的丈夫之外，其他四位即便先生到公司上班，女性仍然要照顧家中的田地，這顛覆我印象當中「男主外，女主內」這句話認知，我以為女主內代表屋子裡的事，舉凡煮飯、孩子、洗衣等，其他由男性負責，原來這句話的責任切分點是男主外，外代表的就是經濟來源，剩下的皆由女性囊括。

我們做這種事情的人，家裡很沒有空，要澆菜，餵頭牲，什麼都要自己做，男人不會做，因為他們做不習慣，哪會做？（A 訪談稿）。

早早去就削四五籮，吃過早餐去的話就削三籮，家裡還有小孩要煮給他吃，還有自己的工作，家裡有種菜有種橘子，耕自己的園，很忙，家裡的人要出去上班（B 訪談稿）。

家裡的事情我自己做好才出門。（D 訪談稿）

當家庭面對經濟壓力時，家中的成員會衡量自身能力、比較利益，協調以貢獻最大力量給家庭，男人多半會負責經濟來源，女人則是照顧家庭成員及家務，全力支持男性，有需要就幫忙維持家計。這看起來是最適當的角色分配，因為男性外出工作能賺得比較高的薪資，女性留在家裡照顧老小、做無酬勞動，這樣的想法卻忽略人女性的勞力貢獻與心理層面。這些婦女扮演許多角色，忙於農事、家庭事務，還要削柿子補助家中收入，一天鮮少有時間坐下來休息，削柿子擠壓他們做家事的時間，若孩子較大可以分擔家事，不然就得利用削柿

子回家後的時間繼續做家事，些許收入並沒有減少他們在家務方面的工作。此也回應呂玉瑕（1983）所提出的觀點，妻子就業並不會讓丈夫增加家務參與，就業婦女需承擔工作與家庭雙重責任。

3.1.3 做阿婆，阿婆做

隨經濟環境的轉變及女性受教育機會普及，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勞動市場比例愈來愈高，第一代婦女的兒子結婚後，有受較高教育的媳婦外出工作，照料孫子的工作仍落在這群婦女的肩膀上，有時得放掉工作幾年，直到孫兒上國小，若沒工作，也不幫忙帶孫兒，會受到鄰居、親戚異樣眼光，為了家中經濟，節省保母費用，與其說是全家人理性選擇，不如說是外在壓力下接受這份工作，是強大社會規範下所界定出來的女性特質的表徵，也是社會對婦女美德的期待（劉梅君 1997），接下帶孫兒工作的婦女，遇到柿餅季時，因人力需求大，老闆會答應他們把孫子帶到柿餅寮去工作。

媳婦娶來上班，我要帶小孩，孫子日夜跟著我，小孩子一起帶去背著削（B 訪談稿）。

我第二個孫女現在三十歲，他還小，他媽媽走掉，他很乖，他跟著我，我跟老闆說我走不開有小孩跟著我，老闆說沒關係你帶著來，白天泡奶換尿布，晚上有回來，我孫女很乖，整天睡覺，早上老闆會來載我去，下班載我回來，老闆或老闆娘有空就會載，後來我孫女大了，我就不必帶著去（C 訪談稿）。

老闆採用削柿子機器後，他們的工作內容隨之改變，一台機器配三個人，一個人放柿子到機器上削皮，滾下來後兩個人檢視，剛入門的負責放柿子，熟手會分配到檢視這一關，C 提到自己使用削皮機器時的情況，即使機器能減輕她極大的工作量，仍自我要求要做到別人沒話說。

後來有機器，我又幫人家削，一台機器我自己奈何，挖一個，削一個。普通人三個人一台機器，有時我的手快於機器，有電視台來錄影勒！機器還沒削好，我的手在那裡等，一天可以削一千多斤，機器在中間，我削頭削尾，動作要很快，動作慢的人就會來不及，我一個人顧一台

(C 訪談稿)

B 在轉型觀光的柿餅加工廠上班，老闆會請他手工削給遊客看，表演時生產量較低，B 提到老闆沒有扣工不會佔便宜，她感覺手工削皮算是表演比較輕鬆，卻得到一樣的薪資，老闆人很好。

他叫我們出去也是算工，他不會占我們便宜，結果都是他的事情，做到晚，給別人看，照相的人會跟他買柿餅，會跟他交關，他沒有扣工，出去給人照一照，再回來削 (B 訪談稿)。

B 和 C 很喜歡工作時的氣氛，這份工作也帶給她成就感，B 和 C 在家人考量年紀與體力，要求她們放掉削柿子這份工作。

我喜歡，很多人，很快樂，家裡靜悄悄的，很多人會來拍照，一天不只來一百台車，要調出去削給別人看，用以前樹木的刨刀削，一刀到底 (B 訪談稿)。

很多人看我削，小孩子看得目瞪口呆，我很怕人看，他還要看，很熱的時候圍整圈，一直看我，很有趣，所以我很喜歡做 (C 訪談稿)。

50 年代台灣靠著充沛的勞力與低廉的工資，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當時竹北有台元紡織廠，60 年代遠東集團在新埔成立遠東化纖廠，提供很多就業機會，兩個廠區離新埔很近，且有交通車可以搭乘，但紡織業進入農村沒有立即且全面改變婦女的工作型態，與何素花 (2002) 研究 60 年代關西地區的採茶婦女結果相同，有些婦女只能在農事家事外，在農村地區繼續從事打工性質的零工以貼補家用。製造業在民國 62 年達最高峰，後來兩次石油危機及工資上升促使 60 年代後期產業升級，食品和紡織業的比重降低 (王克敬 1987: 25-35)，D 在 80 年代曾經到罐頭工廠做零工，當時食品產業已經處於衰退階段，沒多久就因工廠結束營業而沒有繼續工作，對於工作的想法是：總是要做，語氣中充滿了無奈，領到薪水則是全部作為家用，以前小孩小，家裡沒有人賺錢，這一份收入對她來說十分重要，現在小孩大了，各自發展，終於可以放掉這個壓力大

的工作。

做會怕，不想去，沒有削到底就不能放，答應人的事不能放。現在我放掉沒有削了。我現在那麼多歲了，還要削？難了！錢賺來吃不到（D 訪談稿）。

現在五位第一代婦女當中 C、D 已退休沒有削，A 和 E 繼續在柿餅加工廠工作，每年柿餅產季一到，老闆都會打電話叫她們去上班，只要身體情況允許就會去做，B 則是在假日的時候，老闆會打電話請她幫忙以手工削皮給遊客看。A 現在與退休的兒子一起住，平時種菜、養雞，賺來的錢為自己使用，也會拿來家用，老闆有打電話叫她，她就會去工作，她說：「反正在家裡也是要工作」，勞動對她來說是一種習慣，E 的想法和 A 類似，只要身體還挺得住，就不會把這個工作放掉。

家裡只有我一個，我孫女孫子都大學畢業在外面工作，這裡比較多人，日子過比較快，很有趣，也不會被日頭曬到（A 訪談稿）。

會碌會碌，老闆也不肯我們放，又不是說很不會做、身體不健，會跑會做，老闆會叫，不肯我們休息，沒有要煩惱的事情，沒有事情就休息，時間到就削柿子（E 訪談稿）。

田野調查前幾個月 B 的手指才剛開過刀，削柿子的時候，右手拿刨刀，左手握著柿子，柿子削皮之後表面會滑，為了扣住柿子，讓柿子能轉得快又不會掉，中指最前面一節已經變形，歪向無名指。削柿子一年才幾個月，卻能讓手指變形，可以想像他們工作時的壓力及自我要求高。A 總是默默工作，自我要求每一顆都要削好，除非老闆說休息，不然不會起身，除了自我要求之外，深怕二手抱怨頭手挖柿蒂時挖到肉，影響到柿餅品質。

我停兩年沒削柿子，因為我的手變形了，手指會彎彎的，怕柿子掉下來，扣得很緊，所以中指變形，去年還去開刀，要扣緊緊，柿子不能掉下來，很危險會傷到（B 訪談稿）

我很少跟人說話，怕做來不及，我平常是不多話的人，要看事情，有時做不好會被人罵我靜靜的打，不跟人說話，要看事，和人說話割到肉，會被人罵，有的人很猴有的人很溫柔，猴的會管人，二手會來說我們哪裡沒有做好，老闆的姊姊很敢說，很犀利（A 訪談稿）。

第一代婦女皆有務農及家務勞動經驗，例如撿柴、種菜、挑水等是他們共同回憶，五人都曾做過採茶這個工作。

我家的茶園很寬，請別人來摘，茶是一波一波的，以前我的家裡很多人，要搓茶，有茶寮，現在沒有了（A 訪談稿）。

做茶比較沒空，茶工廠請人來做茶，很多工，採了要曬，曬半乾要.....，很多工，以前大家庭住在一起，我當小孩子的時候邊看邊學，會幫忙做一些，採回來就曬，我的幾百斤不多，做好要載出去賣，少載沒有工錢，若有人來收茶，收到工廠做，也可以過得去。（B 訪談稿）。

六歲就採茶，採會之後天天都要採，在旱坑里採，很辛苦就對了，沒有一天在家裡玩，採到食指指節流血，很深，四十天後，傷口好了又要採，很辛苦就對了，以前沒有錢買手套，以前人做衣服很省布，我向別人要布，自己縫，現在的人多好怎麼採茶，戴手套（C 訪談稿）。

以前當小姐時我幫別人採茶，跟爸爸去山上幫人做事（D 訪談稿）。

他們在描述削柿子工作的時候，不經意的會提到以前採茶的情形，或者是拿來比較。對她們來說，採茶時需要更多身體勞動，在大太陽下滿山跑，相形之下，在太陽曬不到的地方削柿子較為輕鬆。

削柿子大家坐在太陽曬不到的地方一起工作，時間過得很快（A 訪談稿）。

以前削柿子沒有手套，滑滑的，現在削柿子還戴三層手套，以前是硬用手工去做（C 訪談稿）。

採茶的薪水是算工的，滿山都要爬，不是坐在屋子裡。削柿子也不是很輕鬆，只是不用滿山爬滿山跑，不必曬太陽（D 訪談稿）。

此也回應張慧君（2009）的研究，客家族群與茶產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茶產業當中從事採摘茶葉者，往往由女性擔任，隨著新竹縣茶產業規模逐漸縮減，採茶不再是他們每年的固定工作，漸漸的被削柿子取而代之。綜觀第一代婦女的一生，身在農村，承擔著家庭，為滿足全家老少的衣食住行終日勞碌不停，從未脫離過勞動（賴嘉玲 2004：32）。

3.2. 第二代婦女

第二代削柿子婦女年齡多在 50 歲以上，她們十幾歲時適逢政府實施經建計畫，為台灣製造業輝煌的時期，台灣依靠充沛的勞力與低廉的工資，工業快速發展，農村工業化的經濟變遷影響第二代婦女工作經歷。

在柿餅加工廠削柿子婦女裡也能看見嫁到旱坑里的外籍配偶來工作，旱坑里地旱位置偏遠，里民因在當地掙錢不易，適婚年齡男性娶外籍配偶的比率較高，從旱坑里所屬學區新星國小學童家長資料可以佐證。外籍配偶嫁到異鄉首要任務就是生育，養育孩子需要金錢，但夫家經濟弱勢，她們會外出工作，賺取的收入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又缺乏交通工具，多選擇在新埔當地或鄰近鄉鎮找工作。老闆表示有的外籍配偶在柿餅季之前就會來詢問是否有工作機會，有的透過朋友介紹，待柿餅季時老闆會打電話叫她來上班，實際上來上班之後會留下來繼續工作的不到一半，多因為家庭因素離職，例如有一位婦女不能來的原因是她的先生認為妻子是花錢買來的，必須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在外面討生活、賺外快，甚至被懷疑妻子利用這個藉口外出，實則在外面亂來。田野調查時觀察到三位在柿餅加工廠工作的外籍配偶都來自中國大陸，其原因可能是語言相通才得以在這裡工作，或者是經仲介嫁到當地的外籍配偶多是大陸籍。第二代削柿子婦女社經背景及工作經歷表列為表 2。

表 2 第二代削柿子婦女社經背景及工作經歷

	族群	年齡/ 出生年	教育 程度	婚前工作	婚後工作	丈夫工作
F	客家	71 / 1941	國小	開家庭美髮	家庭美髮 亞東	開計程車
G	外省	56 / 1956	國小 三年級	到台北工作	農務 帶小孩 台元紡織	製材廠磨鋸子
H	客家	55 / 1957	國中	成衣廠	早餐店	中華電信
I	客家	53 / 1959	國中	電子工廠	成虹電腦 打零工	裝潢
J	客家	48 / 1964	國中	開家庭美髮	園藝	工廠上班
K	陸配	44 / 1968	國中 一年級	成衣工廠	鋼鐵工廠	新埔農會 2007 年歿
L	陸配	34 / 1978	國中	成衣工廠	板條店	遠東紡織輪班

從表 2 可以看到第二代削柿子婦女的出生落在 1941 至 1978 年間，這範圍跨了 37 年，受教育的程度從國小到國中不等，比較第一代與第二代削柿子婦女婚前的工作及丈夫工作可以發現：職業類型從第一級產業轉變為第二、三級產業，因自 1960 年代起，台灣輕工業發展快速，屬勞力密集產業，需要大量人力，職業選擇多尤其是在都會區。以下分析第二代婦女的工作史，她們年輕時都曾到工廠上班，甚至自己開美髮店當老闆，婚後卻不約而同轉換工作，最後選擇到柿餅加工廠削柿子，工作經驗影響他們對於自身勞動參與的看法，連帶的左右對削柿子工作的工作認同與評價，下文將探論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削柿子這個季節性工作而非其他全職工作及對於這份工作的認同感。

G 和 J 十多歲都曾上台北工作，住在台北親戚家與家人分隔兩地，他們在外地工作收入都會寄回家補貼家用。G 的家庭生活很艱苦，在十三歲時到台北工作，她表示當時要不要上台北、到哪一家工廠上班是自己的決定，自己學歷雖然不高，但都市人力需求大、工作機會多，也能容易的在製造業中轉換不同的工種，表面上看來對自己的生活有自主權。但 Norma Diamond 在 70 年代研究報告指出，工廠中的年輕女工在家中沒有權力，對生活也沒有真正的控制能力，外出工作是家人的意思，目的為幫助家庭經濟，只是暫時的，她們是孝順的女兒，賺取的薪資經常要匯給父母 (Norma Diamond 1970)，與本研究中受訪對象的情況相符。

問：妳是屏東人，為什麼會在台北工作？

答：我們鄉下種甘蔗，沒有工作啊，鄉下人都跑台北工作，因為我們以前大陸來很辛苦嘛，爸爸媽媽又那麼多歲，我們要幫忙貼幫忙爸爸媽媽賺錢。我 13 歲阿姨的孫女問我要不要去台北，我就跟著去台北看有什麼工作可以做。我做皮鞋做一做又換紡織工廠做，做又沒有幾年我就不要做了，太累了。

問：那時妳賺錢還有寄錢回家？

答：有，我媽媽去犁山幫人煮飯，我在家賺錢給阿婆，就剩我爸爸，我們三人可依靠。(G 訪談稿)

G 結婚後跟著先生回到新埔定居，先生外出工作，自己留在家中和公婆一起種香菇、去山上工作，小孩大了才去台元紡織廠上班，工作所得除家用外還能拿來給女兒添嫁妝，提升了他在家中的地位。

這個家我貢獻很大，我女兒年輕畢業就嫁，我不會收他聘金，我要賺東西給她，電視、冰箱、洗衣機全部給她，親家說：「喔！嫁妝這麼多，還有一台車子哦！」(G 訪談稿)。

兒子結婚生子之後，考量兒媳工作忙碌，G 自願從職場提早退休回家帶孫子，會去削柿子是偶然的機會，其餘時間在家裡種菜，沒有其他工作，兒子每個月拿 10,000 元家用出來，有別於年輕時上台北工作，現在工作所得可自由運用，生活重心完全擺在家庭，對於現狀十分滿意，家人平安對他來說就是幸福，削柿子對她來說是很好的工作。

問：妳孫子再大一點妳會不會想要找一個全職的工作？

答：不要，我要回家煮飯給他們吃，這個家庭平平安安就好了。錢是賺不完的，大家一家平平安安最好，這樣。(G 訪談稿)

G 表示不會再做全職工作，若有零工會看狀況，工作不佳，寧可不做。例如有朋友找 G 去拔草，但 G 認為太陽大、太熱就拒絕，工作權掌握在自己手上。

他們還說要去拔草，我說太熱我不要去，我們要不去是看朋友做的可以不可以，我們去看一看怎麼做才去做，不會隨便去做(G 訪談稿)。

H 婚前在成衣廠工作，婚後就沒有上班，直到小孩較大曾經到早餐店上班，不喜歡早餐店的工作環境而離職，也曾經幫人帶小孩，小孩大學畢業後才投入削柿子這個工作，收入用來支付家用。H 對於帶小孩這個工作的評價是：很累，但又表示這一季削完想幫人帶小孩，要繼續當保姆，其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經濟因素，雖然孩子都已工作，但自己賺錢花用不必向家人開口，亦可補貼家用。主婦就業時傾向能兼顧家庭的工作，這多半是非技術性，他們為了增加微薄的收入而工作，主要是為了貼補家用，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先生的收入，雙重的角色沒有減少主婦家務勞動，帶給主婦更大的壓力。本論文之發現可呼應莊英章(1994)的論點，雖著台灣社會經濟型態的轉變，婦女有愈來愈多參與市場機會的趨勢，但大多數婦女並不認為工作能提升她們在家中的地位。

問：領到薪水你會如何使用分配？

答：其實這也不是很多，付家裡支出，該付的付該買的買

問：所以你出來上班也算有幫助家計

答：出來可以動一動，心情會比較好，整天在家裡不好，不健康，會懶惰，在家裡偶爾可以不能整天在家，在家裡會想睡覺，會想活動(H 訪談稿)。

I 的父親幫人採茶還有請十幾個工人，她必須幫忙家裡做事，工作內容有到茶園剪茶、煮午餐及點心，後來到電子公司上班，早上三、四點就得起床去剪茶，七點半再去上班，因為如此，I 外出工作賺得的薪資不必拿回家，婚後因生育而中斷工作，直到小孩上國中才重返職場到電機公司上班，不久，碰到產業外移潮，台灣工廠結束移到大陸，直到來這裡削柿子之前十多年沒有工作，若有工作機會，頂多是清潔方面等服務業，考量家庭生活沒有去做，現在小孩大了外出工作，又還沒有孫子可以帶，平日家中只剩夫妻兩個以種菜、耕田為主要活動，想要找一份固定的工作消磨時間，在朋友介紹下開始削柿子。生活軸心都是家庭，在照顧家庭空閒之餘才考慮外出工作，領到薪水就先存起來，

用途分為紅白包、家用、自用三部分，這份工作的收益對家庭來說十分重要。雖由過去正式部門轉移至非正式部門中，政府經濟自主擴大就業方案提供正式部門工作並不吸引她們，一份能兼顧家庭的「正常」工作，例如：削柿子，才是她們心中的首選，會擔心柿餅季到了不能做那份工作。

有想要找，可是我們年紀大，頂多也是清潔方面的工作，像政府補助方案那些很難，因為我不喜歡把家庭的生活都打亂了，所以我要找都會找正常的工作、能兼顧家庭的工作，沒削柿子就在家裡自己種種菜、耕耕田啊，因為我的觀念是這樣子（I 訪談稿）。

J 在台北學到美髮的手藝之後，為了照顧父母就回來新埔開美髮店，是美髮店的老闆，擁有經濟自主權，婚後育有兩男兩女，在先生強力反對下結束美髮店，二度就業時面臨問題，空有一身手藝，開始到處打零工，比如說採茶、做茶、採橘子、園藝等，顯見教育水準提高、社會環境變遷等並不會改善女性就業困境（張晉芬 1995）。他對自己會來削柿子是因為在家裡坐不住，出來打發時間，言談中感覺到 J 有經濟方面的壓力，工作所得全都是拿來支付家用。

問：你沒有做美髮之後，做過哪些工作？

答：就開始什麼工作都做啦，反正沒有做閒在家裡閒不住，我們做事情做習慣了，沒有工作會變懶，我們閒不住，一定要出去做。

問：你後來有其他工作就去做，今年會回來做的原因是什麼？

答：應該是打發時間

問：你會不會希望能一直削柿子

答：會啊，這個薪水不錯，但是只有一個季節

問：你工作薪水怎麼使用

答：我們還要繳費，繳費什麼的

旁邊削柿子的阿婆說：坐遊覽車、坐飛機，花光光囉！

又答：你可以享受我們還不能享受，花光光再賺過，會做死（J 訪談稿）

同樣是開美髮店的 F，19 歲時到竹東向姊姊習得手藝，23 歲獨自創業請了四個員工，當時燙一個頭髮才 20 塊。28 歲結婚，先生是計程車司機，生育小

孩沒有影響事業，F 把小孩帶到美髮店，可以邊工作邊照顧孩子，美髮店在 38 歲時結束營業，同年買了一棟房子，改到亞東化纖上班，工作轉變的考量是當老闆壓力大，生意清淡或興隆都要煩惱，孩子也上學了，索性到工廠上班，領固定薪水，以前的客人若想要美髮，會打電話約晚上的時間，美髮收入是額外多的，滿 60 歲自工廠退休後在鄰居介紹下接觸柿餅產業，我們可以發現 F 工作能力很強，經濟收入可能比先生高，因此在轉換工作時，沒有受到先生的影響，削柿子的收入先存起來，需要時會拿出來貼補家用或出國。

問：妳那時候要來削的時候妳有先問過妳先生嗎？

答：問我先生？不用，沒有，為什麼要問？他也不會說要管妳啊，他不會管我，不會說要盯著妳要做什麼，隨便，幫他賺錢啊，大家一起互相啦，是不是這樣？（F 訪談稿）

F 和 J 都曾經是美髮店的老闆，他們結束美髮店的原因不一樣，連帶影響他們看待人生的態度，F 與先生各自賺錢不會干擾對方，工作轉換與否是自己決定，削柿子工作可說是額外的交友機會，J 每個月收入從固定變成不穩定，語氣中充滿無奈，削柿子這份工作是沒有全職工作下最好的選擇。

第二代婦女當中，除 F 與 G 只有國小畢業外，其他婦女都有念到國中，F 年紀較大，可以理解她的學歷只有國小，G 比 F 小 15 歲卻連國小都沒有畢業，追究其原因是父親為大陸來的，家庭經濟狀況差，很小就要外出工作幫忙賺錢，以家庭的利益為優先。

我沒有讀到國小畢業，差不多讀到國小 3 年級。因為我們以前大陸來很辛苦，爸爸媽媽又那麼多歲，我們要幫忙爸爸媽媽賺錢（G 訪談稿）。

50 年代台灣工業之生產結構是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60 年代初期，政府大力推展重化工業，80 年代時轉為重化工業為主的型態，其影響是製造業中的食品及紡織比重明顯遞減（王克敬 1987），90 年代至今經濟發展強調資訊業，工業的比重降低，資本與人力跨國界移動，生產線全球化，產業結構變遷影響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就業機會受到影響。第二代婦女中台灣籍多為 40 年代後期至 50 年代出生之女性，婚育年齡時期勞動力參與率開始下滑，除了 F 在自家開美

髮店能兼顧孩子與工作之外，其餘四位完全退出勞動市場，孩子學齡前，多犧牲自己外出工作機會，在家中照顧孩子至國小以上，子女長大後逐漸重返勞動市場，欲以全職工作為優先，但是台灣的經濟環境轉變影響就業機會，生產傳統產品的中小企業日漸萎縮，科技型企業增加，產業發展從勞力密集產業邁入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只有兩位找到全職工作至退休，有兩位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這群原本在外地工作的婦女從事勞力密集產業之工作，面臨產業結構轉變，除了本身人力資本之不足之外還必須考量自身家庭環境，只得自工業或服務業轉移至初級產業，回到農村從事簡單、勞動之工作削柿子，所扮演的角色是柿餅產業的基層工作者，以上是第二代台灣籍婦女進入削柿子工作前普遍的歷程，本研究也回應蔡青龍（1988）針對台灣婦女勞動再參與進行的研究，再參與勞動婦女的屬性多具有基本或初等教育的中年婦女，原先從事進出容易、技術性不高的工作，再就業時傾向返回原職業階層或轉入較低階層的行業。

K 是大陸廣東人，國中肄業，父親說沒有錢了，女生就算了，就開始打工、擺攤、到成衣工廠上班，直至 19 歲嫁來台灣，當時 **K** 還沒有領到台灣的身份證，不可以去工作，因 **K** 的先生是柿餅加工廠老闆的同學，老闆知道她們的家境不好所以提供工作機會給 **K**，生育、先生生病使工作斷斷續續，後來找到其他工作，與削柿子穿插著，只要沒有其他的工作，遇到柿餅產季就會來柿餅工廠上班。老公過世後領到保險金，**K** 就把這筆錢寄放在老闆娘的戶頭下，從這件事能看出員工對老闆的信任，也不禁讓人推測，這位外籍配偶在台灣沒有可以信任的姻親，老闆娘才會是她的最佳選擇。

L 婚前在家鄉的服裝工廠上班，嫁到台灣後生下一男一女，與先生共組一個小家庭，直至孩子上幼稚園才外出找工作，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另一份工作是在新埔鎮上板條店端板條，這兩份工作時間有重疊性，田野調查時發現 **L** 以板條店的工作為主，有空才會來削，若遇到星期二，上小學的孩子讀整天，就可以做到下午，其餘都是中午就要回家，從這可以發現柿餅產季時亟需人力，多一個人來工作就多一份力量，半天也無妨，另一方面是削皮機器出現，工作門檻低，計時給薪制有空上班就可以來幫忙，讓勞資雙方得利。以前服裝工廠的工資計算方式是計件制，壓力很大，**L** 對於削柿子這份工作最滿意的地方是能兼顧家庭及採計時制壓力沒那麼大。**L** 的孩子在第二代婦女中最年輕，先生是紡織工廠輪班作業員，薪水不高，經濟壓力較大，因此除了自己來上班之外，還叫先生來上班，只要輪班時段與削柿子時間沒有衝突，先生就會來挖柿蒂。

第二代婦女雖然因結婚、生育放棄原有的工作，只能到柿餅加工廠削柿子心中有些許無奈，婦女們仍肯定削柿子工作的優點：工作時間固定、上下班彈性能兼顧家庭與工作，削柿子工作是最佳的選擇，但是如此辛勞地工作，所得被認定為「補貼」家用，連自己都說這份收入對家庭生計影響不大，男性的收入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足見在父權主義之下，女性被邊緣化的現象，社會經濟變遷沒有立即影響婦女的工作型態，婦女選擇工作以家庭因素為首要考量，尤其是生育之後，會因無法配合工廠上班時間而選擇暫時不工作，這樣的情況也回應呂玉瑕的研究，台灣婦女參與生產勞動對家庭內部角色結構及權力結構影響沒有改變（呂玉瑕 1983），家庭中家事及照顧責任多由女性擔任，當女性外出工作時，家事並未減少，他們必須調整作息和付出更多時間，以達到外出工作的目的，這帶給婦女很大的壓力。

3.3. 兩代之間

每個女性都是獨立的個體，不同世代女性人口特徵、時代背景不同，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策略，她們的選擇結合在家庭結構、勞動市場裡，是否參與勞動和時間長短、類型隨之變化。從受訪者的資料來看，在柿餅加工廠工作的婦女的生活型態類似，甚至呈現一致性，都有結婚、生育等歷程，這與社會上女性多元型態：有的不結婚、有的結婚不生育、有的離婚等現象完全不相符，這可能要歸因於新埔鎮上已婚客家婦女，且有意願外出工作者，在考量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下，削柿子工作是最佳的選擇。綜觀以上，整理出兩代削柿子婦女之間的世代異同：

3.3.1 工作的選擇

婦女們生命各階段的削柿子勞動，受生命週期各階段的變化，形成不同的參與原因。新埔早期為農業社會，山上多種茶，第一代婦女因當時社會重男輕女觀念影響，自小就被視為家中的勞動力，上學對她們來說是有空才能做的事，教育程度較低，共同的回憶就是採茶及務農，在大人的安排下去學習削柿子的技術，其原因是鄰居很多人削柿子、住在這個地方的人都做這樣的頭路，凌晨上工、論件計酬，工作所得被父母領走作為家用，婚後生兒育女、操持家務一刻不得閒，每天重複一樣的勞動，生活忙碌內心卻十分空虛，會選擇這份工作是因為本身技能有限，工作機會不多，削柿子雖然辛苦，至少是從小習得的謀生技能，所得能補貼家用，除了工作賺錢，還能藉此與人聊聊天，聊些日常生

活發生的事情，時間過得比較快，亦填補心中社交需求，是主動選擇參與削柿子工作。從前老闆產季前就下會訂金給手工削皮的熟手，以確保人力來源，拜託婦女們來幫忙，孩子一起帶來也沒關係，婦女因擁有獨特的技能而受到重視，但不會因此擁有高姿態，雖然不是工廠的正式員工，對老闆仍有忠誠度，一旦在這一家削，不會輕易換家削，若有，都是因為老闆那方環境改變，例如：老闆生病不做了，而不是婦女主動提出。第一代婦女有手工削皮的手藝，在柿餅產季很搶手，即使較後期沒有收訂金，還是會固定在同一家，他們對於能提供工作的老闆存感激之心，在老闆最需要人力的時候會全力以赴。

我一開始是在另一家打，後來被叫到，就專門在衛味佳劉理鑑那裡打。誰叫到誰就固定那裡（A 訪談稿）。

我幫他削，頭尾九年的時間，削的不肯走，他不肯走，早坑的人說我死田螺不會過丘（C 訪談稿）。

以前我也幫另一個老闆削十多年，他過世之後，我就換到阿源伯這裡削（E 訪談稿）

第二代婦女教育程度較高，至少讀到國中畢業，適逢國內經濟發展對人力需求高，在婚前都有外出工作經驗，雖然收入多要交給父母，但要做什麼行業有選擇權感覺自由，有的婚後能延續原有工作，有的考量照顧家庭需求，放棄原有的職業，在偶然機會下進入門檻低的削柿子工作，削柿子收入亦多被視為補貼家用。第二代婦女的削柿子工作內容可替代性高，且為二度就業，不會輕易跳槽，以免產季來臨時，老闆不叫他來工作。現在老闆與削柿子婦女是上對下的權力關係，產季來臨時，老闆會拿出電話簿，打給合作關係良好的固定班底來工作，女工們處於被動的姿態，只要表現不是太差，在人力需求大的產季，多會接到老闆通知上班的電話。對老闆來說，婦女今年能不能來工作處於被動的地位，但不代表她們對於工作沒有選擇權，在親友的介紹下有很多零工的機會，比如說採橘子、拔草等，當有人介紹工作時，她們會看工作地點、性質，再決定要不要做。

問：你有去採橘子、茂谷，還有很多工作機會？

答：對啊，有人叫就做啊，他們還說要去拔草，我說太熱我不要去，又要蹲上蹲下。

問：可是拔草薪水好像比較高？

答：沒有高，和這個一樣。我們這不要曬太陽，啊那個是曬太陽，我說我不要去，那個拔草又爬上來爬下去。我們工作看那工作要不要，我們要不要去。我們是看朋友做的可以不可以，我們去看一下，就看一看怎麼做才去做，不會隨便去做（G 訪談稿）。

3.3.2 自我評價

由上一段從工作選擇角度來比較兩代婦女得知，從前的師傅較受人尊重，連帶的也帶給自己更多的信心，手工削柿子不是那麼簡單學會的，第一代婦女形容自己小時候有限的環境下學習手工削皮十分艱苦，以前物質條件不好，工作時徒手扣住柿子，用木頭刨刀一刀到底削完整顆，他們對自己擁有這樣的手藝感到自豪，這個技術是不能取代的，現在用菜瓜刨削頭削尾比較快，用機器削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事。提到以前多用「手藝」、「硬功夫」等形容詞，機器削皮則是用「簡單」、「快」來描述。

以前都是用木頭刨子，小小枝樹柄比較重，要一直轉，不好學，現在用菜瓜刨輕輕的，用機器的，誰也可以做（A 訪談稿）。

以前削柿子沒有手套，滑滑的，現在削柿子還戴三層手套，以前是硬用手工去做（C 訪談稿）。

以前是削整個的，比較難也比較慢，剛學是削不出的，不是像現在削頭削尾比較快，用菜瓜的刨刀來削，更簡單（D 訪談稿）。

C 婚後堅持要自山上搬到新埔鎮上住，為了要維持一個溫暖的家，婚後什麼工作都做，收入與先生相提並論，自我評價與家庭地位是第一代婦女當中最高的。

這是我的命，命生到這樣，無奈何。這間房子是我跟我老闆兩個人做出來買的，養八個小孩，買蓋好的三層樓。我去哪裡做大家都很合作、關心我、疼我，像我在遠東做這麼多年，二十多人大家都很尊敬我，他們沒有資格可以講我，老人言說，年輕的時候要勞碌打拼，老的時候才會享福，人生要怎樣，給他自己想，年輕人身教，給他瞭解，把根本作出來，汗珠錢萬萬年（C 訪談稿）。

第二代婦女對於自己的工作評價不高，多會說自己沒有技術，年紀大了只有這份工作適合。

可以啦，我又沒有什麼技術，而且年紀又大了，就是來有工作做就來做一做，沒工作就休息這樣子，不是說固定說要工作這樣子（F 訪談稿）

有想要找其他工作，可是我們年紀大，頂多也是清潔方面的工作（I 訪談稿）。

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做到好吃讓客人吃到滿意，我對這個也沒有很懂，我只是負責工作而已（K 訪談稿）。

從言談中發現他們的收入多是貼補家用，有沒有工作都可以，若要工作的話必須能兼顧家庭的才會考慮，如果太累的她們也不會去做。顯見對於工作仍有選擇權，但限於低技術性的工作。

3.3.3 外籍婦女

受訪者的族群背景幾乎都是客家人，有兩位是外籍配偶，因為旱坑里地理位置較偏僻，位在新埔街區往湖口的山路上，途中經過新埔公墓，給人更為落後之感，山上居民經濟相對弱勢，從其所屬學區新星國小班級學生家長資料可以發現，娶大陸配偶的男性不在少數，婦女因家中經濟狀況不佳，到處打零工賺取生活費，因而到柿餅加工廠工作，在四處工作的過程中，感受到他人投射異樣的眼光，造就自我防備、事先建立防護罩的習慣。外籍婦女與台灣籍婦女最大的差異為薪資收入是家庭經濟主要收入來源，因此隨叫隨到什麼都肯做。

B 柿農在每年柿餅季開始前，需要工人清潔工作環境，K 是他第一個找來打掃的員工。

她們很多不要打掃啊，變成每次老闆要做什麼就跟我講，能叫誰咧？那些都是年紀大了是退休的年齡，有得賺就賺，沒得賺也沒關係，像我就很需要，因為我要養小孩子啊，他們唸書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我什麼都要做，很辛苦也要做。每次來這裡做回家又做家事，都會比較忙，六點起來，大概到晚上八點多才會停手，人就是只要不生病，累了我晚上趕快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腰會很痠，但是來動一動它又比較正常（K 訪談稿）。

K 剛來的工作時候，雖不會講客家話但會聽，其他婦女用客家話討論她的工作能力，第一時間非常生氣，但沒有回嘴，唯有透過工作表現來得到別人的肯定，外籍婦女要在不熟悉的環境工作求生存，需要毅力與柔軟的身段。

第一年的時候，我當初打沒這麼快，大姊用客家話跟另一個人講：「妳看吧，來不及，打不夠我們削。」其實正常來講，上面是削得完的，我聽到心裡很生氣，但我不回她，就一直打，一直打，打很快，不給他空間，結果後來打的一盤她們沒話說，妳要學得跟她相當，就是比較有位子（K 訪談稿）。

第二代因工業化增加就業機會，這是第一代所沒有，但最後都選擇了削柿子這份季節性工作，整體來說，削柿子工作是兩代婦女衡量自身條件與環境後最好的選擇，在孩子成人各自工作後，削柿子所得拿來過生活，偶爾才會當作零花、旅行基金，有需要的時候不必向年輕人開口伸手拿錢。潘美玲、黃宜菁（2010）研究峨眉採茶婦女的勞動也發現同樣的情形，採茶對婦女而言是個人經濟自主的機會，藉著有工作，從事各種勞動得到收入，證明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從工作中建立對自己的認同。

3.3.4 婆媳相處

女性在進入婚姻後就不是完全獨立的個體，以先生、家庭為中心，受訪婦女婚後多有和公婆同住的經驗，女性若沒有外出工作，與婆婆相處的時間最長，

婆媳相處是婚後婦女必須面對的課題。第一代婦女當中有三位與公婆同住，但孩子學齡前多暫停削柿子工作，家庭支援功能不顯著，直至孩子學齡後才能外出削柿子，當時婆婆權威大，媳婦削柿子下班回家後仍要做家事、煮飯，一天當中可說是沒有休息的時間。

當第一代削柿子婦女成為婆婆時，社會風氣、環境不同，經濟環境的轉變及女性受教育機會普及，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勞動市場比例愈來愈高，兒子婚後受較高教育的媳婦外出工作賺錢，為了節省保母費用，照料孫子的工作仍落在他們的肩膀上，又得放掉削柿子工作幾年，直到孫兒上國小，有時老闆會同意他們把孫子孫女帶到柿餅加工廠去，就能繼續去削柿子。

第二代婦女當了婆婆之後的處境和第一代類似，仍要一肩扛家事，下班回家要煮飯給上下四代吃，難免在她們的心裡產生不平衡感，假日時會把工作留給媳婦做。

孫子最小的也國小六年級，我回去我就會弄菜給他們吃，煮晚餐啊，大家都上班，所以我老了也還是要煮飯（F 訪談稿）。

我要回家煮飯給他們吃，媳婦上班比較晚下班……，有時媳婦在家我叫媳婦做，她上班就我做。禮拜六、日我再跑，丟給她（G 訪談稿）。

第一代婦女 A 形容自己婚後當媳婦不做事會被婆婆念，第二代婦女 G 用「跑」來形容自己當了婆婆後把家事交給媳婦的方式，「婆婆」這個角色在家中的權威大不如前，客家的社會中，家庭倫理與社會秩序透過對於女性的種種規範來維持，婆婆是紀律的看守者，負責維持這紀律不會因為世代的交替而被破壞（余亭巧 2004），但時代與觀念變遷，女性的想法和態度差異大，雖不同意卻只能在磨合當中取得平衡。總體而言，兩代婦女當了婆婆之後，未能享有過去此一角色在家族中所擁有的權力。

四、削柿子婦女的勞動意識

柿餅業的勞動體制使得工作具顯著的性別畫分，無論分工方式如何改變，削柿子全部都是女工，其考量為女性較為細心，適合負責檢視機器削過的柿子，皮是否有去淨及碰傷等工作，男性勞動力的需求降低，但屬於技術層次的男工在性別與技術分工的特色下，薪資高過女工，女性在體力上的劣勢沒有減少勞動負荷，甚至比男性承擔更多的勞務，因此真正將女性排除在生產活動之外的主因不是體力上的弱勢，而是性別意識型態的作用，柿餅加工業分工上性別與階級仍有連結。

4.1. 女性化之勞動價值

從應徵開始，到職務安排，兩性受到不同的待遇，男性勞動者背負著責任、複雜的工作，實則是權力，女性勞動者則被視為暫時性的，其工作內容是不需要負太多責任、容易上手的工作，當然就是位在低技術階層，而男性勞工透過學徒制度學習到技術。

4.1.1 性別分工

男女分工由男女先天身體結構差異為考量，工作內容較為粗重由男性負責、需要細心削皮的工作就由女性擔任，另外因為男主外、女主內，男工工時較長可以待在工寮這裡，傍晚女工都要回家去燒飯洗衣。由此可見性別分工因不同性別的體力差異外，還因為社會所建構之性別特質區隔來看待此分工方式，削柿子皮的工作一定要由女性來做，因為女性較細心，能耐心處理細微的工作，這看起來客觀的想法，其實是用刻板的性別角色來看待女性勞動參與。此也回應鍾永豐（1994a）所提出的觀點，客家婦女雖然在生產活動中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大多屬於非技術性勞務，若將女性的削柿子工作與男性的工作做比較，削柿子是隨時都可以上手的工作，談不上技術。在生理差異與社會建構下，男性從事技術性的重要工作，女性則被認為論件計酬的廉價勞力，是對性別分工的一般看法。

但是，原屬男性負責、需要特別的技巧的捏壓柿餅，已非男工專職，老闆將原理和技巧傳授給削柿子師傅，若有需要師傅們也會捏柿子。

問：那妳有學捏嗎

答：有啊！也要啊，因為他沒有這麼多手腳，大家都一起捏，捏完然後再做，一個柿子來回要捏三次，今天捏一次又再給它曬，曬了明天又再給它捏，來回幫它按摩三次才可以吃，裡面要捏開來，沒有它不會散開來，會一塊一塊的，就是壓開來，給它糖化出來，它才會甜

問：每一次捏的力道都一樣嗎

答：是，都一樣，第一次捏法和第二次捏法不一樣

問：有什麼差別？

答：有啊，第一次整個硬硬，整個用力按開來，到第二次就不用那麼用力，妳就做好看一點，第三次就要整型這樣子，第二次還要稍微用一用再給它，它才會糖化出來，裡面才會甜，妳沒有捏它的話，它是硬硬的

問：這老闆都有教妳們？他連原理都教妳們？

答：對，會教，老闆都很好，他什麼都會教我們

問：他也不怕妳們會自己出去開？

答：呵呵，不可能啦！很難啦！

問：那什麼時候要出去捏？

答：老闆會說，要捏老闆會說今天要捏柿子，然後做好他要再去烘乾怎麼樣，那就是老闆的事，他自己會準備（F 訪談稿）。

以上對話可以發現：在全為女工的柿餅加工廠裡，師傅們雖然知道步驟與技巧，但照顧柿餅的每個動作都是老闆看柿餅乾燥的程度、天氣狀況下指令，時間的掌控才是生產柿餅的關鍵。老闆參與整個柿餅製作過程，傳承製作柿餅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會觀察天氣、溫度、濕度等隨時調整，知道任何一個變數對柿餅成敗的影響，聽指令行事的師傅們學不來，在師傅們的心中，這才是真正的技術。

產季的時候工作的時間長，每天的溫度跟濕度不一樣，可以說二十四小時要看柿餅的糖化作用，若是後熟作用太快就要去烘烤，若是慢一兩個鐘頭去烤會壞掉，顏色很快就會黑掉，該烤就要烤，工作時間長

就是要顧著他，若是其中有出一些小毛病，就會影響後面賺的利潤（A 柿農訪談稿）

有請男工的加工廠，有豐富經驗的男工負責照顧柿餅，能自行調度捏柿餅、上下架、烤柿餅等，但最終還是得聽老闆的指令，一次田野調查時，天氣時陰時晴，面對什麼時候該把柿棚上的柿子收下來、收多少等問題，剛好觀察到柿餅加工廠的管理層級，依序是老闆、老闆的親戚、男工、女工。由此可知製作柿餅關鍵性技術仍掌握在男性手中，相對的男性承擔的壓力較大。

老闆的二姐：還是不行擺，不行擺，又變了

男工 1：這是昨天的，沒有全部上，昨天剩下的啦，我烤一窯在那邊，剛才太陽很大，現在暗暗的

老闆：乾脆撤到這邊來，給他進來一點，這個雲比較危險

男工 1：走好快

男工 2：我們是看天吃飯（採自田野筆記）

廠長不好當，每天給別人叫來叫去，他們需要什麼我都要把他處理好，又怕他們累，沒有辦法，每天忙到十二點，晚上做捏壓的工作。我早上八點上班，忙到十二點，每天做十六小時，只有這個季節才這樣子，不是這個季節的話是沒有做那麼長。（採自田野筆記男工訪談稿）

在柿餅加工產業中，女性勞工數量增加仍無法跨越性別分工障礙，繼續從事低技術性的工作，即使工作內容有輪調，其流動也發生在女性化職業之間，例如服務性質的櫃臺、柿染教學助理、捏柿子等。這群削柿子婦女的工作內容屬於低技術性，工作也沒有升遷的可能，婦女清楚的認知到這一點，只希望把分內的工作做好，可以準時下班回家。

我來這裡很少削柿子，會幫忙老闆包裝、站櫃臺、做柿染那些，除非沒有學生團來，比較末了，我才會進去玩玩，這邊做觀光產業，染布啊什麼都要接觸到。這邊沒有加班，有時看他沒有做完就再做一下下，比較忙的時候，中午很少休息，總是想要拼命做，早一點下班，回家煮晚餐，因為我的小孩會回家吃晚餐（I 訪談稿）。

組織內結構和制度的建立、運作，反應性別意識型態，張晉芬（2002）在研究公營事業女性職員時發現，即使職務升遷、薪資給予、工作安排等表面上有制度可循，事實上是男性雇主或管理階層操弄的結果，組織中的制度是在鞏固原有的性別化結構，去身體化是實際的操作，其實是一種想像，女性的勞動價值受到貶抑。在性別分工的影響之下，婦女的勞動參與多在報酬低的初級產業活動中，嚴重低估女性對於家庭經濟的貢獻。

4.1.2 人力流動

這裡講的「流動」是在業者與業者之間，機器削皮後，削皮不是特別的技巧，誰來做都可以，老闆不會再花錢下訂，師傅選擇工作的機會相對來說很少，若是師傅自己想要跳槽自由度不大，田野調查時發現，現在的師傅多是在同一家工作，若不想在這一家做，就回家或找別的工作，甚少換家工作的情形。不想在柿餅加工廠上班的原因是這裡一年最多只能做五個月，其餘七個月沒有收入，若家中經濟需求較高，若身體狀況許可，就會去找全職工作，有些人來上班幾天嫌累就不做，有一些要帶小孩、帶孫子，等孫子大一點說不定會回來做。

削柿子可以細分成挖柿蒂和削柿子，這兩個工作薪資計算方式相異，挖柿蒂為計件，多做多得，削皮工為計時，在老闆的眼中這兩種人力是不同的。負責挖柿蒂的工人要將柿子一一挖去蒂頭，每天運多少來就挖多少，這個工作在削皮之前，若打（挖）得太慢，後段就沒有柿子可以削，因此挖柿蒂的人多半會比較早去上班，挖完就告一個段落，也就是下班了，挖柿蒂是獨立工作，且挖好柿蒂的柿子擺著不會壞，因此很多柿子時老闆會在晚上先把柿蒂挖好，隔天早上再削皮，挖柿蒂的人力來源多是家中的人力，例如：小孩、老人，當人力還是不足時，就會請挖柿蒂的師傅來，除了原本在這裡工作的師傅之外，也可以向其他的柿餅加工廠調人過來挖。挖柿蒂的師傅可以在各個柿餅加工廠流動，只要自己原本工作地點的柿蒂挖好了就可以到其他家去工作。有別於一個人挖蒂頭，削柿子至少需要兩個人合作，削皮工動作快當天就能有很多柿子可以曬，計時的削皮工應該要保持最佳的體力以達最大的生產量，因此削皮工晚上不能到其他家柿餅加工廠工作，業者之間有這樣的默契。

我在衛味佳做，那邊空的時候才能過來，有時人手不夠會調過來，有

時後收尾之後才會調到金漢（A 訪談稿）。

遇有想跳槽的員工，為避免尷尬亦顧及鄰居的感受，會向前一個雇主問明原因、是否真不續聘，再來考慮是否聘請。在柿餅季開始前，筆者到柿餅加工廠觀察前置作業時，發現對面柿餅加工廠的老闆娘騎著摩托車前來與這一家的老闆娘商量聘請工人的事宜，起因是對面柿餅加工廠的削皮工內部不合，有一位婦女今年想要換到這一家來削，老闆娘表面考慮，私底下向原雇主問明跳槽原因。在考量過後，若是要讓該員工換到第二個柿餅加工廠上班，其工作一定是先挖一年柿蒂，雇主觀察表現，可以的話，明年才會加入削柿子的行列，這可以說是柿餅加工業的潛規則。

另外，在觀察期間適逢一對退休的夫妻到柿餅加工廠來詢問是否有工作機會，老闆娘表示沒有缺人力，但可以留下資料，待過幾天每年開工前柿餅產銷班的產銷會議時，會把多餘的人力資料開放，有需要的柿餅加工廠會拿去使用，由此也能看出現在柿餅加工產業中人力供過於求。

4.1.3 薪資制度

柿餅業者的薪資計算方式依據工作內容分為三種，分別是男工、挖柿蒂和削皮工。男工的薪資計算方式從以前到現在都是計工，改變的只是薪資高低，最高一工是 2,000 元。挖柿蒂是計件，挖一件 50 斤約 70 元，男女老少都可以做，手腳快的人一天可以挖 16 件。從第一代到第三代，只有削皮工薪資計算方式由計件演變為計工，再由計工到現在的計時。在削皮機器出現之前，採計件制，多做多得，鼓勵想要賺錢的人，讓當時家中經濟狀況不佳的婦女，半夜兩、三點就開始工作到傍晚，連續三個月以上不間斷，以現在勞基法來看，十分不合理，礙於師傅不好找，削皮機出現後有一段時間採計工，一天多少錢，慢慢的轉變為計時制，一小時 100 元。

計時給薪方式有兩個人例外，採計工，一天 1,000 元，一位 88 歲的柿蒂阿婆，從年輕時開始挖柿蒂至今，從一件五毛錢做到一件 70 元，雖然年紀大手腳仍十分俐落，阿婆的薪資和其他人計算方式不一樣，雖然計工沒有生產數量的壓力，她十分敬業，自我要求高會給自己壓力，不讓自己的動作慢下來，從早上七點上班到下午五點工作 10 個小時，除了上廁所之外，不願休息，也只帶了一小杯水放在旁邊，話不多的她，都是等到別人講笑話的時候才會跟著笑，多

半時間默默低頭挖柿蒂，從不鬆懈。另一位阿婆是削皮師傅，老闆稱他為前朝元老，是同學的媽媽，她們經歷過摸黑上工連拼十五個小時的苦日子，雖然年紀大了手腳仍然很快，算工代表老闆感謝她們從前的貢獻與敬意，再次回應老闆自己說的：「柿餅業是很有感情的」，老闆不僅只是把這句話放在心裡，也在工作上充分展現，這樣的作法讓員工們自願為老闆付出勞力。

柿餅加工業濃濃的人情味也在發放薪資時展現，第二代柿餅業者薪資發放方式相同，以前人情味濃厚，原料、材料相關業者知道老闆現金不多，原料、工具都是削完一季總結算之後再給錢，工資要等到做完工、拜土地公，打打牙祭的時候才將所有薪資一次發放，因為早期都是隔壁鄰居來幫忙，瞭解彼此經濟能力，可以接受這樣的給薪方式，這背後代表互相信任也能看到對彼此的體諒。到了第三代兩位業者，上游廠商請款時間由一季改為一週，有的一個月發一次員工薪水，有的延續傳統，柿餅季結束完工時才發，其背後的理念是讓工人了解過去柿餅製作是在農業社會互助合作下完成，大家一起幫忙，彼此信任，薪資發放方式不同，各有自己的考量。不過，若員工手頭緊需要用現金，可以跟老闆先拿，甚至是超過薪水也可以，老闆相信員工若非必要不會輕易開口，也不怕員工預借工錢就不見，延續農業時期互助合作的信任感。師傅們可以體恤老闆在產季時資金周轉大，對於薪資發放時間多持正面態度，對於薪水何時發放沒有太大的意見，回應到前文所說這份收入並非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而是補貼性質，沒有急迫性。

他慢點給我們，我們現在沒有急用，三個月發比較不會花掉，拿到一大筆存起來，過年的時候要拜拜（G 訪談稿）。

賺了錢妳一定存著啊，妳沒有說亂花啊，該花的就要花啊，不是說要養家活口，我們是不用啊，都是賺來自己用，啊等出國要用就拿來用啊就這樣子（F 訪談稿）

面對薪資計算方式的不同，師傅們的想法各異，第一代婦女年輕時削柿子採算簍的計件制，現在為計工，若比較三者，A 認為計件打多少算多少比較輕鬆，計工是算天不敢鬆懈，因為這樣對老闆不好意思，而且一天上班時數是十個小時，時薪 100 元和一工 1,000 元兩者對於個性耿直不偷工的她們來說是一

樣的意思。D 認為計件多做多得比較拼，但是結果差不多。L 婚前在紡織工廠工作採計件制，她比較喜歡計時制，因為採計時制壓力沒那麼大，這背後的壓力源自於工作時的自律與他律。

算籠比較自然(輕鬆)，不必打那麼多、那麼緊，剛學的時候打比較慢，是算件，不然老闆會吃虧，現在會了算工可以，不然我們算工的人很緊頭，會不好意思，會拼。一小時一百元，一天一千，大約大約，工錢和算工的差不多，沒有什麼漲價(A 訪談稿)。

以前是削件的，後來是削工的。削件的就比較拼，結果差不多(D 訪談稿)。

那紡織計件就是大家都在拼，這個老闆是算小時，當然比較好(L 訪談稿)。

計件制的核心—單價制訂過程中呈現出「天花板現象」，指的是雇主在訂定單價時，以一個工人用正常工作速度工作和一般工資行情等兩個因素來制訂，呈現的第一個面向是用一般日薪或月薪來換算單價，第二個面向是當雇主認定這個事頭容易時，會將單價定得很低，計件制其實是變形的計時制(謝國雄，1997：110)。挖柿蒂被認為是最簡單的工作，採計件制，一件 75 元，從以下對話可以知道採計件制的挖柿蒂工作，即使很努力拼件，一天最多能賺 1,200 元。在柿餅加工業裡，薪資計算出現三種方式：計件、計工和計時，終究是在「天花板」下面。

問：你的薪水怎麼算？

挖柿蒂大哥：我是算籠的

問：一籠多少錢？

挖柿蒂大哥：75 元

問：你最高記錄多少？

挖柿蒂大哥：16 籠，要很早來，睡飽一點(採自田野筆記)

究竟時薪與件酬是怎麼訂的呢？婦女如何看待這樣的薪資？老闆考量成本

只能提供這樣的薪資，師傅們對於薪資問題較為敏感不願意多講，訪談中感受到她們可以接受但稱不上滿意，勞雇雙方的利益經由工作現場的制度安排與運作，而得到調和（謝國雄 1997：8）。

若沒有她們，我也沒有可以賣，但要我出很多錢去請工人，我成本太高，我的工作環境是有冷氣，有年紀，沒有風險，一個小時 100 元應該可以，我也不打算增加我的成本（A 柿農訪談稿）。

我們就加減啦！也不能多說什麼，既然我們要做，老闆他也不會虧待我們（I 訪談稿）。

每天都腰痠背痛的，本來就是很累的工作，一個小時 100 塊也不好賺，可是老闆只能出到這樣子（K 訪談稿）。

台灣的計件制沒有底薪，有做有錢，沒做沒錢，加班沒有加班費，簡言之是沒有基本保障的純計件制（謝國雄 1997：136），削柿子的工作現場讓師傅的生產量透明化，師傅們在工作時若不是老闆說休息，沒有人會停下手上的工作，當然也有展現個人能力的意思，彼此之間互相牽制，手腳慢的會被嫌，表現出自律與他律行為，雖沒有拼件的壓力，但已達到「趕工」的程度，柿餅加工業的計時制呈現出計件制的特性，柿餅加工業的計時制其實是變形的計件制。

4.2. 僱傭關係

老闆和師傅之間沒有簽勞動契約，師傅會來削柿子多是經過認識的人介紹，工作環境有十分濃厚的人情味。從前手工削皮時，柿子在削皮之後若不馬上乾燥會產生褐變，在北風強的時候，婦女們凌晨兩三點就要開始削，柿子才有較長風乾日曬的時間，會削皮的師傅十分搶手，老闆會「下訂錢」給師傅以確保人力。

做完結束那天，吃飽之後發工錢，再丟個三千元，這是明年的訂金，如果你來做，那個訂金就沒有扣，送給你這樣子，這樣班底會比較固定，以前比較講江湖道義，我訂金不收，不一定明年我要到哪裡去可

能不來做，不敢答應你，那我的心中就有底了（A 柿農訪談稿）。

從以下 D 和 E 的言談中可以知道師傅能選擇收或不收訂錢，「訂錢」對師傅來說雖是來年工作保障亦是一個承諾，不會隨便答應，答應了老闆就會做到產季結束，若老闆人很好，師傅會固定在這一家削，不會換老闆，勞雇雙方彼此信任，「下訂錢」的習慣慢慢消失。

我不曾拿人的訂金，我有空就會去，拿訂金反而難過，沒去又不行。
大部分的人會拿訂金。我不敢答應，能去我就會去（D 訪談稿）。

以前有拿訂錢，不過我們不會走，所以沒有拿了。老闆好，我們不會一家一家換，老闆不會刁我們自由讓我們做（E 訪談稿）。

觀察柿餅產業，工業革命後機器生產力大增，削皮機一天可以削 1,500 斤，老闆把勞動力彈性化，生產過程被切為片段，勞動力地位、技術評價下降，資方認定技術高低來給薪，資方視削柿子為柿餅製作過程中技術性最低的步驟，對於師傅的需求不同於從前，手工削皮已不是必須，技術降低至會把皮削掉這個基本步驟就可以，一個能接受產季工時密集、肯做、肯學的人就可以來，削皮師傅的可取代性高，流動性變大，若有事請假，不難調配工作，上班時間變得彈性。但因為工作內容種類多、人力訓練需要時間，一個熟練的師傅能讓柿餅產量提高，業者仍希望能有固定的班底。

後來再找的多是沒有經驗的，偶爾我會在旁邊看，上次遇到一個學不會又講不聽的，隔年我就不找他（B 柿農訪談稿）。

有別於一般公司電子鐘打卡方式，工人上班、中間要離開或下班自己把時間寫在卡片上，代表老闆對員工的信任，三十分以內的算半個鐘頭，超過四十五分的算一個小時，不會占員工便宜。計時的好處是非常彈性，對老闆而言，員工多做多得，需要員工加班也有給薪，員工並不會吃虧，若員工有事要請假，幾個小時事情忙完之後會回來上班，對亟需人力的柿餅產季而言，人力配合度高就能增加收入。對員工來說，計時非常彈性，每個人與老闆都有同舟共濟的

團結心盡量不要請假，但總會有些事情是必須利用白天的時間去辦，老闆給予彈性，員工的心裡較不會有歉疚感，來上班做起工作十分得心應手。

以前手工削，拼件比較累，好天氣他們兩三點就跑著來削，因為大家都喜歡賺錢，客家人比較勤快，機器研發出來之後薪水就算工，他們不必那麼緊張也不用那麼早來，我們按時間給他，他們這樣也好，他們也說我家裡有小孩有孫子要弄好來，所以變成說七點上班五點下班固定時間上下班方式，每家都有家務事，他們家裡打點好了就過來上班（A 柿農訪談稿）。

還沒開工時，師傅們都是在家裡等電話，而每年開工時間早晚受到兩個因素影響，一是原料柿供應，被氣候左右，不能人為控制，二是銷售方式，若是批發，愈早上市價格愈好，因此開工時間較早，若以觀光零售為主，沒有客人被搶走的壓力，會等柿子熟一點才開工，連帶受到影響是師傅們上班的時間，開工前老闆會自己打電話一一通知師傅來上班，同樣是在旱坑里削柿子的師傅，眼看別家工廠已經開工，自己卻還沒有接到老闆電話，心裡會緊張擔心是否今年不會叫她去上班，老闆掌握是否雇用該師傅的權力。

張惠君（2009）研究峨眉地區採茶婦女時的發現茶行老闆在聯繫採茶事項時會通知領袖阿婆，領袖阿婆是茶行老闆和其他採茶者的中間人，負責聯繫時間、地點等工作內容，茶行老闆與採茶婦女之間的互動極少，也不熟識所有的採茶阿婆，上與下的關係鞏固，茶行老闆無形中剝削了這群勞動婦女，相較之下柿餅產業同是客家產業，雇佣關係人情味較為濃厚，老闆與師傅之間是垂直聯繫，老闆瞭解每一個師傅家庭狀況，知道今天星期幾，誰可以來誰不能來，哪些人可能會晚點到或早點走，若是員工沒有事前說會晚點來上班，到了上班時間卻沒有出現，老闆還會擔心員工的安危或家中是否有狀況，顯見老闆與員工之間情感緊密，這樣的關係影響到老闆對於員工們的管理方式，因為太熟了，熟到不好意思管，形成無為而治的管理。

從前女工們採計件制多做多得，大家都埋頭拼件，老闆不能請她做像掃地這種沒有薪水的工作。相較之下，現在計時的好處是較有人情味，所有員工同工同酬會互相支援並建立情感，突然下雨，不必老闆催促，大家都衝出去收柿子，沒有分別心，大家成為一個工作團隊，而這個團隊的管理者，也就是接手

的第三代柿農，年紀輕，所聘請的師傅年紀多半比自己大，對於師傅們除了要求柿餅的品質外，甚少開口干涉，將心比心尊重她們使工作愉快，讓女工自成一箇責任中心，彼此的工作分配十分有默契，若櫃臺沒人，遞補的第一順位、第二順位會自動移動到櫃臺，老闆在這裡是隱形的，無為而治的管理背後預設了婦女們會自動自發，工作現場的安排則強化了彼此約束。

該休息就休息，老闆他也不會管我們，他兩夫妻不會像別的老闆這樣盯著，一些老闆就坐著跟你們一起削。我們不是說會偷懶那一些的，我們就是會自己找工作做，我們找沒有了，我們問老闆你還有沒有工作，做沒有了我們就回家，做的工作就是這樣（I 訪談稿）。

老闆在整個柿餅加工廠擔任指揮的工作，老闆的習慣動作就是抬起頭看看天空，遠方的一片烏雲就會讓他們感到精神緊繃，大部分的壓力扛在他的肩膀上，A 柿農開玩笑說：「我是白天做、晚上做，做死掉。」即使如此忙碌，貼心的老闆總會準備點心給師傅們享用，且儘量不重複樣式，還邀請我留下來用午餐，體會到老闆所說：「我們這邊都是有感情的。」在充滿人情味的工作場所上班的婦女們，他們的年紀大多長於老闆，老闆出錢聘僱他們，在管理員工方面拿捏需十分到位，師傅與老闆之間的僱傭關係十分微妙。

雖說同工同酬，彼此沒有升遷的衝突，不需計較，但職場並非如此單純，每個人的年紀、資歷、背景不同，工作內容不盡相同，削皮機旁的工作有放柿子到削皮機上、檢視、柿篩滿了要端走，還有捏壓、包裝、櫃臺等，婦女們心中有職等排序，從 I 的經驗觀察到，在職位間橫向流動時，檯面下似乎有一股角力左右。

捏柿子手很痛，有時候挖蒂頭的人沒有挖平，很容易會刺到，有些人會說我不願意去做，我要去削皮，比起來其他工作，削皮是最輕鬆的（K 訪談稿）。

第一年工作的時候，別人看我不順眼，剛來怎麼會站櫃台那個位子，好像高人一等，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說，我一個人顧櫃台會不會有些客人偷東西沒看到、會不會給人家吃掉很多、又或者是沒收到錢，甚至

懷疑我拿錢，就變說新來的都要過她那一關，沒過她那一關，過不了那一關，妳就做不下去（I 訪談稿）。

偶有不愉快的狀況出現，老闆為了要保持立場中立，會請他人居中協調，工作氣氛融洽才能達到最高生產量，非到必要時刻老闆不會出面。

老闆兩夫妻最聰明的一點就是他不出面跟你解釋，他就是有什麼事情就會在我們面前講，要我們去傳話（K 訪談稿）。

田野調查時發現在工作團體中，有人個性比較直，或想要成為工作團隊的頭頭，影響師傅們削柿子的工作氣氛，老闆想要摒除這樣的風氣，會考慮不續聘某些師傅，但礙於人情也只得打電話請他來工作，只是通知的時間會比較晚，不讓她在柿餅季一開始就有機會進入團體。

上次她搞一件事很大，我請阿清去處理。其實我不想叫她來，只是上次我太太在市場買菜遇到她，她還說：「今年一定要叫我來削。」我不好意思，還是打電話叫她來，只是比較晚打（B 柿農訪談稿）。

這就是老闆出面的處理方式－讓她晚點來上班，脫離不了人情的框架，沒有在眾人面前講一句話，卻讓大家知道：我已經處理了！

4.3. 做件意識

柿餅產季集中在每年初秋到過年前，在這五個月當中，老闆負責外場、接待，幾乎 24 小時待命照顧柿餅，老闆娘負責原料，對於人力的需求每天都一樣，沒有週休二日，師傅們認為生產足量的柿餅是分內的工作，對於柿餅產量自己會有壓力，若非必要不會請假，非不得已請假只要告知老闆一聲並在卡片上記錄進出的時間即可，雇佣關係呈現出「認份觀」與「互相觀」兩種文化氛圍，「認份」是師傅把本分內工作做好，老闆和員工之間「互相」，強化了計件制度運作帶來做件意識，產生意識型態後果：擬似「小頭家意識」、「純勞動意識」、「虛擬的自由意識」（謝國雄 1998：115-118）。

師傅們在工作時不像是受雇者，像小頭家，表現出自負風險、截長補短、自助自控意識等。有經驗的女工會依庫存量、推算銷售量來調整加班與否，由於製作柿餅需要七天，女工會估計七天後柿餅成品量，每遇假日遊客多需求多，庫存變少，若不足，今天就會加班多削一些，以供下一個假日銷售。有一次，遇到日子很漂亮的假日，原本有好幾個要休假去吃喜酒，老闆不好意思拒絕，就請了一些親戚來幫忙當作替補人力，結果當天沒人休假，轉變的因素就是其中一位員工去翻電話紀錄簿，看到當天有很多團體預約參觀，若有人休假的話，老闆會忙不過來，遂打電話叫她們不要休。剛開工時牛心柿採收量比較少，老闆會把師傅都一起叫來上班，削到十一點吃過午飯就下班，讓她們知道工作量多寡，下一次要叫誰，師傅心裡有譜，不會計較或者是為難老闆，若柿子沒那麼多，大家早回家，就沒有薪資，柿子盛產時供應商每天都會載來上千斤柿子，一籃一籃堆疊在削柿子機器附近，師傅們心理有壓力，F 說採完放這邊爛掉，算「我們」的不行啊！師傅們自發性停止休假、自動晚些下班，把工作做完，如果今天做不完，就明天早上提早來。

問：是老闆會跟妳們說要加班？

答：沒有，他不會，都我們自己說，車子會一直載來就知道柿子多，看多，妳就要做晚一點，很多柿子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加班到七、八點，天黑了，老闆還會買晚餐給我們吃，吃飽再做這樣子，他人很好，沒有柿子的話我們就早一點回家。

問：會有人帶頭嗎？

答：對啊，一定會有人先發起，講一下，就互相這樣子（F 訪談稿）。

從訪談中得知這個工作團隊沒有一定的領導人，若需有加班的情況，會「有人」先發起，大家就會順著意思做，從這一點看到在這裡上班的女工們，不僅自律地要求自己動作快，彼此之間還有他律，透過員工之間自行協調、約束。

非產季時這邊沒工作，可以去別的地方，造成來去自如的感覺，婦女們在柿餅產季外的空檔時間，有機會就去做其他工作，是婦女們一年當中削柿子工作外的其他有酬勞動。實際上師傅處於被動待命狀態，沒有薪水，產季時則要趕工加班，是虛擬的自由。田野調查走訪兩家轉型觀光的柿餅加工廠，B 柿農只聘女工，所有的人都要做一樣的事情，一起削柿子、一起捏柿子，形成工作

團隊，「做件意識」特別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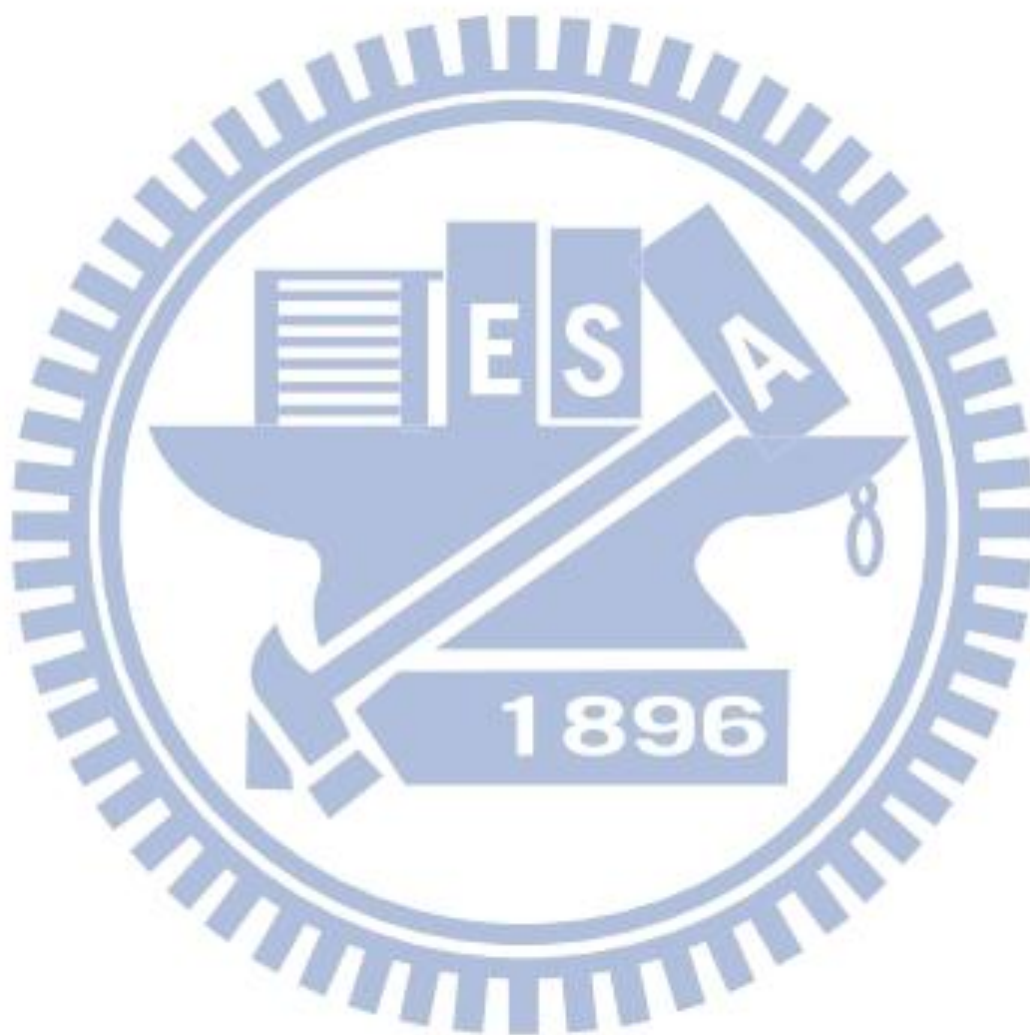
4.4. 小結

「認分觀」和「互相觀」加強做件意識氛圍，師傅們認為拿了老闆的錢就要把分內工作做好，個人表現出自律，呈現出趕工狀態，師傅們的自律展還現在用餐時間，平時七點上班，五點下班，中午吃飯時間沒有扣薪水，師傅們習慣吃飽就上工，沒有休息，因為這樣才不會對老闆不好意思，認分也是體恤老闆的表現，互相幫忙把柿餅做好。採茶婦女勞動時也發生同樣的情況，黃淑鈴（1998）研究南投高山茶區採茶組織時發現婦女是鄉村裡可以動員的勞力，透過街坊鄰居的人際連結為採茶的勞動組織，加上分工的勞動使採茶工作女性化，婦女被編排到次級的勞動市場，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老年婦女又位居女性勞動市場更邊緣的位置，採茶婦女雖能從工作中得到經濟自主，但從人際互動產生一套工作規範，即恪守忠誠、服從與極力的剝削自我勞動力。

Burawoy 認為資本主義式勞動過程的本質是「同時隱晦與取得剩餘價值」，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在一定條件下，透過一定的機制來確定與取得剩餘價值，勞雇雙方的利益可經由工作現場的制度安排與運作得到調和，勞動者對於資本主制度心甘情願的順服，也就是「志願性順服」的現象（謝國雄，1997：8），國內學者對於「志願性順服」有不同的看法，劉梅君（1997）認為「志願性順服」是資方對生產過程安排的勞動控制，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意識型態上不得已的自我蒙蔽，消解反抗意識或階級意識，謝國雄（1998）解讀為工人是心甘情願的順服。在柿餅產業裡，師傅收入的多寡完全看工作量變化，「有做有錢，沒做沒錢」，沒有加班費、底薪等，長達五個月的產季中，並不是每天上班時數都一樣，A 說現在是算時，不然早下班老闆就吃虧了。會扣時間，看卡就知道，這樣比較公平。最後還加上一句：「這樣比較公平。」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對於這個制度心服口服。勞雇雙方對於薪資、工作現場的制度安排與運作有「共識」，勞動者心甘情願的順服制度之下，因此在柿餅產業中師傅們呈現出來志願性順服現象比較接近謝國雄的解讀。

在這個工作團隊裡女工們意識中的自律，外發至彼此之間的他律，是無形的管理核心，亦塑造了婦女對工作的認同。從婦女的角度而論，訪談中提到老闆的時候，師傅回答的第一句都是：「人很好，老闆對我們都很好。」削柿子即使需要身體勞動，大多數婦女給予正面的肯定，對工作的解讀為一份好工作，

表示她們認同這一份工作，也從工作當中建立自我認同，工作對婦女而言有多重意義。



五、工作的多重意義

在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傳統性別角色的認知中，女性的主要活動空間為家，女性社會地位的認定多取決於家中的男性成員，但在社會風氣、工業化的影響下，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大增，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婦女勞動力逐漸受到重視，女性的活動領域從家擴展到勞動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指出即使兩性教育程度相似，女性就業常受制於婚姻、生育等家庭因素，甚至造成職業生涯的中斷，使得婦女人力資本與工作經驗出現斷裂，影響職業流動機會、薪資報酬落後、職業地位下降（薛承泰、簡文吟 1997），除受到外在條件限制，女性往往會將家庭照顧視為己任，再回到職場時，優先考量家庭，工作可能對家庭造成衝突，削柿子的師傅在兩者之間是兼顧還是兩難？我們試圖瞭解婦女面對這樣的處境如何取捨，並探討工作對於婦女的意義。

5.1. 生命的轉折點

身兼數職的婦女，在多樣角色下負擔許多工作，當這些工作時間互相衝突，必須取捨優先順序，不同世代婦女因擁有的資源以及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在面臨轉折點時有不同的抉擇，我們可以從女性生命歷程中的轉折點，來瞭解她們面對家庭、社會經濟結構轉變時的選擇及應變方式。

第一個轉折點是教育程度與婚前的工作，透過這兩點能瞭解時代背景與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第一代婦女教育程度及婚前工作十分類似，她們出生於農家，與生俱來的使命就是要幫忙家裡，教育程度皆在國小或國小以下，婚前要做家務、務農。B 訪談者身為長女因為爸爸過世得早，家中的重擔落在她的身上，婚前的工作除農務、家務之外還有照顧弟妹，責任心重的她直到弟妹各自嫁娶之後自己才結婚，第二代婦女的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上，婚前都有外出工作經驗，除家庭環境之外，使兩代之間差異大的主因為時代背景。

問：你以前做過什麼工作？

答：唉～照顧小孩子就夠了，這麼多小孩

問：還沒結婚前？

答：爸爸四十歲過世，弟弟妹妹都是我在家裡照顧

問：你要做農事嗎？

答：有耕橘子園，在家裡照顧老小

問：所以你要摘橘子、茶園

答：茶園比較少，做到嫁人，妹妹先嫁，我最後嫁（B 訪談稿）。

第二個轉折點是結婚，結婚在女性生命中是最大的轉折點，代表離開原生家庭，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多了「妻子」和「媳婦」兩個身份，配偶的勞動狀況會影響生活與工作選擇，這一個轉折點可以讓我們瞭解女性的處境與考量，女性勞動參與行為有多樣性，主要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不論目前是否工作，婚姻是半數以上婦女的離職原因（蔡青龍 1988）。經由訪談發現婦女婚後尚未生育，工作並不影響生活的前提下仍有可能會因先生的意見而放棄原有的工作。J 從原本美髮店老闆的身份轉變為雇員，從訪談語氣中感受到在這段婚姻當中必須屈服於先生的無奈。

問：你婚前美髮工作是自己開還是幫人家做？

答：我是自己開

問：那很厲害呀！後來收掉，那不是很可惜嗎？

答：做那麼久了，那麼多年了，我十幾歲就去學，可惜也沒有辦法

問：為什麼沒有繼續？是你老公的意思嗎？

答：沒有那個...沒有辦法做就沒有辦法做，我老公不肯就過來

問：他為什麼會不肯，那個收入不是比較高？

答：那很難講，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J 訪談稿）

第三個點是生育，女性增加了「母親」這個身份，生育讓生命踏入另一個階段，家庭的牽絆可能會使女性短期或長時間離開勞動市場，回到家庭，家中六歲以下子女會對已婚婦女形成羈絆，已婚婦女因為結婚和生育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行為非常明顯（張晉芬 1999）。第一代婦女婚後只有削柿子這個季節性工作，孩子出生讓她們暫停外出工作，直到孩子上國小之後才重返削柿子的行列。第二代婦女生育之後除了 F 自己開美髮店能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小孩之外，其他都是暫時放掉工作，留在家裡帶小孩，兩代婦女工作皆受到生育影響。

小孩小的時候沒有削，最小的小孩六歲去上課了，我才來削（A 訪談

稿)

小孩小的時候沒有空，就比較沒有去削（D 訪談稿）。

小孩比較小的時候，有空時才能去削，後來二十多年，持續有去削，沒有減工（E 訪談稿）。

第四個是婚後的工作，婦女工作的動機主要是賺錢，當妻子、母親這個角色與工作有衝突時，婦女先考量家庭環境，若有人照顧幼兒，就可以放心外出工作，重返職場，可能面對是否能延續婚前工作，或者是改變僱用的形式等問題，其就業軌跡就是瞭解婦女家庭地位最好的角度。

第五個是當祖母、外婆時，婦女在兒女長大結束求學階段，各自外出工作賺錢之後，家庭經濟重擔減輕，始有多餘的時間能讓身心歇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為婦女外出工作的最佳時機，婦女會考量工作時間、內容、地點與薪資等，選擇可以接受的工作，當孫兒出生之後，多會放棄工作，回家帶孫兒，考量是兒子媳婦都要上班，請保母帶還要花錢，不如自己帶，如此體貼地為兒女著想，她們下一次再回到職場時，就是孫兒達學齡期。

有一些說他要帶小孩、帶孫子，等孫子大一點他會回來做，實際上要不要回來就是看他的年紀、身體狀況（B 柿農訪談稿）。

婦女的勞動參與受到過去工作經驗、生命週期、景氣、家人期待的影響，如同研究香港中年女工生命史時發現女工的一生就是不斷抗拒結構限制和命運安排的一生，從原生家庭中成長，婚後成立新的家，接下來生育子女、子女成長、子女結婚，每個時段有著不同的角色變化，她們的就業取向和選擇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古學斌、邱延亮 1997）。以上一連串的轉折點代表面臨抉擇，也影響下一個轉折點的發生，總和起來就是女性生命史。

5.2. 兼顧家庭

婦女婚後退出職場多年，待孩子長大有餘力時，在兼顧家庭的前提下找工作，半職工作常是最佳選擇，先生也支持她們，婦女們對於分配時間的想法為以家庭生活為中心，有多餘的時間再找工作「打發」時間，劉鶯釧（1988）利用民國七十五年台灣地區勞動力調查研究勞動參與時發現有偶婦女對半職（part-time）工作的參與，擁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

有叫我，我就會來，反正在家裡也是要工作（A 訪談稿）。

會碌會碌，又不是說很不會做身體不健，會跑會做，老闆會叫，不肯我們放，家裡只有我一個，這裡比較多人，嘻嘻哈哈日子過的比較快，很有趣，也不會被日頭曬到，不用回家吃飯，吃他一餐（E 訪談稿）。

一樣要做啦，我在家也是無聊啊！（G 訪談稿）

婦女們對於自己外出工作的勞動力分配擁有自主性，但不論是有薪資的勞動或家務勞動仍然被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約束，做著女性的工作。當筆者在訪談時間「除了削柿子，你還有其它的工作嗎？」她們多答「我沒有幫人家做，家裡還有事，很忙！」，究竟家裡的「事」有哪些？她們的回答皆是煮飯、洗衣、打掃、種菜等答案，把家務和種菜、餵雞歸屬為同一層級的勞動工作，且都是女性的工作。

家裡還有事啊，難道還坐著聊（休息）嗎？你看我做著事，衣服還濕濕的。早上晚上我會澆菜，瑣瑣碎碎的事情，男人不會做，因為他們做不習慣，哪會做？我兒子在家裡，他們會看家，我就是澆菜、煮飯來吃，都是我自己做（A 訪談稿）。

訪問當天約在早上十點，A 剛忙完農事衣服濕了一大半，從 A 的一句話難道還坐著聊（休息）嗎？可以明白即使沒有去挖柿蒂，也不會在家中坐著休息，因家中的男性不會做瑣瑣碎碎的事，只負責看家，是家對外的窗口。在第一代

婦女的先生裡有四位家中有田地需耕種，除了一位外出工作領別人薪水，其他三位的主要工作都是務農，男性負擔家庭經濟理應要全權負責農事，婦女就負責家務及育兒，但實際上這些婦女身為農家女，從小學會農事、習於農事，婚後除了家務之外幾乎每天都必須要下田工作，根據研究結果夫妻之間在農事也有分工，當農家生產水稻、蔬菜傳統性作物時，婦女的農場工作經驗以勞力投入為主，負責例行性或持久耐力的工作，先生負責對外的社會網絡、肥料農藥施用（劉清榕、李青松、張明瑜 1996）。

當夫妻兩人都自職場退休後，家務分工改變不大，男性退休後在家中「看家」，偶爾會處理部分家務，在婦女們削柿子期間，男性會自己簡單料理午餐，婦女們五點下班回家仍要煮飯、洗衣，依舊是家務工作的主力。此也回應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2000）研究，台灣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的普遍化，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參與家務工作的程度，並不因妻子就業的工資率及在外工作時間長，遷就現實的需要而多做家務。

他會自己去買，如果有剩飯會熱一熱來吃，有時候燙水餃啊，弄湯弄麵啊，家裡都會買著儲備，放點油蔥干貝醬，麵燙一邊拌一拌就可以吃，回去我就會弄菜給他們吃，煮晚餐啊（F 訪談稿）。

田野調查時在柿餅加工廠問師傅們「既然很忙，那為什麼還要來削柿子呢？」一位心直口快的師傅回答「你真傻，當然是為了錢，不然幹嘛來？」道出身上背負的經濟壓力。但是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婦女是否陷入兩難的抉擇？I 認為正常的工作才不會影響自己照顧家庭的本分，把時間先分配給家庭，照顧家庭是理所當然的事。

問：你出來工作是為了賺錢嗎？

答：打發時間，我要找都會找正常的工作、能兼顧家庭的工作，像我之前孩子要回來吃飯，時間到我要回家煮菜什麼的。

問：還是以家庭為重就對了？

答：當然啊！（I 訪談稿）

時間彈性讓婦女們能兼顧家庭和工作，比較基礎是一般公司行號，削柿子

請假容易，說一聲就可以，因老闆把影響產量的人力因素降到最低，季節性工作人力吃緊，師傅明瞭自己請假對產量的影響，會盡量減少請假，若家裡真的有事，師傅也能自由的上下班，心中不會有負擔。

除非有事情我才會請假，像我們自己會安排到外面去玩啊，那時我才会休假，那是之前就有安排好的，不然我不會一直請假，有時老闆也不喜歡（I 訪談稿）。

來這邊做比較自由，對我來講是比較輕鬆一點的，我所謂的輕鬆是我可以顧到小孩，又可以賺到生活費就這樣子的輕鬆，不是工作上的輕鬆。老闆說我們隨時可以請假，如果老師有打電話來說小孩子什麼問題，就可以給我請，就是扣錢而已嘛，但是一般的公司是不可以這樣子的（K 訪談稿）。

其實其他工作收入是比較穩定，我的宗旨就是以小孩子為主，工作要做，但是小孩子比較優先（K 訪談稿）。

當家庭主婦要張羅三餐、操持家務，感覺在家裡也要工作，削柿子不僅能賺錢，還吃老闆一餐，吃飯時間不扣薪水，在體能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願意去削柿子，還能擴大生活圈，增加生活樂趣，對師傅們來說削柿子這份工作真的很好，工時彈性能兼顧家庭，不會蠟燭兩頭燒。由此可以觀察家庭是婦女生活的重心，削柿子能兼顧家庭，是好工作、輕鬆的工作，成為她們心中認同的工作，但是一天最少工作十個小時，連續五個月，裝滿柿子的竹篩重達 25 斤，其實一點也不輕鬆，輕鬆是心理上的感受，是能兼顧家庭帶來的安全感。

5.3. 有收入

「錢不是萬能，沒錢，萬萬不能。」來柿餅加工廠工作的婦女多達退休年齡，領有政府發放的老人年金，孩子長大外出工作會拿家用回來，勤儉的婦女們對於子女每個月拿出來的家用無不精算，每一塊錢都是用在刀口上不會亂花，若子女提供的家用不夠，這裡賺得的薪資也能拿錢出來補貼，以減輕孩子的負擔，對自己也是一種肯定。偶爾有自己想要買的東西，雖子女皆有孝心，

這時手邊有錢運用，不必向他人開口，用起來也比較自在。

自己用，看要用什麼，例如旅行等。若家裡有需要，還是多少會幫忙。要用的時候出國旅行不必跟他拿，自己方便有自由（E 訪談稿）。

這麼辛苦賺的都捨不得花，到要花的時候再拿出來花。我們家庭生活也還好啦，多少會挪來家用，就是要人情那些的包禮（I 訪談稿）。

我兒子每個月拿一萬塊給我，有時一萬塊家裡不夠用就拿出來倒貼一下，有時候白包紅包不夠包，我就拿出來包，我們也是要節省一點給小孩子、孫子長大後要用（G 訪談稿）。

削柿子屬於季節性的工作，除了柿餅產季之外，婦女們沒有到柿餅工廠工作，非柿餅產季時，有些師傅們會做其他工作，以下整理師傅們削柿子之外的其他有酬勞動工作：

5.3.1 賣玉蘭花

B 有種兩叢玉蘭花，每年四五月花季時，就摘玉蘭花來賣，由於不知道銷路好不好，一開始先拿去新埔街上茶店寄賣，沒想到很快就賣光，茶店老闆看反應這麼好叫她乾脆拿去新竹賣，結果很快又賣光，B 很開心，一方面是因為玉蘭花不必本錢，摘到就可以賣，賣的收入只要扣掉坐公車到新竹的車錢，剩下的都是淨賺，除了增加收入之外，顧客指定購買她的花，也帶給 B 自信，除此之外，這個工作與柿餅季不相衝突，玉蘭花季結束時，差不多又可以去削柿子。

賣玉蘭花沒有時間性，摘好就坐公車出去，現在我有很多主顧，一間一間，他說我的花比較香，怎樣都是要買我的（B 訪談稿）

不過，B 已經 84 歲，向 B 買玉蘭花的客人常會問她說為什麼年紀這麼大還要出來賣花？誤認她的家庭經濟狀況不好，子孫們亦不希望她再出去工作，現在 B 沒有在柿餅加工廠削柿子或外出賣花，只有假日遊客多的時候，老闆會拜託她去手工削皮給遊客照相，其餘空閒的時間就照顧家裡，家中只有兩夫妻，

難免冷清，假日兒子才會回來吃飯，聽到兒子要回來，要去買菜、煮菜，也是很忙，語氣中可以感受到阿婆十分期待兒女回家的時光。

5.3.2 剝金桔

桔醬是新埔的特產之一，作法是人工先剝去金桔有苦味的外皮，再泡水、去籽、攪碎、烹煮做成桔醬，置入玻璃瓶即可販售，最佳的食用方式為當作白斬雞的沾醬，愛吃桔醬的人連燙青菜都要淋上一些才夠味。F 的鄰居正是做桔醬的商家，每到金桔產季時，商家會請 F 及其他五位鄰居剝金桔皮，一年只有一個多月，金桔產季接在柿子之後，這兩個工作恰好能銜接，F 已經剝了十幾年，工作方式是商家每天將金桔秤好，一件 100 斤共六件放在門口，六位剝皮工各自用推車推一件回家中去剝皮，剝好再推回去給商家，剝一件的薪資是 300 元，F 的動作快，剝一件要三個小時，算起來薪水和削柿子一樣。但近兩年受到氣候影響，剝金桔的時間和削柿子重疊，在不請假、不放棄任一份工作的前提之下，於是 F 從凌晨三點開始剝金桔，剝到六點，先生會幫忙把剝好的金桔推回去，吃個早餐之後，七點到柿餅工廠上班，直到下午五點才下班。

他們每天就做六百斤沒有多，今年做一個月過四天，這兩年逢到，我就是三點起來剝一百斤，我一個人剝，剝完又來這裡，它只有一個月多一點，它不是很長，那個剝件的，一百斤才三百塊，我剝比較快三個小時，趕著趕快剝完又要來這裡上班，他那也是一個鐘頭跟這裡一樣一百，她們剝不只啊，她們剝不完，她們剝很久那很少（F 訪談稿）。

由 F 的談話中能感受她對早起工作沒有抱怨，時間重疊仍調鬧鐘半夜起來工作，只是有點趕，怕來不及，顯然她是喜歡這兩份工作的。在提到其他人剝皮動作慢時，用剝很久那很少來形容，其心中的薪資計價單位是時薪，而不是件。

5.3.3 採橘子

柑橘類水果產季時，G 在朋友的介紹之下到五峰採橘子、到北埔採茂谷，工作情況是有人負責載她們到工作地，女工負責採，男工負責將採好一藍一藍的水果推出去、扛上車，若扣掉來回車程，一天實際上的工作時數是九個小時，薪水有 1,300 元到 1,500 元，遠多於削柿子，但工作天數並不固定，一年能做幾

天、在哪裡採全看產量來調配人力，工作環境是在太陽底下，女工們會戴著口罩和帽子防曬。

採橘子工資比較高，他那算我們八點去到五點下班，一千五百元。在五峰那邊，平地像田一樣，兩邊是山，帽子啊口罩戴著，採好就放籃子，男工推出去，我們負責採，那邊採七、八天。後來去我兒子同事那邊採茂谷，茂谷薪水比較低，才一千三百元，在北埔那邊高山上，很高唷，可以看到整個北埔。（G 訪談稿）

在描述採橘子、茂谷的工作情形時，即便這個工作是需要在大太陽下滿山跑，G 沒有用到任何一個埋怨的字眼，反而是形容她們如何避免曬傷、工作時能看到的風景，可以想像其心境是開闊的，並不是被迫勞動，遇到困難就想辦法解決。

5.3.4 其他臨時工

除了以上三種季節性作物的臨時工之外，婦女們還會找新埔附近的工作來做，前提是要能配合柿餅產季，另外，在田野調查時發現，不只是婦女，包括柿餅加工廠的結帳櫃臺小姐、男工都是如此，沒產柿餅的季節到其他公司上班，做柿餅的老闆通知他來工作，就先把另一個工作「停掉」，待柿餅季結束，再回去工作。

本來就有做園藝，做很久了，七八年了，有削柿子那邊就停掉，這邊沒削就過去做，只要有工作，只要有好做，什麼都做（J 訪談稿）。

G 在訪談中提到鄰居找她去拔草，G 認為拔草太熱，不要去，但採橘子何嘗不熱？差異在於拔草的薪水和削柿子一樣，一個小時 100 元，削柿子不必曬太陽，若要做曬太陽的工作，薪水一定要比削柿子高。

很多人找我工作，可是我說我已經答應這邊了，我這個人就是我答應了就不能反悔。既然答應了有再好的工作我也不會去（I 訪談稿）。

為什麼要做這些工作呢？柿餅產季外，有多餘時間，兼顧家庭的前提下，賺取收入，並帶來成就感，一方面是習慣勞動，一方面是因工作可以滿足經濟需求與心理需求。但婦女們因教育程度不高、年紀大，無法進入一般職場，普遍以勞力獲得薪資，選擇參與短期、不需特殊技能的勞動，且多依附農作物產季之下。由 F 和 G 兩位婦女來看，削柿子這份工作在她們心中是一個評斷勞動工作環境、工作內容難易度的基準點，藉此比較其他工作條件的是否優渥，以決定要不要去做，若有額外的工作機會，勞動環境若劣於削柿子，工資就得比較高，她們才會去做，勞動環境若和削柿子差不多，薪資也差不多，就會接受這份工作，婦女們對於勞力的配置仍有選擇的能力。

5.4. 社交圈

職業代表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也連帶包含經濟地位、生活方式等，社會文化對於已婚婦女角色的期待和認知，鞏固著傳統的性別分工和性別角色文化，女性則依循著這個期望建立自己事業和性別認同。完全在家帶孩子的生活，活動領域以家庭為主，社交封閉，可能會產生負面情緒，外出工作代表婦女暫時脫離家庭，進入另一個新的活動領域，拓展女性日常接觸的人事物或社交圈，能轉換心情。削柿子是女性為主的工作場所，不同管理方式、經營方式，形成不同的工作氛圍。老闆感謝員工能在柿餅產季時密集提供勞力，有同舟共濟的心態，不會頤氣指使，肯定她們的付出，尊重她們，員工也認為把柿餅做好是分內的工作，老闆生意好自己也好，雙方像家人一般相處，合作有十足的默契。

老闆對我們也是很好啊，真的講，妳要吃什麼他都會去買（F 訪談稿）。

就跟姊妹一樣啊！他有時候吃到什麼好吃的，會給我們帶一份，像我們都是年紀比較大，他講話都很婉轉，只要妳不犯錯都沒關係，就是大家相處好做得快樂就好（I 訪談稿）。

與同事相處融洽讓工作時間感覺飛快，良好的環境營造有賴老闆管理方式得宜，「老闆人很好」是所有受訪者都會回答到的一句話，工作環境是讓他們會選擇這份工作並且留下來的主因，有喜歡的工作讓婦女們更肯定自己的生活。除此之外，這份工作帶來成就感，A 是目前新埔所有柿餅加工廠工作人員當中

最年長的一位，只要是前來觀光的遊客，都不免會注意到她戴著柿染頭巾低頭認真工作的樣貌，常上媒體版面，可以稱做是新埔柿餅最佳活廣告，C 的手腳很快，當一個人顧一台機器的時候，小孩子圍整圈，看得目瞪口呆，B 在假日人多的時候會應老闆的要求手工削給客人看，很多人圍著她拍照，I 的老公和小孩子說：媽，妳去削柿子都不用休息，妳真的是女鐵人！削柿子婦女受到家庭、社會影響生性低調，對自己的想法就是「一個做事的人」，終身為家庭付出，在家庭中的角色為輔助先生成就家庭，來削柿子受到他人賞識，認真工作的神情成為眾多鏡頭與鎂光燈下的主角，外在的肯定無疑讓婦女們對這份工作更有歸屬感。

從前婦女坐在柿餅寮裡削柿餅，他們圍成一個圓圈，邊削邊聊天，從凌晨到傍晚，從公事到私事，從自己到家庭成員，這一個圓圈被稱為「是非圈」。訪問第一代婦女工作時是否有聊是非的經驗，五位當中有兩位表示說話會分心，很少跟人說話，若有人說笑話，會跟著笑，其他三位說削的時候會聊天，一邊聊手會動，在這「是非圈」當中，會不會說話因人而異，共通點是她們喜歡這裡嘻嘻哈哈的氣氛，且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職責，是把柿子削好為首要。

我很少跟人說話，怕做來不及，要看事情，有時做不好會被人罵，我靜靜的打，不跟人說話，要看事（A 訪談稿）。

一邊講話一邊看柿子，會來不及做，哪有空聊天（C 訪談稿）

說這說那的，一樣的動作一直做不說話，會想睡覺（D 訪談稿）。

師傅間談話內容為瑣碎的小事，有時還會說到其他老闆，彼此交流工作經驗之後發現：現在的老闆比較好，更不會想要換老闆。由此可以推知在農村裡，婦女可以選擇的工作機會不多，是非圈能強化向心力，更珍惜現有的工作。另一方面，子孫各有自己的生活，讓婦女能喘口氣，有餘力向外發展，工作為生活帶來生機。A 的家在旱坑裡，只有當教師的兒子退休後回到山上和她同住，平時母子話不多，A 在家裡打掃、澆菜等勞動，八十四歲高齡的她，先生十幾年前過世後，在家裡過著數十年如一日的的生活，不免感到平淡，她說：來這裡很生趣，嘻嘻哈哈，B 的情況也是類似，六個孩子各自成家立業，沒有住在山

上，假日的時候才會回來，家中只有兩夫妻，他形容家裡靜悄悄的，這裡很多人，很快樂。F 有與孩子們同住，但孩子白天都外出上班剩夫妻兩人，她說：來這大家很和氣，大家很快過日子啊，他們笑我說：「年紀那麼大還來上班」，我說這樣子很好過日子啊，不然妳在家裡兩個人妳看我、我看你。

用削皮機器後，工作環境比較吵、動作比較快會有壓力，所以不太能聊天，田野調查時觀察發現，三個人圍著一台機器，機器削的速度很快，二手必須不停的削頭削尾，才不會累積很多柿子，偶有一兩位說話，其他人搭腔，大家就跟著笑，大部分時間是各忙各的，認真做著自己的工作。而且轉型觀光之後，柿餅產季每天都來許多遊客，除了有各式相機對著她們之外，尚有電視台前來拍攝，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她們能聊天的機會就更少了。

你從剛剛看到現在，有看到我們聊天嗎？我們都是認真做著自己的工作（H 訪談稿）。

B 柿農的師傅形成工作團隊，「是非圈」氛圍較濃，她們會開同儕的玩笑，藉此活絡氣氛，感覺工作時間過得較快。

去年就是跟他們打賭，叫我加班，害我晚下班，我女兒有怨言。她們上次跟我說：「有幫忙加班，就老闆請吃什麼」，然後我說：「妳們加到八點，我放鞭炮」，什麼都有啦，平常會很開心啊！（K 訪談稿）

在這是非圈當中全都是女性，婦女在家庭裡無條件為家人付出，包容、體貼柔軟的心也帶到這充滿人情味的職場上。

我們用機器比較快，她會來不及，她會說：妳們放著幹嘛？因為她年紀比較大，有時候放比較快，她會頭暈啊。就大家互相啊。（I 訪談稿）

下班之後，婦女們的互動並不頻繁，有也僅止於拿自己種的菜給同事，或者出門辦事時順路經過進去聊聊天，很少刻意約出去玩。

因為我很少去串門子，自己也比較不喜歡跑（I 訪談稿）。

雖然我吃到這麼多歲，我交的朋友，有做什麼事情才會來往，平常不會有所牽扯，我不喜歡這樣的東西（C 訪談稿）。

新埔鎮的人口流動不大，世居在此的人也不少，削柿子的婦女剛來上班互相認識的時候，會發現彼此之間多少有點連結，田野調查時也遇到同樣的情形，筆者自我介紹後，婦女們說認識我的父母、她的親戚也住在我家附近，甚至遇到遠房的姑姑，是自己人感到熱絡，更能放下心房受訪，削柿子這個工作圈裡，身份特殊的莫過於外籍婦女，這次受訪者中有兩位外籍婦女 L 和 K，年紀最輕，她們來削柿子想要融入這個圈子，走過的心路歷程比一般人複雜。

田野調查時筆者同婦女們坐在削皮機旁話家常，聊到婦女從前在台北工作時，美髮院的客人要介紹她到酒家去上班賺錢比較輕鬆等，突然出現以下對話：

陸籍配偶：老公對老婆不好怎麼辦？

削柿子婦女 1：老公對老婆不好，離婚。

陸籍配偶：老公有外遇怎麼辦？

削柿子婦女 1：凉拌，你講那麼多幹什麼，離婚

削柿子婦女 2：不要動不動就離婚，你以為離婚就可以搬家

削柿子婦女 1：到酒家去上班

削柿子婦女 2：這不是家家酒，想到要玩就玩（田野筆記）

陸籍配偶問筆者婚姻關係不佳該如何處理，筆者還沒回答，旁邊削柿子的婦女就開口說話要她離婚，還開玩笑要她乾脆到酒家去上班，沒有試圖想辦法幫忙，對一起工作數個月的同事態度不友善，有說風涼話之感，另一位削柿子婦女比較有同情心，保持傳統勸和不勸離的態度，婚姻不是兒戲，且離婚之後無處可去，還是忍耐為上策，由此顯見外籍配偶在這個團體內有被排擠的情形。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另一個柿餅加工廠，K 已經在這裡做十幾年，受到老闆重用什麼事情都做，在同事眼中是老闆的大咖師傅，在老闆請託之下，每天早上固定由她一個人掃員工專用廁所，掃好之後，老闆會向她說謝謝以平復心中不舒服的感覺，因為這原本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

我剛來的時候我懷孕大肚子還要去洗廁所，當初老闆娘說用輪的，結果洗廁所沒有人要去啊，都是剛開始都是我去做（K 訪談稿）。

有一次，廁所髒了，當中年紀第二大的同事叫她去掃，她回嗆說：「老闆沒有叫我掃，廁所是大家用的，大家要去掃，為什麼要我去掃？」由此得知 K 在人力流動性大的柿餅加工廠工作十幾年算是資深員工，但仍被人使喚，顯見其在他人心中地位較低。

我們一個身分是大陸人，她比較會歧視妳，再來有一個就是會欺負妳，臺灣就是這樣，妳不管那一個環境、那一個工作地方，妳剛開始那一關妳一定要過，你要讓別人服你，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能耐，你學的東西要跟他不相上下，他才拿你沒輒啊（K 訪談稿）。

外籍配偶在這個團體內，面對歧視的眼光，其生存之道是稟持著自立自強的信念，在工作中不斷學習、努力工作，得到老闆的賞識，成為柿餅加工廠不可或缺的一員。

5.5. 小結

當問婦女們對自己的看法時，她們多表示沒有看法，在追問之後才勉強回答，D 說我哪有什麼想法，只想說給家裡有一些錢可以用，沒有什麼想法，就是要做，自我認同建立在做事之上，做事情能讓他們更加確定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樣的觀念發揮在工作上就是自律，以同樣的標準審視同僚，形成工作環境中的他律。

師傅在受訪過程中，無論是談兒時、工作還是家庭，甚至是對自己的看法，大多透過身邊的人物來呈現自己不同階段的生命歷程，如同連瑞枝（2010）研究中提到，這種既核心又邊緣的說話方式，看起來是迴避自我主體性，不自覺地以從定義身旁的人物網絡關係來定義她個人的歷史。

從艱困的童年到悠閒的老年生活，從被外在環境逼迫去勞動到自己選擇勞動，她們的心自由了，簡美玲、吳宓蓉（2010）研究六位客庄阿婆勞動經驗也發現同樣的情形，老年有閒感到圓滿，出於自身勤勞的勞動和子代照養和成就。

對於現況懷抱著感恩，知足常樂的心情在第一代婦女身上格外明顯，連有自來水能用都是她們所稱許的。婦女不強求事情的機緣，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遇有挑戰不逃避積極面對，要求不多，無非就是一個溫暖的家，為了成就這個家做的心甘情願，當子女各自嫁娶之後，能做的就是自己種青菜、養雞，假日兒孫成群回山上探望時，煮豐盛的一餐給大家吃，並準備好大包小包食物讓他們帶走，這就是對自己的肯定。

客觀地看，這份以時計薪的工作一年最多只能做五個月，有時候只做半天就回家，薪水並不多，婦女們卻十分滿足現況，因工作帶來正面感受，這感受是在單純家庭生活外，不同層次的充實，提升成就感，削柿子工作對婦女來說是個人、工作、家庭三方面得利，本研究觀察到的現象與呂欣怡（2011）的研究相似，家庭之外的工作帶來經濟收入，伴隨而來的自主性、社會網絡，是工作之於婦女的多重意義。



六、結論

6.1. 研究發現

客家婦女在傳統上給人樸素節儉、勤勞潔淨、任勞任怨的家務勞動者形象，在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中國傳統社會，女性在家族中的角色相當複雜(李泳集，1996：107)，婚前在原生家庭中協助家務，婚後擔任母親養兒育女、擔任妻子伺候丈夫、擔任媳婦孝敬公婆，操持家務，生活範圍被侷限在家庭之中，以家中成員為生活重心，客家婦女幾乎和勞動劃上等號，如果把客家婦女的特性抽出，客家人的特色可能就無法建構出來(張維安 1994)。

柿餅產地—新埔有一群客家婦女走出家庭在柿餅加工廠削柿子皮，隨時代變遷、社會經濟發展，教育程度提升、就業能力提高，婦女走出家庭參與勞動是普遍的現象，對於台灣經濟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在新埔柿餅加工業裡，從日治時期的第一代到現在第三代，婦女是皆不可忽視的人力資源。本研究選擇削柿子婦女作為研究對象，雖不同世代婦女的生活背景和經驗差異很大，但仍發現同質性經驗，本研究將削皮機出現劃分婦女為兩個世代，兩代削柿子婦女婚前協助娘家家務，婚後擔負夫家家務重任，生命歷程中各階段前來工作的原因都不盡相同，為政治、經濟、家庭三個因素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就時間的角度而言，工作與家庭互為消長，傳統角色分工觀念影響婦女對家庭、工作排序，思考從家庭出發，做出最適合家庭的就業決定，在家庭中角色期望愈高時，愈有可能退出勞動市場。共同的現象為投入工作的時間較少，多等到最小的孩子進入學校，才有時間與心力外出工作，在多元的考量下，選擇相同的工作—削柿子。在生命週期中，家庭對婦女勞動與工作影響最大，其中又以結婚與生育對勞動參與的選擇衝擊最大，女性勞動參與被視為是暫時的，薪資所得對家庭經濟只是輔助性質。

兩代削柿子婦女間差異之處在於工作選擇、自我評價與外籍婦女加入，第一代婦女有手工削皮的功夫，能選擇要到哪裡工作，老闆會「下訂錢」以確保人力，自我評價相對較高；第二代婦女沒有特別技術，不能隨便跳槽，自我評價相對較低。外籍婦女在工作圈中會受到排斥，一開始只能放軟身段，漸漸的透過自我提升技術來讓別人信服。

三代柿餅製作過程裡，勞動體制與男女分工隨業者經營方式而改變，特別是從前被視為製作柿餅關鍵且由男工負責的捏壓柿子，現在都已傳授給削柿子的婦女，其關鍵技術其實是時間，由傳承與歲月累積而來的經驗，時間多由男性掌控，在柿餅產業裡階級與性別有連結，婦女深知此道，謹守本分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上表現出志願性順服。

削柿子婦女在工作與家庭間輕易找到平衡點，原因有二：一是削柿子工作被削皮機器取代，有別於從前計件制，婦女要披星戴月凌晨上工，現在業者採計時給薪，上班時間彈性、請假方便，婦女可兼顧家庭，二為削柿子婦女多已達做阿婆的年紀，家庭照顧責任、家計壓力減輕，子孫各有自己的生活，面臨空巢現象，削柿子可以打發時間。此外因為年紀較長，可以觀察到勞動參與特殊之處，削柿子婦女會因孫兒出生暫時離開工作，孫兒上學去之後，再回來削柿子，不只受到下一代兒女影響，還被第三代孫兒左右。

關於客家婦女研究，以往偏重從結構角度來檢視婦女意識，發現婦女受到資本主義、父權主義壓迫，晚近研究從意義體系出發，從不同的取向、視野切入，回到女性的日常生活層面來理解婦女勞動與工作的關係，其學術成果呈現不同以往的認知，有別於李商隱詩中「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悲情，婦女習慣為家庭無私奉獻，為家人的生活打點，透過「做事」肯定自己的存在，家人是她們的感情寄託，家人平安讓她們樂在其中，勞動看似被迫、被決定，實則是將勞動化為行動與生活的核心價值。以上典範之間並無衝突，且有互補作用，讓我們從多元角度探知婦女工作在社會脈絡下的意義，削柿子工作帶來單純家庭生活外的正面感受，對婦女來說是個人、工作、家庭三方面得利，除經濟收入外，伴隨而來的自主性、社會網絡，是工作之於婦女的多重意義。

6.2. 研究限制與展望

新埔是我成長、工作的地方，以這個場域作為田野地點，可能因熟悉造成盲點影響看法，身為已婚婦女，在訪談過程中，傾聽她們的聲音和想法，有時會將自己的生命經驗一起對照，在這經驗背後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和存而不論的原因，如何客觀的探究、透過我的筆書寫客家女性忠實呈現受訪者的聲音，是首先要面對的限制。

再來是礙於能力與時間的受限，訪問對象數量不多，訪談過程一開始遭到

拒絕時，曾讓我感到沮喪，有一段時間不敢進行訪問，在親友及老闆的幫忙下得到協助，再度回到田野，漸漸熟悉之後，受訪者才打開心房受訪。且受訪者除第一代退休的三位之外，目前皆有在柿餅加工廠工作，即使這份工作有缺點，仍給予這份工作正面肯定，受訪者取樣時未將曾在柿餅加工廠工作但後來離開者列入。

受訪者目前多已超過五十歲，訪談時以追憶方式陳述過去的經歷與感受，距今時間長，受訪者的記憶可能不是非常明確，僅能概括說明對於當時有印象的情況，回溯記憶限制資料收集面向，因為人們總是會遺忘或是過濾過去發生的事，故訪談不一定能得到最正確的資料，但在沒有文字、圖片記載的情況下，追憶的訪談是蒐集過去資料唯一的方法。另外，受到研究者客語能力限制，當受訪者用一些非日常口語會用的形容詞時，研究者用國語表達未必貼切的表達出意思。

本研究訪問對象主要採樣於旱坑里轉型觀光的柿餅加工廠，在旱坑里仍有以批發為主的柿餅加工廠，在新埔街區也有柿餅加工廠，同為削柿子的婦女在不同背景、工作地點、業者經營管理方式下，其勞動意識為何，為建議未來研究方向。

七、參考文獻

- Baird, Vanessa 著，江明親譯，2003，《性別多樣化:彩繪性別光譜》。台北：書林。
- Norma Diamond 著，林佳瑩譯，1986，〈台灣的婦女與工業〉。頁 117-135，收錄於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圖書。
- 王克敬，1987，《台灣民間產業 40 年》。台北市：自立晚報。
- 王麗容，1995，《婦女與社會政策》。台北：巨流。
- 王俐容，2005，〈文化政策中的經濟論述：從菁英文化到文化經濟〉。《文化研究》創刊號：169-194。
- 石玉鳳，2002，《水果養生事典》。台北市：三采文化。
- 古學斌、邱延亮，1997，〈香港中年女工生命史與雇傭策略初探：一些回題和啟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167-207。
- 成露茜、熊稟純，1993，〈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台灣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4：39-76。
- 林柏燕，1997，《新埔鎮誌》。新竹：新埔鎮公所，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
- 林鶴玲、李香潔，1999，〈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分配〉。《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4）：475-528。
- 林政鋒、李珣瑛，2010，〈從柿餅到柿染，年產值逾 3 億元〉。經濟日報，第 BB4 版，3 月 25 日。
- 林雅容，2005，《經濟變動中漁村婦女之工作認同與婚姻認同》。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博士論文。
- 林淑蓉，2007，〈飲食文化篇〉。頁 152-178，收錄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南天。
- 林 明，2009，《新埔柿餅節的「打手」：節慶與關鍵行動者》。台北：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運貴著，徐漢彬譯，1996，《客家與台灣》。台北市，常民文化。
- 江文瑜，1996，〈口述史法〉。頁 249-269，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伊慶春、簡文吟，2002，〈台灣的家庭與變遷〉。頁 275-310，收錄於王震寰編，《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杜素豪，1997，〈農家婦女勞動力的新詮釋—理論的回顧與概念的澄清〉。《婦女與兩性學刊》8：265-286。
- 呂玉瑕，1980，〈社會變遷中台灣婦女之事業觀：婦女角色意識與就業態度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25-66。
- 1983，〈婦女就業與家庭角色、權力結構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6：111-143。
- 2010，〈社會變遷中客家女性的經濟資源與家庭地位：一個北台灣客家社區的研究〉。頁 587-620，收錄於莊英章、簡美玲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暨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 呂欣怡，2011，〈客家微型創業婦女的勞動初探：以橫山鄉為例〉。《客家研究》4(2)：99-140。
- 何素花，2002，〈採茶婦女—客家勞動婦女的一個面相〉。頁 495-534，收錄於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語言、婦女、拓墾與社區發展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何明修，2004，〈工人文化的民族誌研究〉。頁 72，收錄於林本炫、何明修編，《質性研究方法及其超越》。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李煜梓，1991，〈柿餅豐收 新埔忙得不亦樂乎〉。經濟日報，第 19 版，10 月 12 日。
- 李健果，1998，〈季節風情 九降風帶路 柿餅之鄉 新埔 風光無限〉。聯合報，第 38 版，10 月 24 日。
- 李泳集，1996，《性別與文化：客家婦女研究的新視野》。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2000，〈家務分工：就業現實還是平等理念？〉。《臺灣社會學刊》24：59-88。

- 李竹君，2001，《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成衛、張明泉，2005，《水果養生事典》。北京市：北京出版社。
- 李文玫，2009，〈「味覺、身體、勞動與情慾」：對客家女性文化性格的論述與批判〉，頁 121-142，收錄於羅肇錦主編，《第九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研究所。
- 吳念真，1997，〈台灣念真情 柿餅飄香的季節〉。聯合報，第 40 版，10 月 12 日。
- 余亭巧，2004，《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碧娥，1987，〈台灣地區婦女政治參與的變遷〉。《社區發展季刊》37:13-25。
-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市：武林。
- 2005，〈從古書看客家女性尊長地位〉。《客家研究輯刊》，2：73-82。
- 施添福，1992，〈清代台灣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和型態〉。收錄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 洪玉津，2008，《埔里茭白筍產銷性別空間之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洪馨蘭，2011，《敬外祖與彌濃地方社會之型塑：圍繞一個臺灣六堆客方言社群之姻親關係所展開的民族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宗國，1995，《工作內涵與性別角色》。台北市：稻鄉。
- 許嘉猷，1981，〈新結構論社會階層研究的新方向〉。《思與言》19：234-249。
- 莊英章，1994，《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維安，1994，〈客家婦女地位的轉變：以閩客族群為對照的分析〉。收錄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2000，〈桃、竹、苗茶產業與客家族群經濟生活間的關係〉。頁 118，收錄於張維安主持，《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台灣文獻館。

- 張維安、黃毅志，2000，〈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與經濟分析〉。收錄於徐正光主編，《歷史與社會經濟：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張維安、謝世忠，2004，《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地區客家鄉鎮文化產業》。南投：台灣文獻館，頁 117-119。
- 張維安、張翰璧，2005，〈文化資產的經濟轉化：桃竹苗茶產業為例〉。《客家研究學刊》。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 張晉芬，1995，〈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之剖析〉。頁 147-180，收錄於劉毓秀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台北：時報文化。
- 1999，〈社會學的性別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0：1-3。
- 2002，〈找回文化：勞動市場中制度與結構的性別化過程〉。《台灣社會學刊》29：97-125。
- 張典婉，2001，《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翰璧，2007，〈客家婦女篇〉。頁 111-132，收錄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南天。
- 2008，《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四溪計畫)，鳳山流域客家族群產業經濟》。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張慧君，2009，《客家採茶婦女的勞動意識—以新竹縣峨眉鄉為例》。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運棟，1983，《客家人》。台北：聯亞。
- 陳佩周，1995，〈旱坑里 有名的柿餅故鄉〉。聯合報，第 4 版，2 月 3 日。
- 陳其南，1995，〈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發展〉。收錄於《「文化·產業」研討會暨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 1996，〈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收錄於《地方文化與區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 陳板，2002，〈化邊緣為資源：台灣客家文化產業化的策略〉。收錄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文化中心編，《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陸先恆、胡美珍，1997，〈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婦女就業與收入的影響〉。頁 45-88，收錄於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冊）》。台北：南港。
- 陸緋雲，2002，〈性別與族群：客家婦女地位的反思與探討〉。頁 539-549，收錄於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盛清沂，1980，〈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台灣文獻》31(4): 170-173。
- 連瑞枝，2010，〈被送出去的女人：母女關係、家庭勞動力與歷史記憶〉。頁 278，收錄於連瑞枝、莊英章主編，《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台北：南天。
- 游美惠、王百合，2003，〈教育界的勞動後備軍－已婚女性代課教師之初探性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9(4): 61-92。
- 曾春鏞，2003，《新埔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純純，2006，〈從「孺人」到「女兒入譜」：客家女性在族譜中角色的歷史變遷〉。發表於「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台北：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2006年10月29-30日。
- 黃淑鈴，1998，《性別分工－家庭與勞動力市場再結構：南投高山茶區婦女採茶組織的個案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瀚瑩，2005，〈柿餅紅了〉。《講義》38(2): 57-60。
- 彭瑞金，1993，〈台灣客家文學的可能性及其以女性為主導的特質〉。收錄於黃恆秋編，《客家台灣文學論》。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 彭作奎，1995，〈台灣農業發展回顧與展望〉。《台灣經濟》226: 19-24。
- 彭桂枝，2003，《女人與工作：一群客家農村中年女工的工作經驗》。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詹益晃，2001，〈金黃色的鈴鐺--柿餅〉。《新竹文獻》7: 45-63。

- 楊國鑫，1993，《台灣客家》。台北：唐山。
- 潘美玲、黃宜菁，2010，〈茶鄉客家婦女的勞動：峨眉採茶班員的勞動圖像〉。頁 308-310，收錄於連瑞枝、莊英章主編，《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台北：南天。
- 劉鶯釧，1988，〈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的多重選擇模型〉。《經濟論文叢刊》16（2）：133-147。
- 劉錦雲，1995，《客家民俗文化漫談》。台北市：武陵。
- 劉仲冬，1996，〈民族誌研究法及實例〉。頁 173-193，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劉梅君，1997，〈建構「性別敏感」的公民權：從女性照護工作本質之探析出發〉。頁 185-226，收錄於劉毓秀編，《女性、國家、照護工作》。台北：女書文化。
- 1999，〈性別與勞動〉。頁 253-303，收錄於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性別與社會、建構（上冊）》。台北：心理。
- 劉清榕，李青松，張明瑜，1998，〈農家婦女農業勞動參與之研究〉。《臺灣經濟》255：18-36。
- 劉還月，2000，《台灣族群誌》。台北，常民文化。
- 劉欣芸，2002，《台灣農家已婚婦女時間分配之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博士論文。
- 劉昭吟，2005，《在全球化中綻放—從蝴蝶蘭跨界商品鏈探討台灣出口農業的全球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劉照金，2008，《客家文化資源活化、產業化及行銷策略之研究中堆(竹田)地區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簡文吟、薛承泰，1997，〈再就業婦女的職業流動初探〉。《人口學刊》18: 67-98。
- 簡美玲，吳宓容，2010，〈客庄阿婆的沒閒（mo han）：山歌經驗敘事裡的女人勞動〉。頁 345-346，收錄於連瑞枝、莊英章主編，《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台北：南天。

- 蔡淵毅，1985，〈清代台灣移墾社會的商業〉。《史聯雜誌》7：16-17。
- 蔡青龍，1988，〈婦女勞動再參與的初步分析〉。《經濟論文叢刊》16（2）：149-174。
- 賴嘉玲，2004，《中國貧困農村婦女發展進程研究 貴州省雷山縣案例剖析》。中國：問津堂書局。
- 賴郁如，2007，〈客家社會中的女性角色期待：從客家諺語觀之〉。頁 47-49，收錄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編，《2007 客家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 賴爾柔、高淑貴，2007，〈21 世紀農村婦女之角色與功能〉。頁 1-2，收錄於沈聰明主編，《2007 農村婦女發展論壇專輯》。花蓮：農委會花蓮農改場。
- 賴守誠，2008，《客家地方食物特產、文化經濟與地方發展：以美濃板條與新埔柿餅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謝重光，1999，《客家源流新探》。台北市：武陵。
- 鍾永豐，1994a，〈客家人的家族與婚姻〉。頁 281-305，收錄於徐正光、彭欽清、羅肇錦主編，《客家文化研討論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1994b，〈淺論傳統客家婦女的身份〉。頁 114-121，收錄於《重返美濃》。台中：晨星。
- 薛承泰、簡文吟，1997，〈再就業婦女的職業流動初探〉。《人口學刊》18：67-98。
- 羅香林，1981，《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市：南天。